

临沂市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沂市政区地名图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东夷文化发祥地
-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中国市场名城
- 中国地热城
- 中国书法名城
- 国家园林城市
-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图例

- 市政府
- 县(市、区)政府
- 乡、镇(街办)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道号
- 国道及道号
- 省道
- 县道
- 乡道
- 设区市界
- 县(市、区)界



2011·07,4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文学院

编委主任：王晓嫒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刘 凯
 高 明 胡爱军 伊廷军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高文堂 郑克勤 曲文军
 牟海善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王傢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杨兴文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刘兆东
 责任编辑：杜 帅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 伦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期特载】

- 胜利的转折 历史的功绩 黎玉 陈沂 高克亭 04
 罗荣桓在山东的岁月 辛鸿义 08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峥嵘岁月】

- 民心——沂蒙革命根据地札记 高 雷 12
 陈毅担架队 鲁 光 17
 赫赫老八纵 雄师下沂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集团军征战历程 李干排 23
 三十八军：朝鲜战场上的万岁军 刘福通大龙头 28
 跨海之战 韩先楚 34

【史海撷萃】

- 从“县太爷”到阶下囚（连载） 时 麟 王秋侠 41

【文化掇英】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灯·扛阁”（上）
 张铁民 44

【名人素描】

- 曹玉海：朝鲜战场上的“金星” 陈 辉 47

【典籍考辨】

- 蒙山称名探源 王鸿烈 52

【古城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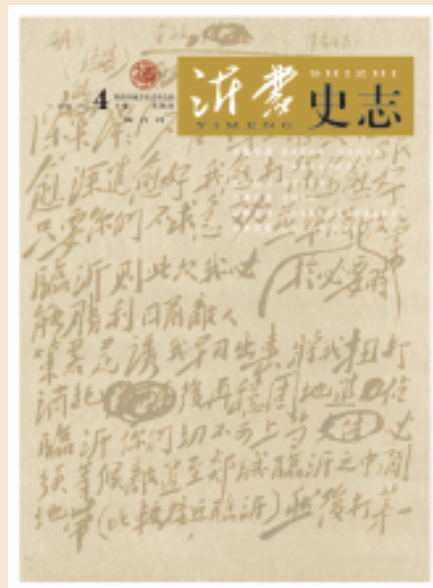
-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54

【诗画赏析】

- 笔精墨妙 历久弥新
 ——王珣行书《伯远帖》 胡拙安 辑 58

浩气壮山河 诗魂育后人 ——《沂蒙诗话》之四（上）	李兴河	60
【探索发现】		
蒙山南麓旧石器早期遗存的发现	徐淑彬	64
【沂蒙名医】		
剑指“司令部”之魔——记费昶	刘凤才	67
【史料辑存】		
临沂大学历史变迁	王培磊	70
【沂蒙乡亲】		
与时代同行 ——记新华社原国内部主任李尚志	于 芹	73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连载）	赵丹峰	75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为毛泽东为部署鲁南战役拟定的电文
封底为东高尧青铜器铭文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胜利的转折 历史的功绩

黎 玉 陈 沂 高克亭



刘少奇同志（1898—1969年）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帮助山东军民克服困难、扭转局面的历史功绩，永远不能磨灭。他那高瞻远瞩、多谋善断、联系实际、诲人不倦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前进。

—

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时山东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他直接帮助重新成立山东省委，着手恢复整顿党组织。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在太原召集山东及其他省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在华北以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心，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并具体布置了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政权等工作。这期间，党中央和北方局相继向山东派来一些得力的党员干部，与山东党的干部结合，在各地先后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开始初步组织了各群众团体，扩大了党组织，初步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八路军一一五

师主力部队奉命挺进山东，先后在鲁西、鲁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并抽调大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对打开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时，在山东各地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杂牌军、地方军政人员和封建地主武装。为了抗战，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其中有的愿意和我党我军合作抗战；有的则保持中立，企图在抗战过程中保存力量；还有的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制造摩擦，破坏抗战。一九三九年，日寇停止正面进攻，把重点转向敌后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扫荡、蚕食，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敌人在山东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二十五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两次。一九四一年敌人扫荡更加频繁，特别是这年冬天，日寇调集五万重兵，对我山东腹地——鲁中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大举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分局、省战时工作委员会、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等首脑机关。扫荡持续两月之久，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并环绕蒙山筑碉堡、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妄图彻底搞垮我根据地。我军虽机动灵活给敌人

以相当打击，但山东分局等领导机关仍受到很大损失。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山东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猖狂活动。驻鲁南东北军六八三团乘日寇扫荡之机，在苍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银厂惨案，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 同志被俘，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由于日伪顽夹击，我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日益缩小，交通堵塞，部队减员，组织遭摧残，生产受破坏，加上灾荒严重，军需民食极端困难，到一九四二年，面临的局面更为艰苦。就在这时，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到了山东，帮助我们扭转了危局。

刘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他在回延安途中，中央要他路过山东帮助检查工作。少奇同志长途跋涉，穿过日寇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来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临沭县朱樊村。

少奇同志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坚强的群众观念。一进山东境内，便不顾疲劳地找群众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组织、减租减息、群众生产和生活、阶级关系等情况。在朱樊，他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省战工会的负责同志分别谈话，听取汇报。各部门干部主动向他反映情况和意见，他都耐心听取。他还组织随行的同志仔细翻阅山东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有关材料，系统阅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少奇同志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系统的分析以后，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分局召开了会议，会议由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主持。少奇同志在会上充分肯定山东工作的成绩，同时严肃指出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引导大家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照实际情况进行检查，从思想路线上找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几天讨论，取得了一致认识，接着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共开了八天，会上，朱瑞同志作了《山东抗战四年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着重对形势估计、独立自主方针、群众工作、锄奸政策、领导作风、党内斗争等几个主要问题做了详细检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作了全面指示，并针对山东党内存在的问题，专门作了《群众运动》、《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即人为什么犯错误）等重要报告。少奇同志的报告，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确了”，“工作有办法了”，对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充满了信心。

二

当时，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首先是对形势的认识。抗战以来，山东各项工作成绩很大，党组织扩大，军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建立了政权，为坚持抗战创造了条件。问题是党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指示《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有完成。和敌人比，我是劣势；和友军比，我也是劣势。所以在山东敌友我力量对比，敌仍是第一位，友为第二位，我只是第三位。但有的同志对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本身又不做扎扎实实的巩固工作，主观认为我已取得“初步优势”，盲目乐观，搞形式主义，说得多，做得少，因而敌人一扫荡，顽军夹击，我就被动应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导致极端困难的局面。少奇同志说：“今后只要不再犯错误，条件好转有可能，否则牺牲这一局面也有可能。由于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战略上起了某些变化，革命处在退潮、低落，今后可能更艰苦一些，同志们要振作起来，准备担负艰巨任务，坚持斗争，至少两年，直到最后胜利。”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分局决定当时的总方针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体人民，咬紧牙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积极反扫荡、反蚕食，运用一切斗争方式，积蓄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条件。

贯彻这一战略总方针，在对敌斗争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善于隐蔽力量，积蓄力量，巩固阵地，加强对敌政治攻势，加紧瓦解敌伪军工作，深入敌伪点线及附近地区活动，争取扩大某些根据地等。对敌人扫荡蚕食，则予以有力的打击，使其不敢轻犯。同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彻底实行精兵简政，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等机关，带头将过去的一万人减为三千五百人。军队做到机关精干，充实连队，一切党政军机关做到轻装简从，群众化，战斗化。以适应战争情况和减轻群众负担。这些措施，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对敌斗争逐渐转入主动，在敌占区乃至敌据点周围，我都能顺利进行活动。敌人出扰扫荡，我可以及时了解，决定对策。

其次是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少奇同志对山东群众工作的指示，至今使人难以忘怀。少奇同志说：我们所

的群众是指基本群众，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劳动者，不包括其他剥削阶级。群众工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最薄弱的一环，过去存在着不应有的轻视。但这一工作又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想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就要依靠群众，依靠把成千上万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为什么现在又很迫切呢？因为时机重要，夏收到来，许多贫苦者都要求减租减息，这个时候最容易组织发动群众。……

少奇同志的深刻教导和严肃批评，给大家敲起了警钟。当时，在山东抗战依靠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对基本群众力量估计不足，而对中间势力过于信任，强调依靠对中间阶层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所以，群众根本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也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基本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由于基本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从他们的切身利益上关心党的事业，因此我党我军和群众的关系就象水上浮萍。由于基本群众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群众组织、政权建设、党的基础就不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摧残，也难很好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沉痛的教训。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当即于五月四日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自麦收到年底，各根据地要把这一工作作为第一位的中心任务抓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身体力行，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他告诉朱瑞同志，减租减息既然是中心，就要党政军民干部一齐抓。要抽调大批干部先学习一两个星期，下去后都以农会面目出现，由农会领导，真正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成为政府的附属机关。运动要首先搞点，中心村突破后，再在面上展开。这时，分局组织两个大型工作团，一个去莒南县大店一带，一个在临沭县东潘一带。在运动过程中，少奇同志亲自到村了解情况，及时地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发动斗争，要使群众自觉自愿行动，不能包办代替；政府只掌握法令，如果地主翻脸，则要群众斗争，以法令使他减，等等。少奇同志还指示，要把不同类型点上的干部互相对调，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少奇同志特别注意运用报纸交流经验，指导运动，他曾多次找分局宣传部和《大众日报》头版就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社论，指出过去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开展起来的原因和今后如何开展的办法。正是由于少奇同志的耐心教导和具体指示，才使当时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使党在农村扎下根，各方面工作有了迅速的开展。

再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抗战以后，山东党对

友党友军和各界上层人士作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发展统一战线是有成绩的。问题在于领导上缺乏独立自主地领导全省人民进行抗战的思想，过分信任甚至帮助发展中间势力，贯彻党的“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不力，以致丧失了许多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譬如抗战初期，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纷纷弃职逃跑，我们就没有及时建立政权和根据地。因为我们党的基础很好，鲁南土顽王洪九部有一个营，营长要求拉出来编入我军，但有人唯恐得罪王洪九，破坏统一战线，坚决不同意。后来这个营的营长被杀害，支部被破坏，全营瓦解。所以，少奇同志说：“在山东对顽固派，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优势的，就是因为过去有许多机会我们没有抓住。”他又说：“对顽固派为什么要争取优势呢？而且是基本问题呢？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而只有力量占优势，才能有领导地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贯彻统战政策中，有的同志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譬如“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后来，国民党委沈鸿烈以代之，窜来鲁中山区。这时，我们表示什么“热烈欢迎沈主席统一领导山东抗战”，鲁中山区腹地沂水县东里店一带，早为我山东纵队四支队开辟，也要让给他们，许多战士含着眼泪离开。结果，他们占据有利地位不去抗战，却限制破坏我们发展，不久竟指令反共顽固派秦启荣部，在太河杀害我过路的团级以下干部战士四百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太河惨案”。少奇同志以大量的事实批判了王明“一切为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反复说明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也就是又拉又打，拉他抗日，打他的反共反人民；联合不是无原则让步，不是屈膝投降，更不能被其利用反我们；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是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少奇同志根据这些原则，还对顽军如何进行联络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帮助分局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的“国民抗战协会”的问题，大大发展了山东的抗战形势。

三

少奇同志来到山东后，实事求是地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一九三九年九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后来在湖西地区被坏人利用，借机大肆逮捕杀



害党员和干部，造成严重混乱。罗荣桓同志路过发现后，马上制止，并当即向中央和山东分局发电报说明。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进行纠正，分局派人作了处理。但“湖西事件”的错误并未引起各地警惕，以致类似错误继续蔓延，一九四〇年夏天最为紧张，泰山、清河、胶东等地区最为严重，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泰山区的所谓“托匪案”，就是假案之一例。

少奇同志来到以后，很注意从各方面了解锄奸政策执行情况。他特别重视要有有关部门同志拿出具体的案例来审查，每个案例都问明侦破、审讯经过，定案的根据。有的同志被问得张口结舌，头上冒汗，少奇同志耐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真理在手，对任何案件都不能用肉刑逼供，更不能轻信口供，定案时“三证”缺一不可，决不能轻捉轻杀。这个问题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左”倾路线时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冤枉多少好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今天再不能重演了。在少奇同志帮助下，分局于五月作出《关于纠正泰山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发至各地认真执行。罗荣桓同志亲自主持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等机关的保卫干部复查案件，凡属搞错的马上平反。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组织部部长李林同志根据少奇同志指示，亲自登门谈话道歉，宣布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分配工作，有的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泰山区，由分局社会部高明宇同志，带着分局决定帮助地委作了处理，凡属搞错的，在押的立即释放，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跑了的找回来，同样处理；错杀的追认烈士，家属给予抚恤，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好。

当时山东果断地纠正锄奸政策的错误，不仅对保存力量，稳定局势，提高党的威信，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康生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在山东就没有搞起来，错误没有再重演。

少奇同志还帮助山东党解决了统一领导问题。过去山东分局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对中央、军委、北方局的许多重要指示研究不够，贯彻不力。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存在，是山东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一些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基本原因。少奇同志针对这些问题，经过个别交谈，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作出决定：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合并办公，分局集中领导；军事上统一指挥，成立山东军区，罗荣桓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实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体制，自上而下统一指挥，

协同作战。从此团结加强，步调一致，为争取形势好转创造了前提条件。

四

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三月来到山东，七月离开，前后四个月，这是不平凡的四个月，令人难忘的四个月。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他和大家一样行军、反扫荡；住下以后，做驻村工作，和干部谈话、开会、作报告。从初夏到盛暑，他经常在暗淡的油灯下看材料，写指示，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他有严重的胃病，但是，很少看到他休息。七月一日，少奇同志快走了，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一周年，抽空给机关、部队干部作了一次党史报告。那是在村外树林里，天气闷热，他整整讲了三个多小时。从革命前辈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讲到伟大的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党领导三次革命运动，历尽千难万险，走过曲折的道路，讲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无数同志的壮烈牺牲。他无限深情地说：“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说明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多么热爱，多么忠诚！少奇同志临走时，还有一件动人的故事。当时从滨海去鲁西路程几百里，要经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特别是津浦铁路，大家都为少奇同志的安全担心。分局领导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队一个营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小部队化装护送。多数同志主张第一个方案，去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却毅然同意铁道游击队护送。他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分，站在战士的行列里起程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多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少奇同志在山东四个月，言传身教，处处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高度的马列主义原则，丰富的实践经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帮助山东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帮助分局总结了四年工作和制定了今后八项任务。这个文件，朱瑞同志于五月传达后，曾以提纲形式，用电报发给各地执行，后来经过补充修改，分局正式作出决议，发给全党讨论执行。这个文件处处倾注着少奇同志的心血，字里行间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它在当时象一盏明灯，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从此，山东党拨正了航向，不仅胜利地渡过了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局势，而且由此乘胜前进，迅速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罗荣桓在山东的岁月

辛鸿义



罗荣桓元帅（1902—1963年）

罗荣桓同志于1939年3月率部来山东，1945年10月奉命去东北，在山东战斗和生活了六年八个月。他在这里建立的丰功殊勋，以及表现出的军事和政治智慧，有口皆碑，尤其其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给山东人民以深刻影响。

给山东父老的见面礼

罗荣桓于1938年12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率部入鲁。那时他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正和代理师长兼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在晋西指挥抗日游击战争。在奉命之前，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称：“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所谓“陈旅主力”指以陈光为旅长的三四三旅的两个团：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其时六八五团已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命令它以苏鲁支队的名义先行入鲁。随后陈光、罗荣桓由晋西灵石县经屯留、穿越平汉线于3月1日到达山东郓城张楼。

罗荣桓在张楼与中共郓城县委取得联系后，于6月3日晚上，派六八六团团兼政委杨勇率部冒雨攻克附近的樊坝围寨，全歼守敌伪郓城县保安团，活捉伪团长刘玉胜。罗荣桓称这次战斗是给山东父老的见面礼。

伪团长刘玉胜是郓城人，1933年曾在宋哲元的抗日同盟军当排长，随部队在长城

喜峰口抗日。后被他在韩复榘部任职的一个名叫刘本功的本家，介绍到韩部任连长。山东沦陷后，刘本功投日当了保安司令，刘玉胜也相随当了伪团长。

刘玉胜被俘以后，罗荣桓先对他的情况进行了解，又征求了杨勇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刘玉胜这种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他一个，可以影响一大批人。”后来由于一一五师相关人员的教育和感召，刘玉胜幡然悔悟，写了一份《告同胞书》，递交一一五师师部。《告同胞书》说：“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书》中表示：要“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我耻，以报国人”。刘玉胜的《告同胞书》进行张贴和散发以后，影响很大。后来他果然实践诺言，在当地拉起200人的队伍投奔一一五师，参加抗战。

陆房突围

樊坝之战后，罗荣桓和陈光将六八六团第三营与教导队改称东进支队第一团，由杨勇等率领留在郛西地区，另以张仁初、刘西元分别担任六八六团的团长和政委，继续随师部东进。他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关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结合泰西实际，提出“依山伴湖向外发展”的战略。“依山”即依托泰安肥城山区、大峰山山区和平阴东阿山区，“伴湖”即伴靠东平湖。接着指挥部队扫除了汶河沿岸的全部日伪据点，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这事引起敌人的重视。5月上旬，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纠集8000敌兵，对泰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将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在陆房包围。八路军指战员浴血战斗，一天内打退敌人九次进攻。敌人自称伤亡1200人，其中大佐以下军官50人。战后，向来对八路军战功视而不见、吝于表彰的蒋介石，竟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殊堪嘉慰”。

此后，罗荣桓、陈光又于8月1日至2日，在郛西地区组织了梁山战斗，以六个连的兵力，全歼日军第三十二师团所属的一个大队共300余人，缴获两门意大利大炮和其他武器。中共中央军委直接发来贺电。

运用“六字方针” 创建鲁南根据地

1939年6月，罗荣桓、陈光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率师部机关和六八六团先后进入鲁南地区，开始进行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当时侵华日军已占据了鲁南的滕县、枣庄、郟城、卞庄、泗水等重要城镇，很

多村庄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抱犊崮东部地区则驻扎着国民党五十七军一一二师，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只在抱犊崮附近的小范围活动。罗荣桓政委根据党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方针和当时鲁南实际，对上述各种势力进行梳理和分析，采取相应的策略。后来他在桃峪会议上对这段工作进行总结时，曾概括为“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所谓“插”，就是插入日伪军之间、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沿伸向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疏通、团结，保持统一战线；“反”就是反“扫荡”，反磨擦。下面是他运用这“六字方针”的事例：

对于“争”。罗荣桓驻大炉时，曾亲自做开明士绅、临郟费峰四县边区联庄会会长万春圃的工作，使他自愿将惨淡经营几年的武装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临郟费峰边联支队，由万春圃任支队长。在同一时间，他还应鲁南地方势力派、国民党第十集团军第六师的师长孔昭同的要求，派一一五师特务营的教导员黄昆玉到该师工作。不久，孔昭同主动要求接受八路军建制，他被八路军总部电委为“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

对于“打”。这年冬季，罗荣桓、陈光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先于11月18日攻克了郟城县重镇马头，给盘据在那里的顽固派、国民党郟城县县长阎丽天以沉重打击。又于12月初攻破了孔庄地主围寨，击毙了曾勾结日军袭击八路军的大地主杜若堂。这两次战斗，使鲁南的反动地主受到震慑，扩大了八路军的声威。

对于“统”。罗荣桓把国民党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当作主要统战对象，曾几次派参谋处处长王秉璋和联络科科长靳怀刚，同该师进行联络，协商团结抗日。该师师长霍守义看到王秉璋送去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击节称赏，下令全师传唱。

对于“挤”。主要挤走国民党顽固派、费县县长李长胜。李长胜是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的外甥。1939年12月28日，他突然袭击正在费县管流庄开会的抗日自卫团，打死打伤与会者30多人，并将会议组织者、中共四县边联县委工作团团团长何波等人抓送五十七军一一二师拘押，制造了震惊鲁南的“管流庄惨案”。罗荣桓闻讯立即指示中共一区三地委组织群众到一一二师驻地示威，迫使师长霍守义释放被捕人员，并承认错误。罗荣桓抓住时机，调动农民抗日自卫团3000多人，围攻李长胜的驻地东崮口村，李长胜狼狈逃走。一一五

师随即进驻这一带地域，于1940年2月16日帮助建立了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整个事件演变过程中，霍守义始终按兵不动。随后五十七军撤销了李长胜的职务。毛泽东主席充分肯定罗荣桓对此事的处理，他亲自起草电文称：陈、罗“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

对于“反”。1940年2月，罗荣桓、陈光决定组织白彦战斗。白彦是当时费县的重要集镇（今属平邑县），大地主孙鹤龄和他的儿子、国民党白彦乡乡长孙益庚盘据在这里，勾结日伪军，组织反动民团，阻截八路军的交通。14日战斗打响，罗荣桓、陈光亲自指挥，经两昼夜激战，攻克白彦，消灭孙鹤龄部1000多人。战后随即成立白彦乡抗日民主政府。此后，日军分别于3月7日、12日、19日，连续三次进犯白彦，皆被八路军击退，三次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随后一一五师于5月下旬进驻天宝山区，打通了鲁南和鲁中的联系。

从实际出发 创造“翻边战术”

1942年，罗荣桓政委曾根据山东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了游击战术。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分割和封锁。罗荣桓称这一时期为“黎明前的黑暗”。为扭转这种局面，罗荣桓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从7月到11月，他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游击战》、《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这些文章对指导当时的游击战争起到重要作用。

罗荣桓强调：游击战必须是“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其战场主要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边沿区。要深入隐蔽和扎根于群众之中，以利于保存自己的力量和便于机动。他认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应经过特别军事政治训练，使其既能打仗，又能捉汉奸、特务，既能宣传，又能组织群众。他还着重提出对敌斗争要采取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

罗荣桓的上述指示贯彻以后，各根据地的分散的边沿游击战争异常活跃。许多边沿区的民众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实行联防，一村打响，八方支援。部队的斗争形式采用“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和速打、速决、速走；有的并创造和开展了“麻雀战”、“车轮战”、“地雷战”、“推磨战”、“蜂窝战”、“神经战”等战法。

这一时期罗荣桓提出一个重要战法叫“翻边战术”，也叫“敌进我进”。于冠西同志当时在《大众日

报》工作，据他回忆：这种战法刚提出来的时候不少同志不理解，因为毛泽东著作上是“敌进我退”。有一次文件已经排好了版，工人以为排错了，又把“敌进我进”改为“敌进我退”。后来经过罗荣桓解释才明白了。罗荣桓认为，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反“扫荡”，不同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反“围剿”。反“围剿”一般是“敌进我退”，以便在根据地内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之一路，以打破“围剿”。抗日根据地规模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应采取“敌进我进”，即将军队隐蔽在敌占区的边沿，趁敌人的包围尚未紧缩，“翻”到敌占区去，打乱其部署，粉碎其“扫荡”。

1942年10月，侵华日军1万人“扫荡”鲁中区，罗荣桓部署教二旅于11月3日至8日，直插陇海铁路，连克敌伪据点16处，收复被敌人“蚕食”的海陵县三个半区。第二年1月19日，又命教二旅发起郯城战役，攻克郯城及其附近18处据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敌军全部撤退。“翻边战术”的威力大大震慑了敌人，一些日本商人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安全地方了。”

告别山东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8月，朱瑞奉命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罗荣桓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1945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罗荣桓被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段时间，山东形势有了很大发展。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同志回忆：从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到抗日战争胜利近两年半时间，山东抗日形势发展很快。经过减租减息，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大批青年要求参加八路军，妇救会、识字班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经过一连串攻势，山东五大块解放区连成一片，有1700万人口，20万正规军和50万民兵。经过整风学习，山东党、政、军各级干部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都有了一个飞跃。经过大生产运动，在物质上也做到了自给自足。山东解放区发行的北海币对国民党法币和伪币的比价迅速提高，乃至将法币、伪币挤出市场。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要求投降。当时罗荣桓住在莒南县大店镇一所普通民房里，正在研读毛泽东主席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看到机要科送来的电报后，表现出少有的激动。林月琴《忆荣桓在山东》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我们终于胜利了。这是我们早就盼



罗荣桓与夫人林月琴在鲁南

望的一天，但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又像不是真的。我听他这样说，“仿佛是在做梦”。烛光下看到他那既憔悴又高兴的面容，我心情也十分激动。接着，他又对我说：“现在看起来，我还可以再订一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

第二天，罗荣桓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确定将山东一线部队编成八个师、十二个警备旅、一个滨海支队和一个海军支队，立即进军铁路线和大城市，迫使敌人向八路军投降。同时，各军区广泛开展参军运动，山东八路军总人数达到27万人。15日，抗日根据地五路大军向敌占区进军，于是在齐鲁大地上，铁流滚滚，展现了一幅雄伟壮观的画卷。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解放县城46座，攻克6个重要港口，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6万人，使山东五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决定罗荣桓同志到东北工作。10月24日，罗荣桓告别了他战斗过近七年的山东，踏上新的征程。

民心

——沂蒙革命根据地札记

高雷

罗荣桓元帅在谈到山东根据地时指出：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有重大贡献，前后出的兵员总数在100万以上。现在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全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好几个军是从山东发展起来的。山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跟着共产党走。到抗日战争末期，山东成为全国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抗日根据地，拥有一千几百万人口。如果没有山东根据地，要集中那么多的兵力进军东北是不可能的；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集中我军向北转移就没有立足点，对后来的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将是很困难的。所以，对山东人民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应有充分的评价，对山东的人民和军队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一定要好好歌颂。

文献 1947年6月15日《大众日报》

[华东前线14日电]本月9日陈毅将军参加孟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蒋军74师高级将校时事座谈会。座谈会计有该师少将参谋长魏振钺、少将副参谋长李运良、51旅少将旅长陈传钧、……座谈会各蒋军军官对华东战局如何实现全国和平等问题均发表己见，并时时面向陈毅将军，静待答问各项疑问。魏振钺又说：“例如去年张灵甫师长穿一套解放军军衣去见蒋，蒋即惊讶地问：‘共军还有军衣吗？’张即答：‘共军不仅有军衣，且军衣较国军更好，更适用。’”这虽是一件小事，也可以说明国民党方面实在是太昧于实情了。



左起：华东野战军杨玲、郝世保，陈赓兵团的小刘、中原野战军王仲元、袁克忠、裴植合影，从中看出各部队的着装不尽一致。

回忆 王德胜（时任山东军区后勤部军实科科长）

当时部队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根据地面积比较小，东边的临沂、东南的青口、南边的郯城、西边的枣庄等地，四周全被敌人占领着，根据地都是山岭薄地，日寇的扫荡，顽固部队的敲诈，地主的剥削，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部队的吃粮穿衣常常采取赊欠的办法，给养钱都是当月借下月的；穿衣是做棉衣时才还单衣的钱。其它开支也大都如此。

当时（1941年）的经济来源，一是靠“二五”减租，即所收粮食，地主和佃农各得百分之五十，群众手里的粮食多了；二是靠税收；三是靠募捐，当时的口号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四是靠鲁西票子；五是靠战斗缴获；六是靠到地主、资本家家里去要，即写个条，限多长时间内交出多少钱或多少粮。几种办法有时同时并用，有时交替使用，目的都是为解决经费和物资困难。

回忆 王亭（时任鲁南一分区鞋服股股长）

（1941年）加工夏衣所用的布匹是在当地买的粗布，三条毛驴两人牵着去赶集收购。买来白布得自己染色，当时染料困难，用槐树豆子。

这一年鲁南农业歉收，加上日军扫荡，国民党搞磨擦，土匪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军的物资、备装更为困难。铁道游击队打敌人布车，截获了很多布匹，上级命令陈鹏带一个排，牵几个毛驴去驮布，回来时遇上敌人，布匹和毛驴都丢了。布匹没得到解决，战士衣服无着落，无奈用羊毛纺纱织布，但毕竟受到原料限制，这种衣服只发给连以上干部，也用羊毛代棉絮棉衣，穿在身上羊毛都垂下来，不能挡寒。

回忆 鲁厚华（时任鲁中军区被服厂裁缝班长）

当时的生产材料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当地收购粗布（土布），大约占1/3；二是靠贸易公司到敌占区购买或以物易物，如去界湖、济南、青岛、烟台等地，从这些地方搞进来的多数是宽面的洋布；大约是1945年，在滨海搞了敌人一个货轮，全部是洋布。

染布的染料，有购进的化学染料，也用当地采摘的槐花、兰棵土法染色。衣服的式样，1943年以后是中山式，干部的上衣，上面两个荷包是贴缝的，下面两个是吊的，战士的四个荷包都是贴缝的。1943年以前是便装，只是有四个荷包罢了，没有翻领，1943年以后才改翻领。1941年以后干部才有大衣，团以上干部是比较好的棉大衣或皮大衣。衣服的颜色，冬天是黄的，夏天有一套是灰的，一套是黄的。

回忆 毛如峰（滨海军区劳动英雄）

当时，设备简陋，缝纫机有的是工人参加革命时带

出来的，有的是通过关系到敌区买来的，有的是作战缴获的，慢慢扩大起来。工人们是东一个西一个请来的。有前方来的，还有解放来的，逐步壮大起来。原料来自农村纺纱织布，染料从敌占区买来。没有厂房，分散在老百姓家，连像样的煤油灯也没有，点豆油灯，起早摸黑干。那时衣服规格，中式衫，上身四个口袋，比较简单，做冬衣要比作单衣难，棉衣不能多做，也不能早作，没有地方放，随做随发。但做少了也不行，因此，要在很短的时间，将衣服突击出来，难办的是棉花，弹好棉絮，套棉花靠老百姓和我们一起搞。总之过去战争时期生产，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工人的意志，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当时的生产任务。

回忆 王书敏（时任滨海军区被服总厂会计）

1945年夏末秋初，日本投降前，有一艘满载白细布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货船，在日照某沿海地区，投奔到我滨海军区。总厂接到上级的抢运命令后，立即组织力量，通过日照、莒南的党政机关，发动了大批民工，用手推车搬运，分散保存在虎园附近几个村内。抢运中，广大民工自带干粮，昼夜奔波。运完清点时，一点也没有少，可见当时根据地群众觉悟之高。这次行动，使滨海军区全体指战员，都穿上了细布军装。

回忆 刘曦（时任滨海军区鞋厂副指导员）

一到秋天，就要进行反扫荡了，那时规律，就是春季麦收前一次，秋季一次。反扫荡时，大家就武装起来，化整为零，参加到民兵、游击小组里面，分散到老百姓当中。没有情况，白天就拿出工具做工，晚上再藏起来，埋到猪圈里、夹壁墙里等。那时，为了便于工作，男同志穿长袍大褂，女同志就挽上小擻，扎上红带子，和老百姓一块活动。

回忆 李凤春（时任鲁南军区鞋厂班长）

在战争年代，为了解决生产能力不足，每逢做棉衣时，当地政府就组织妇女协助被服厂完成生产任务。被服厂将衣片缝好，由群众承担起铺花、紬棉、锁眼、钉扣等工作。平邑县有两位拥军模范花大娘和朱大娘，她俩每年八月十五刚过，便主动来工厂帮助做棉衣，她们说这是“回娘家”，来工厂夜以继日的干活，睡着潮湿的地铺，盖着棉衣休息。干活时花大娘以真挚朴实的话语鼓舞妇女群众：“姊妹们！前方战士为咱们拼命流血，咱们可得实心实意地把棉花铺匀，把针线缝密，要对得起亲人啊！”群众一直帮工厂做完棉衣才肯返回，每隔一段时间，要倒换，那些换走的人们，不愿走，走的送的都哭。年年如此，不取分文报酬。

文献 1947年11月20日《晋察冀日报》

【新华社华东16日电】秋风起，严霜降，此间各后勤

被服工人及广大妇女，为前线反攻大军赶制冬衣，并已于5日前全部突击完成，运往前方。……仅滨海莒南县之涝坡、柳沟各乡村，妇女3天内缝好3400件，坪上、蛟内、壮岗3个区妇女缝好2.3万件。

文献 1947年3月鲁中二地委二专署：关于赶做军鞋的通知

按区党委行署指示与省府函示：“为准备渡江，急需军鞋，各地做鞋任务需提前完成，决定二专区于三月底完成军鞋32万双。”兹规定如下：……④任务分配：沂南6万双，蒙山4万5千双，沂水6万双，沂东3万5千双，沂源5万双，蒙阴3万双……。⑤去冬22万双做鞋任务，未完成的县区须于最近完成。

文献 1949年1月27日鲁中南区二地委二专署：为按期完成九百万借粮任务给各县的指示

顷接区委行署指示，略谓：“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吃粮人数增加，粮食开支浩大，现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已结束。部队即准备过江，为争取全国彻底解放，必须保证前方粮食供应，为此特向沂蒙区借粮九百万斤。”为执行上述指示，特作如下决定：

甲、任务分配：根据各县群众负担能力及秋征灾荒情况，决定……，蒙山120万斤，蒙阴50万斤，沂南140万斤，沂东90万斤，沂中100万斤，沂源70万斤。

乙、领导问题：……由于群众刚交公粮田赋，过去借粮尚未归还，部分地区已发生灾荒，这是目前客观存在的困难。……

丙、掌握政策：一、在借粮办法上华东局规定不超过四八年秋季公粮的百分之卅（高粱谷子为主），但应掌握重点，不要平均分配，按地亩摊派。……

文献 1947年4月6日至6月19日沂源县用夫统计

担架2135副，用人10949人；小车4002辆，用人8313人；牲口24头，用人24人；挑夫人数14615人，合计人数33900人。合计工数1120849个。

说明：全县正半劳力30968人（正劳力18165人，半劳力12812人），共73天时间服务上数平均每人出夫362个工，而区村另拨，不经县批拨者，尚不在内，估计也有上数的二分之一，因此光经县批拨，按正半劳力两天就需要出夫一天。但驻用夫及运粮等任务，多是老头、小孩、妇女代替。

文献 1948年9月30日《蒙阴县坡里村战勤工作调查》

现在出夫编制：共九个班，分三等夫混合编制

一等夫49、二等夫46、三等夫44，共139夫。

条件：19岁—40岁，是一等夫；17岁—18岁和40岁—45岁为二等夫；16岁、45岁—50岁，三等夫。

生产情况：耕牛32头，现有11头；驴子44头，现有5头，能驮的只2头；羊300余个，现无；猪300余个，现100余个；酒店、油坊3个，骡子9头，现无有。

小车30余把，现两把，能用的一个；现在卖煎饼、豆腐等小生意的不少于以前；原不干活，现在干活的有13人。

现在全家土地产量普遍降低（孙文成），原种地7亩，以前每年打一石三斗，今年打九斗多，是中农。全村估计现在产量较前能降低20%。

评论 沈伟：人民最大——淮海战役大支前的启示

追寻淮海战役的胜利原因，从不同角度能得到不同的答案，但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对于解放军的支持和支援，民心所向，无往不胜。据战后的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山东、中原、华中和冀鲁豫四个地区，共出动支前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这些支前民工携带着20万副担架、88万辆大车小车、30万副挑子、76万头牲口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

费县民工王奎行，带着8名同伴，3次冲上火线，救了16名伤员，父亲病故也未能回家。莒南县担架队有2797名成员，1200人没有棉裤，1390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8趟，往返300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评论 王树增：《解放战争启示录》

解放战争中，我们不需要后勤部，后勤部就是老百姓；我们没有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就是大娘的炕头。

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他们彻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行军日志上永远有一句话“不得进村宿营”，这和共产党刚好相反。共产党的部队离村还有好几里地，孩子们就来迎接了，油灯就点上，大娘将热水烧好，百姓的炕头就是营房，很安全。

淮海战役时，常常是被围住的国民党集团军那边，到了晚上一片漆黑，什么灯光也没有，而包围圈外围全是火把。那是周边的数个省，江苏、河南、山东约590万老百姓推着小车、担着担子从小路走，连夜支前。如果从飞机上看，那是什么样的壮观情形？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

我常常阅读过去的史料并采访一些老人家。其中一位老人告诉我，他当时参加支前大军，推着小车，车上装着两发炮弹，从山东推到淮海战场，推了三四百里，半路上天一下雨，怕炮弹受潮打不响，他就把衣服脱下来盖在炮弹上。运到淮海战场后，组织上给他发钱，让他赶紧回家，但他并不急着回去，一定要在旁边看着炮弹打出去了才放心。

而国民党军那边呢，士兵中有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文献 1948年9月28日《莒沂县委关于两年兵源动员工作报告》

全县共404村，40023户，188022人。抗战后全县青壮年（18至35岁）数目为25503人，全县参军参政及参加其他工作8717人，现有青壮年17907人，根据农村的生产变化情况，还能出兵2734人。后备兵源：13—18岁的人员，全县尚有13161人；35—40岁人员，全县尚有5640人。

文献 粟裕（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象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呢？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山东民兵和地方武装直接歼敌灭匪即达六十九万余人。在野战军获取的巨



沂蒙大嫂担架队

大战绩中，也都包含着山东以及华东解放区其他地区的民兵、武装力量和全体人民群众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四亿二千五百多万公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团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鲁南战役后，我军原拟在南线继续歼敌，庞大数量的支前物资都已运往南线。由于敌情变化，我军为抓住有利战机，大量歼敌，决定改变作战部署，主力部队突然迅速北上围歼李仙洲。当时，我们最为担心的是粮草、弹药等能否及时转移。在这个长达一百七十余公里的战场上，几乎全靠人挑，畜驮、独轮小车装，要把数以亿万公斤计算的弹药物资运往前线，困难是很大的。但是，英雄的山东支前群众，毅然掉转方向，随军北上，以顽强的意志，高度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行动，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昼夜不停，将急需的粮弹和各种物资，及时转运到北线，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莱芜战役的胜利。

山东人民对战争的伟大支援，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参战兵力约六十万人。作战地域，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参战部队加速支前民工等每日需粮食数百万公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那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鲁中有一个区，预征一百万公斤粮食，群众却提前两天征粮六百一十五万公斤，超出原计划六倍。

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今天，当我们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踊跃参军

陈毅担架队

鲁光

“我陈毅死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他们在战争中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鲁南平邑一区担架队就是一个范例……”

——摘自陈毅同志在1959年青岛地方戏曲晋京汇报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当时，我在《鲁南时报》工作。有一段时间，我曾常驻平邑一区担架队进行采访报导。而后，由于战争需要，我又兼任过该队的教导员。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个队的队员们，不避艰险，英勇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参战支前任务，荣获了“陈毅担架队”的光荣称号。他们那种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几十年来，一直鼓舞和教育着我。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我和他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里，我追述了他们的一些英雄事迹和战斗生活片断，借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第一次任务

1947年1月初，著名的鲁南战役，在陈毅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已经全面展开。我们平邑一区由354人组成的担架队，已随军转战了七天七夜。第八天，担架队按照新四军部队总兵站的命令，开赴到兰陵西北，

傅山口附近的战场，接受任务。

大队长郭兴茂，按照前沿阵地部队首长的指示，将担架队布置在阵地后面的山腰上，并依照火线抢救、转移到包扎所和运送医院等项任务，把3个中队的力量配合好，让他们分散隐蔽。

负责组织火线抢救的二中队长高启文，家住毛家岭，土改后分得土地二亩半，当了农会委员，参加了共产党。从解放战争开始，他已是第三次自愿参战支前了。三次参战支前的实践，锻炼出了他英勇沉着性格和战地指挥的才能。他来到阵地后，立即观察了地形，把8副担架，42个队员，分别安置在山坡的沟边、坝根、坟地和大石底。选好了被抢救下来的伤员隐蔽地和向包扎所转移的安全路线，确定了前后调度的联络点，一切安排停当之后，他带领4个队员抬一副担架，来在前沿的石棚下，居高临下，瞭望着战场情况。

战场上空，乌云密布，接着就淅淅沥沥地落雨下来。雨，一阵紧过一阵，时而夹杂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担架队员们的衣服被淋得湿漉漉的，但谁也顾不得寻找个挡风避雨处。他们只是相互小声议论着：“这一仗是打快速纵队，还打坦克，可是个新鲜事呀！”高启文和队员们，两手不住地擦抹着脸上的雨水，好让自己的视野更广阔一些。这时，穷凶极恶的蒋军，向我发起了猖狂进攻，榴弹炮像发了疯似地狂叫，一排排的炮弹在我阵地上爆炸。顿时，火光四起，硝烟弥漫。

在炮火的掩护下，公路上出现了黑鸦鸦长龙似的一支敌人车队，影影绰绰可以看出一辆跟着一辆坦克的身影，横冲直撞地向我阵地开来。高启文对身旁的一位同志说：“快往后传，敌人的坦克来了，咱们的部队马上会反击，要做好抢救伤员的准备。”高启文的话刚说完，我军就发起了全面反攻。这时万炮齐鸣，枪声大作，密集的火力集中在敌人聚拢的一段开阔地里。敌人的车队被打乱了阵脚，有些汽车被击毁，燃起了熊熊烈火。从车里爬出来的蒋家官兵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窜。部分负隅顽抗的敌人，依仗着坦克的掩护，用轻重机枪向我部队猛烈扫射。伏在前沿的高启文，看到前方的一块平地里，我军二名战士中弹倒下，正吃力地向附近一个瓜棚里爬。凶恶的敌人用机枪向他爬行的方向疯狂扫射，妄图夺去他的生命。高启文见此情景，心急如焚，立即对担架队员们说：“不管多么危险，我们绝不能叫伤员再受第二次伤。你们做好接力准备，我到前边把伤员背下来……”说着，飞快向伤员伏卧处冲去。敌人发现了高启文，进一步加强了火力封锁，重机枪“咕咕咕”地狂叫，子弹从他的头顶掠过，帽子被子弹穿透，随风吹走了。在这生死关头，高启文

毫不畏惧，继续爬行。一颗炮弹飞来，他的额头被炮弹击起的乱石砸出了鲜血，手也被划破了。高启文忍着剧烈疼痛，爬至伤员身边。用右胳膊支撑着地，左胳膊夹抱着伤员，爬到瓜棚旁隐蔽下来。他简单地给伤员包扎了下，就背在身上，顺着地堰下坡往转运站上送。高启文一边背着伤员一边轻声问：“同志，这样背你合适吗？”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伤员激动得落下了眼泪，轻声回答：“好！好！”他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吃力地从裤袋里掏出沾着血迹的手帕，从背后伸过手来擦下高启文脸上的汗和血，又把手帕捂在高启文的伤口上。高启文把伤员转运到包扎所后，担架队员们都劝他休息。他微笑着回答说：“这算什么伤，在宿北战役时，咱们平邑一区担架队员张洪元，被一颗子弹穿过小腿肚，他一声没吭，自己包扎了下，又坚持去抬担架，直到完成任务才休息。”说罢，又转身回到了前沿阵地。

谁知，他刚走到瓜棚处，一颗炮弹在瓜棚顶上“咚”的一声爆炸了，小瓜棚炸塌了，把高启文埋盖了起来。他挣扎出来，向前望去，敌人的坦克逃了，我军正和敌人短兵相接。这时，他猛然发现在不远的沟崖山上，我军一个战士正与敌兵格斗。敌兵居高临下，气焰嚣张，我军战士只能招架，不能还手。高启文顺手摸起地上的檩棒，飞奔到敌兵背后，向他的腿弯处猛力一击，敌兵应声而倒。这位战士来了个顺手牵羊，抓着敌兵的脚脖，扔下沟去。战士对高启文非常感激和敬佩，他竖起大拇指，说了声：“好，山东同志是好样的！”就要去追击敌人。高启文一把拉住，急切地说：“同志，前沿阵地上有无伤号？”这位战士，一边跑一边回答：“有！伤号就在前边一条沟里隐蔽着。”

高启文按照战士指点的方向来到沟底，只见杂草丛生的坟莹地里躺着一个伤员。走到跟前，他愣住了——这位同志已经停止了呼吸。他颤抖双手，不住地抚摸着烈士的遗体，帮烈士整理整理军帽，又掏出了裹煎饼的包布，擦着烈士脸上的血迹和烈士手上脚上的泥浆……接着，把烈士抱了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担架队走去。他走到坟莹地当中时，看到了一个伤员。他赶忙放下怀中的烈士，脱下褂子盖上他的遗容，然后蹲在伤员身边。这位伤员胸部、腿部两处受伤，身体转动很困难。他颤动着干裂的嘴唇，发出低微的声音：“同志！你刚才做的事，我都看见啦，你真是伤员的亲人啊！”高启文含悲忍泪地说：“同志！我来迟了，让你多受了罪，实在对不起你啊。”说着就要去抱伤员。伤员摇了摇头，把手中的毛巾递给高启文说：“用这块新毛巾给烈士蒙面，把你的褂子替下来穿在身上取暖，咱们还要继续战斗啊！”这



时，担架队员们抬着担架，赶上来了，高启文立即把烈士和伤员送上担架，迅速向后方转运。

转运路上结深情

敌人的快速纵队遭到致命打击后，扭头向南逃走。我军遵照陈毅司令员的命令，乘胜追击。战争向峰县、枣庄方向推进。一区担架队紧紧跟随部队，急行70里，来到了泥沟附近的战场。

泥沟是个比较大的集镇，通向峰县的铁路从这里穿过。被我军击溃的敌军与盘据在这里的敌军汇合，在铁路两侧的村落安营扎寨，收拢整顿残军，据守峰县、枣庄，待机反扑。我军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一场激烈的夜战在铁路两侧打响了。在总兵站的指挥下，郭兴茂带领一、三中队的18副担架，沿泥沟向西冲上了战场，高启文和军属模范颜继平带领20副担架，沿泥沟向西北方向的阵地冲去！

当高启文和颜继平冲到公路西北侧的前沿阵地后，3个村落的敌人已被打散，散兵在黑夜里乱跑乱窜。我军已转移阵地，继续围歼另外几个村落的敌人。高启文和颜继平带着80个担架队员和15个民兵，忙着打扫战场，救护伤员，组织转运。

天黑得像一口大黑锅，伸手不见五指。村中的房屋已被敌人烧成灰烬，只有残余的檩棒头还时而飞出点点火星。高启文举着火把，奔走在村落的里里外外寻找伤员。军属模范颜继平，已年过50，腿脚眼神虽有些不济，但精神却十分旺盛。他紧跟在高启文的后面四下搜索。在墙角下，他发现一个昏迷不醒的伤员在呻吟，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水……水……”颜继平忙跑过去，一手揽抱着伤员的头部，一手取下盛着温开水的小壶，一口一口地向伤员口里送。等伤员清醒过来后，高启文马上喊过一副担架，把伤员送走。高启文和颜继平领着担架队踩着断砖碎瓦，跨越敌人的尸体，继续寻找伤员。他们在沟沿上发现了一位受伤的同志，衣袖上还燃着火星，冒着烟。颜继平扑过去，把火搓灭。忽然“咯、咯、咯”一阵机枪声传来，高启文一面命令民兵注视发枪的方向，一面催促担架队将伤员迅速运走，接着他就去找颜继平。那知，颜继平听到枪声，往后一躲，两脚踩了个空，他与抱着的伤员一起，跌滚下去。高启文赶忙带着两副担架到沟底寻找。

随着一阵机枪的叫声，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高启文断定这是突围的敌人与他们的部队联系。没隔多长时间，这股突围的敌人就向着担架队转运伤员的村庄扑来。高启文命令民兵开枪，一阵排枪、手榴弹打过去，

敌人不但没有被打退，还逐渐逼近了村落，情况十分危急。高启文一面让担架队赶快抬着伤员转移，一面带领民兵抗击敌人，直到担架队安全脱险。

高启文带领担架队离开这个村庄之后，时值深夜。天空中的乌云，被阵阵北风渐渐驱散，月牙儿穿过稀薄的云层，发出淡淡的光彩。一区担架队，在月光下，沿着转运伤员的路标，一气走了30多里，才在一个村头上休息。

月光下护理伤员的情景更加动人。有的给伤员喂水、喂饭，有的帮伤员解大小便，有的整理担架、铺叠衣服，有的问候伤员疼痛、寒暖。高启文抬的这副担架上的伤员，身受多处重伤。高启文帮伤员翻了个身。这时他发现伤员好像要大小便。为了让亲人减少痛苦，他让伤员躺在担架上，解开系在自己腰带上的茶缸和饭瓢，用来接大小便。伤员连连摇头，坚决不肯，高启文耐心地说：“都是自己的同志，别不好意思。”

班长陈照本和他带领的3副担架，是爱护伤员的先进集体。队员之间掀起了立功竞赛，保证不让伤员渴着、饿着、冻着。今天，他们虽然只吃了一顿早饭，却凑起钱来买了鸡蛋、油条、花生等食物，保证伤员吃上三餐。有些重伤员大小便不方便，陈照本、岳文斌、赵永楷等同志就用自己的茶缸、毛巾、帽子给伤员接尿、接尿。

一区担架队里有杨凤鸣等4个回民队员，抬的伤员也是个回族同志。他们之间越拉越热，越谈越亲切，从穆斯林、多斯蒂尔，一直谈到风俗习惯。伤员早已忘记了疼痛，兴致勃勃地问道：“你们那里回汉两族团结吗？回族生活怎么样？”杨凤鸣回答说：“自从来了共产党，一切都变了样，回民汉民一样增加工资，分配土地，参加群众团体，生活改善了，回汉人民很团结。旧社会的那种大汉族欺压少数民族的现象没有了。”回民伤员听了夸赞地说：“平邑一区支前工作发动得真广泛，连我们回民也发动起来了。”杨凤鸣点了点头接着说：“蒋介石反动派是各族人民的公敌，要保住咱们回民得到的利益，就要与汉族同胞团结在一起，跟敌人拼到底。”说到这里，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封信，告诉那位回民伤员：“这就是俺村回族父老兄妹联名给我写来的信，要我在前线立功，给回民争光。”说着，他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封信，还有一双鞋：“这是俺村姊妹团团团长苟志英单独写的信，亲手做的鞋。信上写着，如果在前线遇到了回民战士，就送给他这双鞋，表示咱回民对他们的期望和慰问。这回可巧啦，咱们回民同志在战场上遇在一起了，这双慰问鞋就送给你吧！”还没等回族伤员同意，他们就七手八脚地把鞋给他穿上了。

月光下，担架队员刘起顺跟他抬的伤员热乎乎地拉呱。他按上了袋烟，吸了一口，擦了擦烟嘴，正要往伤员嘴里送，调皮的小于急忙跑来夺过烟袋，把一支香烟送到伤员嘴边，点好烟，回过头来问刘起顺：“刘老伯，你累吧？”刘起顺笑了笑：“咱就是不知道害累！”小于把大拇指一竖：“真不愧是老模范。”伤员一听刘起顺是个模范，以敬慕的眼光看了看他，接着问道：“老伯伯在乡村里做什么工作呀？”刘起顺没有思想准备，经伤员这么一问立时卡了壳，他“哦，哦”几声，也没有说出句话来。口快心直的小于，马上把话接过去：“他家住八埠庄，是个小地主，外号叫‘刘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和他进行过讲理斗争。后来，他在农会帮助下，进步很大。自从反动派发动内战，他就积极报名，参加支前，两次来到前线。宿北战役时，他抢救了两个伤员，被评为抢救模范……”小于这一讲，那个伤员惊奇地从担架上坐起来，问道：“听说解放区里把地主都斗死啦，怎么还能当模范呢？”刘起顺和小于一听这话愣住了。伤员见此情景赶忙解释：

“不瞒您说，我是个刚解放不久的新战士，不了解解放区的情况，那些话都是听当官的说的！”刘起顺听罢这话，坦率地说：“那纯是造谣。咱平邑一区担架队，这次参加支前的地主、富农就占百分之二十。共产党的干部对我们和对其他担架队员一样，只要做出了成绩，对战争有了贡献，就表扬鼓励。就拿我来说吧，在支前中才做了那么点工作，区里县里都表扬，新四军的首长还给我戴了大红花。《鲁南时报》、《大众日报》还给我登了报，题目是《访刘善人》，把我的外号也登上了……”在一阵欢笑声中，担架队又开始启程了。

担架队沿着路标继续向目的地前进。来在一条大河旁，通向彼岸的桥梁，已被敌机炸毁，河边的浅水处结了冰。中流水深，到人腰间。如果在天亮之前过不去河，担架队就有遭受敌机轰炸的危险，伤员的安全也很难保证。为了胜利地完成渡河任务，队员们在附近村庄的群众支持下，把小学的课桌抬出来当桥墩，把门板和上课的黑板摘下来铺桥面，搭架起来一座临时浮桥。桥头上只有一张教桌当桥墩，不够牢稳，队员们就分列两边，用手照扶着。太阳升起的时候，担架队员们顺利地渡过了大河，满怀胜利的喜悦完成了转运任务。

路过家门而不入

历时18天的鲁南战役结束了。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攻克了枣庄、峄县，活捉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第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计歼敌2个整编

师，1个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在整个战役中，我一区担架队随军跋涉1个月零5天，火线抢救和连续转运伤员4次，往返行程500多里。在战斗最紧张时刻，曾三天两夜没有睡觉，两天中只吃了两顿饭。一中队150人，因没饭吃，一天喝过九锅开水。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任务完成得却非常出色。

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一区担架队，在新四军“0一”部队总兵站的领导下进行了总结评比。全队记一等功的72人，记二等功的175人，三等功的40人，其他均受到口头表扬。还评选出高启文、陈照本、孙克厚、刘东文、刘洪章、丁自成、公茂才、刘起顺等一批英雄模范人物。接着总兵站举行了庆功授奖大会。田站长代表“0一”部队总兵站，授予“平邑一区模范担架队”奖旗一面，宣布被评选的模范名单，并宣读了鲁南八师的慰问信。信中指出：“在这次参加鲁南战役的担架队中，平邑县一区担架队表现最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宣读了鲁南专署对平邑县一区担架队的嘉奖令，并颁发了奖旗一面。在一阵阵“向平邑一区担架队学习”的口号声中，驻村姊妹团给模范们献了鲜花。

庆功大会之后，一区担架队，继续跟随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1947年2月，他们随军参加莱芜战役，在风雪中急速行军，爬过高山峻岭，渡过沂河汶水，继续北上。这天夜晚，担架队员们要从自己的家门口——平邑镇通过了，大家心情非常激动。他们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多么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邻呀！又多么热望把在前线参战的情况讲给乡亲们听听啊！……可是，当他们想到兵贵神速，赢得时间，就能赢得大会战的胜利时，就自觉地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决心“不请假”，“不掉队”，“路过家门而不入”。他们举着“平邑一区模范担架队”的大红旗，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自己的家门——平邑镇前进。

平邑一区区委早已接到担架队要从家门路过的通知，并作了充分准备。由全镇群众、担架队员家属和县、区、村干部组成了1000余人的慰问团，打着灯笼，举着火把，敲锣打鼓，吹着唢呐，走出了5里多路，迎接自己的亲人。担架队员们踏着自己家乡的土地前进，心里翻卷着激动的浪花。眼前的一切是那么亲切熟悉，就是家乡的空气也是特别的气味。在一片无比欢乐的气氛中，担架队员和乡亲们见面了。欢迎的人群拥进了担架队的行列，替队员们扛担架，拿衣物，两伙人排成了四路纵队，边走边谈。

区委书记孔宪美，挑着咸菜、烟丝、粉皮、粉条与郭兴茂一起走在担架队的最前面。他们亲切交谈着当时的战局和以后的工作。高启文村里的干部和担架队员的

家属也带着黄烟、咸菜和慰问金来了。亲人见面，高兴得都不知说什么好。村里的干部对高启文说：“你家大嫂走亲戚去了，没来迎你。”高启文心中一沉，想起担架队临出发时的情景：他胸戴大红花走在担架队里，他的妻子孙以莲接过他肩上的担架，笑着说：“你可别挂念家啊！”高启文看了她一眼说：“看你，尽说些啥哟！”孙以莲白瞪了他一眼：“说啥，又不是拉你的后腿，还不是叫你一心支前。妇救会跟支前的都挑战了，你能扛到支前红旗吗？”高启文听出她是在挑战，不甘示弱地说：“俺完不成任务决不回家。”孙以莲高兴地说：“俺也保证，一定多做军鞋，种好地，磨白面，碾小米，一心支援前方打胜仗。”两个正在谈着，不防一个小伙子嚷起来：“高启文和他媳妇挑战啦，大家快来听听。”紧接着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高启文想着，走着，从背包里拿出一双红色的线袜子递给村干部：“她就稀罕这种袜子。捎给她，让她外出办事时穿一穿。”这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欢迎担架队的队伍里，还有从8里路以外赶来的丁立本和刘起顺的老伴。丁立本的老伴提了一壶酒，夹着一包吃的东西，一见面就喊着：“老东西，辛苦了，过过酒瘾吧！”丁立本一摆手：“喝酒会误事！忌酒啦！等胜利了，立功回家再喝。”接着又交代老伴要保重身体。丁立本的老伴高兴地回答：“你放心吧！村里对咱照顾很好，咱家大门口挂了支前光荣灯，你要争取功上再加功呀！”刘起顺虽然已是50多岁的年纪，可还学着南方人的口音对老伴开玩笑，并将一条新毛巾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老伴。担架队员和乡亲们就是这样谈论着前线的胜利、家乡的变化走进了平邑镇。

平邑镇的大街上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模范担架队！”“坚决支援前线！”的口号此起彼伏。1000多名乡亲把担架队送出城外3里多路。临分别时，乡亲们一再嘱托担架队员们“向陈毅司令员问好！”“向新四军同志们问好！”

莱芜战役建新功

一区担架队路过家门而不入，胜利完成了急行军任务，临近了莱芜战场。这天下午，他们接到一个特急命令，天黑之前赶到指定地点。为按时到达，必须破除惯例——白天行军。白天行军的最大威胁，是敌机空袭。过去我们曾吃过这方面的亏。那还是在宿北战役的时候，一区担架队遭受过敌机的疯狂轰炸，受伤11人，牺牲3人。从这以后，我们接受了教



向淮海战役前线运送军火、物资

训，每逢白天行军，除队员们做好伪装之外，每个中队还派一名队员为“瞭望哨”，担负瞭望敌机、发信号的任务。这次二中队的“瞭望哨”是林传德。

提起林传德，在一区担架队里也是个受称赞的人物。在宿北担架队遭到敌机轰炸时，他们村里就有两个队员负伤，一个队员牺牲。这个牺牲了的队员叫林传江，就是林传德的哥哥。林传江临终时对高启文说：“我死后，要把我送回原籍埋葬，顺便交代我的家属和众乡亲，不要难过，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就应该老爹战死了儿子上，哥哥战死了弟弟上，前仆后继地支援前线。告诉我弟弟，我死后，要他到前线来替我继续战斗！”高启文把林传江的遗言，告诉了他全家和全村的乡亲。当天夜里，全村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他弟弟林传德当场报名上前线。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当夜就有16人争先报名参战支前，接着就赶来参加了担架队。

这次林传德被选派为“瞭望哨”之后，和高启文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俩瞭望着天空，观察两旁的地形。不多一会来到村边一个场园。场上有两垛干草，场中停放着9辆独轮小车，车上装满了子弹箱和炮弹箱。突然，从东南方向飘来了几个小黑点，林传德和高启文已警觉到是敌机飞来了，马上吹起了防空的哨音，就地疏散隐蔽。一眨眼的工夫，那几个小黑点就象黑老鸱那么大了，随后又传来了嗡嗡的响声。3架敌机围着村庄盘旋了两圈，随即俯冲下来，扫射了一阵机枪，接着又掷下两颗炸弹。场园里的草垛冒出了黑烟，燃起了大火。火苗随时威胁着盛放炮弹的小车。林传德心如火燎，他焦急地对高启文说：“危险！如果大火引起炮弹爆炸，不光隐蔽在广场周围的担架队员和村内居民将遭受重大伤亡，也损失了前线急需的弹药！”高启文眼望着扑向炮弹箱的火势，又看了看盘旋在上空轮番俯射的敌机，喊了声：“同志们，跟我来！”就象离弦之箭，冲到装载炮弹的小车跟前，推起一辆就走，把炮弹运到沟底。当高启文再次返回场园时，只见林传德、刘起顺也每人推着一辆小车，跑到了安全地带。此时，敌机俯冲扫射不止，大火越来越猛地扑向小车上的炮弹箱。队员们奋不顾身地扑灭大火，有的脸上烧起了一个一个燎泡。在这次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弹药的行动中，有6名队员壮烈牺牲，4名队员身受重伤。徐得治带着胸部重伤说了句：“启文哥，给陈毅司令员上个建议，咱们要造飞机呀。”就昏倒在弹药车旁，停止了呼吸，箱子已被鲜血染红了。

敌机飞走了，总兵站在战地召开了追悼会，表彰了烈士们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担架队员们擦干了身

上的血迹，运走了同伴的遗体，安置了受伤的同志，昂首阔步奔向莱芜前线。

在著名的莱芜战役中，一区担架队紧随新四军“0一”部队浴血奋战，除胜利完成了转运伤病员的任务外，还积极参战捉拿俘虏，3天内就捉获俘虏215人。

莱芜战役从2月20日开始至23日下午为止，不到3天就胜利结束了，共歼敌7个师，6万多人，活捉了蒋军北路总指挥李仙洲。这一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创造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最高纪录。为此，陈毅司令员曾挥笔写下了《莱芜大捷》：

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

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岗志伟功。

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

堪笑顽酋成面缚，叩头请罪罪凶凶。

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后，平邑县担架队在总兵站的领导下进行总评。一区担架队被评为“陈毅担架队”，全区354名队员集体记大功一次，高启文、刘起顺、郭继龙、于清云等10人被评为模范担架队员。担架队领导人邵泽成、郭兴茂各记特等功一次。总兵站召开了庆功大会，会上，向一区担架队颁发了“陈毅担架队”锦旗。鲁南支前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第一号嘉奖令，内称“……平邑一区担架队，在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中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创造了辉煌成绩，荣获了‘陈毅担架队’的光荣称号……”

莱芜战役结束后，一区担架队服役期满，光荣返里。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后来又参加了平邑县组织的支前常备担架营和常备运输营，在鲁南担架运输团的领导下，于1947年3月又奔赴前线，继续参战服役。先后随军参加了鲁中、泰安、沙土集、宿县等10多次战役，直到淮海战役结束。特别是在大反攻开始后，他们又随军外线出击，两过津浦路，三跨陇海路，一渡黄河，绕过冀、鲁、苏、豫、皖五省，行程9620里，未丢掉一个伤员，又荣获了“陈毅担架营”和“陈毅运输营”的光荣称号。担架队员高启文被评为华东支前担架英雄，刘起顺等13人被评为鲁南地区支前担架特等功臣。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沂蒙山根据地的首要功绩在于为中国革命与建设贡献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子弟兵。抗日战争中，沂蒙山区成立了鲁南、滨海、鲁中三个军区，输送了五个野战师的抗日健儿。解放战争中，沂蒙山区成军五个纵队（军），南征北战，彪炳千秋。时至今日，在祖国的边防、海防，仍有三个整装集团军来自沂蒙山区，他们是沂蒙人民的骄傲和自豪，下面三篇文章作为一个系列，再现了从沂蒙走出的铁军风采。

赫赫老八纵 雄师下沂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集团军征战历程

李千排

一支英雄的部队被历史的尘沙湮没了许多，以致引起诸多误解和猜疑。笔者不是研究军史的，但对这支部队比较熟悉，希望通过拙笔一支，尽量展示他的真实面貌。

一、沂蒙子弟

人民解放军第26军的前身即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是由抗战时期八路军鲁中军区所属部队编成，绝大多数官兵为鲁中山区土生土长、朴实无华的沂蒙子弟。鲁中地区历史上就一直很贫穷，却出战士。抗战时胡奇才将军到了鲁中，发现属下是这么好的战士，曾高兴得不能自己。



鲁中军区参谋长胡奇才指挥第二团，在临朐县冶原歼灭日军一个小队

这支由开国上将王建安、开国中将张仁初一手带训出来的主力部队，军纪严明，作风强悍，攻防兼备，战斗力极强，尤以攻坚、山地作战见长。该部是华野主力纵队，善打大仗、恶仗、硬仗，冲锋在前，屡建功勋，深得统帅部的信任。

该军所属22师前身为1941年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旅，1945年大反攻时整编为八路军山东4师，系鲁中军区老部队，战斗经验丰富，极善抗击作战；23师前身为1945年11月由鲁中军区警2旅、警3旅编成的八路军山东9师，该师富有朝气，攻坚能力很强；24师前身为1946年6月成立的鲁中警备旅，该师成立晚，进步快，防御作战中战力不俗。

“老八纵”是沂蒙乡亲对这支部队昵称。沂蒙乡亲、八纵官兵、八纵的对手，都这么叫，叫得亲切，叫得自豪，叫得敬畏。鲁中的百姓非常喜爱这支由自己的亲人子弟组成的队伍，部队转战鲁中时，官兵的亲属组成了庞大的“亲友团”，走哪跟哪。及至后来成立主要由沂蒙子弟组成的华野鲁中南纵队时，干脆称之为“新八纵”。

二、风雪鲁南

鲁中4师、9师组建后即征战不止。攻占鲁中要地淄川、博山，解放重要据点张店、周村，奔赴胶济路阻击战，淄博地区保卫战，取胜文埠，攻克安邱。在张店、周村战斗中，鲁中干部教导队与王耀武从济南派援的国军干部教导队狭路相逢，全歼了这支国军军官队伍，自身无一伤亡。

1946年底，4师、9师南下，参加鲁南会战，编入由王建安司令指挥的右纵队，割裂敌防御左翼，切断敌退路，攻克太子堂，消灭国民党军整44旅，之后，协同友军，全歼第1快速纵队，联手8师，攻克峄县。

此战，12个小时消灭敌整44旅，6个小时攻克峄县，充分展示了鲁中的部队其攻坚的特长，给初识鲁中八路的粟裕将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莱芜建功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八纵亦正式成立。下辖22、23、24师，一个炮兵团，一个新兵团，装备也定了型。以69团为例，下辖三个步兵营，1营全日式装备，戴日本钢盔，持三八长枪，2营全捷克式装备，3营全美式装备。每连9挺轻机枪，每营一个机跑连，三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火力已能与国军主力相抗衡。而

且，连长有挑夫，营长有马骑，可谓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一成立即投入大兵团作战。

莱芜战役中，22师65团2营营长鹿正明打响了莱芜战役第一枪，八纵先是与九纵合作消灭了国军77师，之后转兵莱芜城北，突击北躐之敌。

此战，八纵转战两处，生俘李仙洲，出色地完成了战场任务，尽显主力姿容，粟司令表彰八纵“功劳不小”。

四、钢铁蒙山路

莱芜战役后，为保障泰安战役的顺利实施，八纵随即进行了蒙山要冲防御作战，抗击援敌，与包括整74师在内的各路国民党军迭次交锋。头一次碰上这等强悍的对手，各路国军纷纷传告：“千发炮弹打不动，定是山东老八纵”。

这一阶段，八纵各师交替上阵，经受住了敌人疯狂炮火的考验，在山地宽大正面防御作战中得到了很大锻炼，技战术水平逐渐提高，大兵团作战经验日趋丰富，而且，八纵还成就了我军历史上的又一传奇。

黄崖山战斗中，24师72团3营7连阻击整74师两个团的进攻，歼敌近千，1排坚守主峰，小小的山头落了几千发炮弹！打退敌人11次进攻后，1排只剩下排长朱际昌、卫生员韩成山、战士高明生、王辉亮4人，弹药已经打光。老八纵的人都是硬汉子，没有怕死的，面对再次冲上来的敌人，4个人手挽手，纵身跳下了高高的黄崖山！韩成山活了下来，意想不到地成为了“活烈士”。几十年后，老英雄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碑前，面对着众多的烈士姓名中“韩成山”三个字，回想起炮火纷飞年代里牺牲的战友，老泪纵横！

五、孟良崮上皆英豪

1947年5月13日，华野的老战士们都不会忘了这个日子。这一天，华野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全军扑上，在狭小的战场与优势敌军扭打成一团，最终全歼国军一等主力整74师，使孟良崮战役成为我军战史上极具光彩的篇章。

此战，八纵与一纵分别执行左右两翼的战役穿插任务，加上飞兵而至的六纵，硬是把整74师从国军阵列中央剜割出来，之后，一面进攻，一面阻援，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纵参加总攻的是攻坚猛将陈宏率领的23师，连个预备队都没留，倾家荡产玩命冲锋，一路血战，一路突



进，连克战场要点桃花山、磊石山、万泉山、芦山，脚步不停一气不歇一直杀上孟良崮，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威风！

六、纵横中原

1947年7月，八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泰安，全歼守敌，打响了外线出击的第一枪。之后，为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以利刘邓大军在鲁西南顺利歼敌，和三纵一起冒着大雨，强攻济宁；继而，主攻沙土集，在段庄、徐庄交战中，22师64团以极小的代价，全歼守敌，创造了我军一个步兵团消灭敌一个步兵团的村落进攻战范例。

一路凯歌的老八纵没想到在土山集和菏泽碰了两个钉子。几昼夜的攻击，均未奏效，徒遭伤亡，恨恨撤离。

遭受挫折的阴霾没几天就被接踵而至的胜利冲没了。八纵和兄弟部队一起，摧城拔寨，扫荡中原，大破陇海路，纵横豫皖苏。攻陈留，战周口，陷扶沟，下典黄，连克通许朱仙镇，横扫平汉野鸡岗，攻占许昌，旌旗指处，所向披靡。

此间，八纵司令由别称“张疯子”的猛勇战将张仁初接任。3月，部队北上，参加洛阳战役。

洛阳战役有一特别之处，即援军太强，守军太弱。战前动员打洛阳，八纵各部欢声雷动。其实根本无须动员，也不知怎的老兵们都知道洛阳守军是些青年学生，没什么战斗经验，装备很好，中看不中用。可八纵发扬风格，把吃肥肉的美差让给了兄弟部队三纵，自己啃骨头，挑起了抗击强援的重任。此战中，八纵强攻黑石关，先在洛阳以东芝田镇、山神庙、衣架窝、堤东一线，后于吴义沟、谷城、白马寺地区，历经八昼夜逐次抗击，浴血奋战，连22师副师长李迎希也端起长枪，扑入一线，成了普通一兵，保障了洛阳战役的顺利进行。

七、豫东称雄

1948年6月进行的豫东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恶仗，首创关内我军攻克坚固设防的省会大城市。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歼敌数量空前，对围歼之敌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了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显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敌人已完全失去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

老八纵在这次空前的大会战中，披坚执锐，攻无不

取；一身三任，大展雄风。先取坚城，大破开封府；继抗强援，硬拼邱清泉；战不旋踵，不顾疲劳伤亡，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组建突击集团，协同兄弟部队，铁拳砸烂区兵团，表现出超常的连续作战能力和勇猛强悍的攻击作风，创建了卓越的功勋！

第一阶段开封攻坚。扫清开封外围后，三、八两纵兵临开封城下。大战在即，司令员张仁初亲临主攻小南门的23师69团指挥所，督励攻城：“打进开封府，创造英雄的开封营！”69团3营负责突破，1营负责打纵深。8连在半个小时里，连续爆破11次，成功炸开突破口，突击队7连1排在英雄连长孟宪文的率领下，一鼓作气，5分钟即旋风般登上小南门城楼，就地抗击敌人的反扑，死战不退，后续部队相继突入。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部队建制被打乱，干部接连伤亡，危急时刻，1营1连1排排长王平东挺身而出：“所有人员听我指挥，坚决反击，决不后退！”经过无比血腥的拼杀，粉碎了敌人的反扑，跟进突击，一路追杀，一直打到钟鼓楼。之后，22师65团和三纵的部队一起，强攻硬打，夺下龙亭，为开封之战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战后，因负责突破的3营伤亡较重，治军极严的“张疯子”根本就不予申报“开封营”，还险些把一个营长枪毙。这个营长是个英雄，但还是被罚去给“张疯子”当挑夫，一直挑到淮海战役，才被恢复职务。

第二阶段大战睢杞。攻克开封后，三、八两纵即刻赶赴睢杞，和十纵、二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阻击来援的邱清泉兵团，保障粟裕指挥一、四、六纵队和中野十一纵组成的突击集团消灭区寿年兵团。面对急匆匆赶来的邱清泉兵团，八纵在通许至王司砦地区3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以坚决固守、积极抗击和连续不断的反冲击，阻滞了5军的轮番猛攻，使其四天里只前进了五公里。22师64团团团长高文然更是出其不意，猛吹冲锋号，全团出击，亡命冲锋，近战肉搏，把没一点思想准备的5军官兵当头一棒打懵，糊里糊涂败下阵去。为尽快消灭被围之敌，实现战役转折，粟裕果断调整部署，点兵八纵，命其抽调精锐，编入突击集团，参加歼区作战；并调一纵一部，东向阻击驰援的黄百韬兵团。八纵没有辜负统帅的信任，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和伤亡，坚决地执行了命令，显示了极高的大兵团战斗素养。以22师65、66团及特务团、71团继续防御，张仁初司令和王一平政委亲率23师、22师64团及70团急驰战场，以攻坚力最强的67团协同六纵17师猛烈攻击何旗屯，4小时即全歼敌48团2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以64、68、70团向榆厢铺之敌发起攻击，只一个小时，即将敌47团全部及48团1个营一口吞下。如此，粟司令重获机动。一声令

下，我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排山倒海般的全线猛攻，在黄百韬倍感生还无望，苦苦挣扎之际，粟大将军轻提铁骑，拧身撤离。

留下的，是我军战史又一光辉灿烂的篇章！

八、攻济打援

1948年9月，八纵参加济南战役，编入南线打援集团，眼巴巴的看着北线兄弟部队的山东老乡们痛打王耀武。

只是，济南在短短八天内即被攻取，出援敌军慑于我军强大的打援阵容，未敢轻动。南线决战，打而未响。

九、淮海千秋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华野全军南下，扑向黄百韬兵团。八纵23师69团30多个小时没有埋锅造饭，急行军冲至运河铁桥，2营扑入冰冷的河水，泅渡攻击。鉴于该团抢占运河，全歼守敌44师大部，为大军西进打开了通道，为迅速合围黄兵团赢得了时间，纵队立即向69团颁发了嘉奖令。新华社以“运河桥头争夺战，围歼黄匪立首功”为题，播发了该团的事迹。

与此同时，华野山东兵团乘何、张起义之机，南下攻夺万年闸、曹老集，切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我军各部立即从四面八方开展攻击。八纵各部仍保持着追击的势头，与敌64军、44军一部展开惨烈的逐村争夺战。以野战冲击对坚固设防之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22师65、66团就在唐家楼遭受了重大伤亡，66团政委李树桐牺牲在反复冲杀的第一线。老八纵的战士没有气馁，立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火线战评，调整建制和部署，奋起再战，终以我军的顽强压倒了敌人的顽抗，全歼国民党军“精锐”64军475团。

黄百韬的兵团部碾庄暴露在我军的进攻矛头之前。八纵67团与九纵73团“济南第一团”并肩突击。开战30分钟，67团9连率先突破，撕开口子后立刻分兵去接应73团的突破口，两个团潮水般涌入碾庄。67团9连战功卓著，被授予“碾庄突击模范连”。

碾庄失守后，64军剩余部队仍占据几个村落，拼命顽抗，死不投降。八纵再鼓胜勇，连续突击，将其扫除干净，为淮海战役最艰难的第一阶段划上了胜利的句号。

第三阶段，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却被华野追击包围。八纵位于包围圈的西南方向，首当敌夺路而逃的要冲。孙元良兵团独自突围，闯入八纵阵地，遭我军夹击，顷刻间灰飞烟灭。

总攻发起后，八纵和友邻部队一起，彻底消灭了面前

的老冤家第5军。至此，闻名天下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十、辉煌大上海

1949年2月，八纵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

渡江战役中，26军是二梯队。渡江后立刻投入郎广大追击。继而转兵东向，直扑大上海。

由陈毅、粟裕于1949年5月10日签发的《第3野战军淞沪战役命令》中有如下内容“……四、注意事项：

（一）在我开进或攻占指定地区后，敌人溃乱或和平解决时，我各部应按警备区分，以20、26、27军进入上海市区，其余各部均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在攻占上海时，除担任市区警备三个军外，其余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撤出市区。……”

攻占上海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枪声未响，三野即已明令参战的三野大军中只有20、26、27这三个军能进入市区作战并担负警备任务，表明统帅们对这三个军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强劲的战力是充分了解、肯定和信任的。

面对国民党军中唯一没有伤筋动骨的陈诚系统主力54军，26军虎虎生威：78师一箭定昆山，77师突贯小南翔，76师更是连接民船400只，沿苏州河浩荡东进。全军齐出，蔚为壮观。一路豪夺嘉定、国际无线电台、大场、真如、江湾机场，从苏州河北侧冲入大上海市区。

5月26日，上海战役结束。第三野战军共歼敌15万。其中，26军伤2331人，亡381人，歼敌42911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后不久，粟裕司令员受命中央，以三野的12个军组织攻台军。26军和20、23、27军一起，担负攻台军第一梯队。在渡海攻击台湾这么重大的战略行动中充当开路先锋，在统帅心中，这4个军无疑是三野战斗力最强的一等主力。

十一、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9兵团改编成志愿军9兵团，率20、26、27军跨过了鸭绿江。

在二次战役中，26军没有按时赶到指定位置，痛失歼灭美陆战1师的机会。26军开始作为9兵团预备队，后又充任整个志愿军预备队，兼顾东西两线。在东线发现兵力不足时，26军离战场有数日行程。在零下40度的苦寒中，穿着南方薄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其状之惨根本就不象一支刚上阵的生力军。不少人耳朵被树枝碰掉，脱鞋时能把脚整个带下来。更惨的是狼林山



26军在进攻中

脉人烟稀少，粮食又被先头两个军扫荡一空，整排整连的钢铁战士冻饿而毙。配发的作战地图错误百出，连长津湖都没标出来。

即便如此，26军的老战士们仍然凭着超常的意志，驱动着瑟缩的身躯，榨出了身上最后一丝精血，投入了截击美军的战斗，部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1951年3月15日，为阻滞敌军进攻，争取时间，掩护大部队的开进，以进行决定性的第5次战役，26军赶赴抱川、涟川地区，遂行防御任务。

谁也没想到，26军这一上来，就坚持了38天！钢风血雨的38个昼夜里，26军经受住了包括空降突击在内的各种攻击，经受住了铺天盖地的炮火，不仅完成了任务，甚至还保存了突击力量，在更大规模的5次战役中再次被编入突击集团。

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一个军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的陆空炮火，在其攻击正面坚决抗击达38天之久，始终保持了机动，保存了有生力量，这简直就是奇迹！

26军非凡的表现给陌生的彭德怀元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把电话直接打到78师指挥所，对师长齐安聚表示了鼓励和信任。日后，他还将委以更大的重任来表示这种信任。

1951年4月22日，5次战役发起。26军立刻由防御转入突击。为防敌从我侧后登陆，又开往东海岸做抗登陆准备。第二阶段美军反击得手，26军又急赴战线中央平康、金化地区进行坚守防御，为身陷敌后的部队死死撑开了一道生命之门。此后，一直在第一线战斗到1952年6月，才把阵地移交给15军，奏凯回国。

战火的残酷是与英雄的规模成正比的。26军入朝只有1年8个月，一级英雄高居全军第二，反坦克英模更是全军之冠！由于战场形势的特点和要求，一改国内革命战争中攻坚先锋的角色，更多的担任坚守抗击的任务，在防御守备作战中同样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十二、国之利器

凯旋而归的26军坐镇华东重地，守备山东半岛，拱卫京畿要冲。回到了山东老家，回到了生之养之的亲人身边，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离家多年，本色未改，一如连绵的沂蒙山，一如老司令、老首长，藏锋内敛，不事声张，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地守卫着京畿，守卫着海防。

三十八军： 朝鲜战场上的万岁军

刘福通大龙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来源是同为沂蒙子弟兵的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第二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西元）和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司令万毅、副政委周赤萍）与部分地方武装。抗日战争时期均隶属为陈士榘麾下的滨海军区，挺进东北后于1946年8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一纵以“三下江南”，“四战四平”名扬天下。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命令，东野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在平津战役中，担任主攻天津的任务，最先突破天津城防并攻占金汤桥（今解放桥）；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活捉了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等5名将官，再战成名。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三十八军从祖国最北的松花江畔一路过山海关，打到滇越边境，纵横5000公里，转战11个省市，歼敌16余万，攻占大小城市100余座。1950年10月，第三十八军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和阵地反击战，以及西海岸反登陆准备，于1953年7月返回祖国。第三十八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有3个连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连”称号和记特等功；有1万多名指战员荣立战功。本篇叙述的是38军最为辉煌的故事。

中国军队对三所里和龙源里的占领，震动了联合国军的整个战线。联合国军的大后方关键部位的丢失，使徘徊于清川江北岸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四师和英军第二十七旅、南朝鲜军第一师以及土耳其旅残部全部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从地图上看，联合国军向南撤退只有四条路可以走，这也是联合国军北进的四条路，其自西向东依次是：博川至肃川的公路，价川经新安州至肃川的公路，价川经龙源里至顺川的公路，还有一条就是价川经三所里至顺川的公路。美军与中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不一样，他们庞大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必须依赖公路。

最西边的美第一军迅速由清川江北岸撤退至新安州地区，美第九军也收缩至价川地区。为迅速摆脱中国军队越来越猛烈的压缩，美军遗弃了大批装备器材，一路

沿着价川经新安州方向撤退而来。在三所里、龙源里，他们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已经占领的阵地实施了猛烈的攻击，力图尽快打开向南撤退的通路。沃克将西线被围困的部队撤出的惟一希望寄托在一个设想上，即：三所里、龙源里的中国军队也许是一支仓促穿插到这里的部队，其兵力和防御纵深都应该很薄弱，兵力和火力占优势的美军打开通路虽然是个麻烦，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在麦克阿瑟含糊地承认联合国军北进计划彻底失败的那个早上，美第二师司令部跑进来一个浑身是血的土耳其兵，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他是土耳其旅补给连的，他们连队在沿顺川至价川的公路往北前进的时候，在青龙站附近遇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全连遭到突然袭击，现在已没剩几个人了。



美第二师师长凯泽意识到：切断退路的中国军队可能不会是一支小股部队。美第二师白天受到的南北夹击令凯泽师长印象深刻。中国军队在他的正面连续不断地进攻使第二师的战斗力已经减少一半，尤其是步兵营，有的营人数减少至200—250人，而有的步兵连甚至只剩下了20多个人。即使如此，凯泽也不敢放弃节节抵抗的战术，因为不这样，第二师就真的要溃散了。听了那个惊慌的土耳其兵的报告后，凯泽决定派一个宪兵班先去南边探路，但自从这个班出发以后，凯泽师长就再也没听到他们的消息。凯泽师长决定亲自到军指挥部去一趟。他是乘吉普车去的，凯泽到了那里，才发现军指挥部里根本没有人，只有一个趴在地图上紧皱眉头但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作战部长。凯泽在这张军指挥地图上看了看自己师的作战区域，并决定以此为指令，于是乘车往回走。吉普车上了公路才发现，公路上挤满了撤退下来的辎重车辆，吉普车根本通行不了。于是凯泽临时改乘直升机。在直升机顺着公路向师指挥部飞去的时候，凯泽看见飞机下的公路上有数千难民在向南黑压压地蜂拥而去。凯泽根据自己的战场经验认为，凡是出现难民的时候，中国军队肯定还没有到来，因为战争中的常识是，难民的逃难总是在军队之前。

后来的事实最残酷地向凯泽师长证明，他看见的那数千人的“人流”，根本不是什么难民，恰恰是正在南下准备切断他的退路的中国军队。步行行军的中国士兵军装标志不明显，在艰难急促的奔跑中又根本无法顾及军容，这使美军的侦察判断一错再错。既然认为中国军队的主力还没有到来，美第二师还是有时间沿着价川至顺川的公路撤退的——在直升机上，凯泽师长这样决断。之后派出的坦克排也是一去不复返。

这时，第二师正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心情焦灼的凯泽师长又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去探查向南撤退的道路，侦察连进到青龙站附近受到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的袭击，当美第二师九团的一个增援连队找到这个侦察连的时候，侦察连全连活着的官兵只剩下了20多人。为了给向南撤退的美军杀开一条血路，美第九军29日全天向中国军队展开了全面的猛攻。但是，令他们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出奇地顽强，它根本不是想象中的一股小分队，而是一支精锐的大部队。

这支精锐的部队就是快速地穿插到三所里，并且“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的中国第三十八军——三师。凯泽师长派出的侦察连在龙源里遇到的就是——三师三三七团的一营三连。三三七团以三连为前卫于29日凌晨4时占领龙源里的时候，正好一队美军的车队通过这里，在连长张友喜的带领下，三连立即向美军发起攻击，战斗结果是，击毁汽车七辆，俘虏美军15人。经过审问，知道他们是美骑兵第一师五团的先头部队。战斗过后，出现了暂时的寂静，于是中国士兵们开始吃从美军汽车上缴获来的食品。天大亮了之后，哨兵说有敌情，张友喜顺着公路向北看，逐渐看清了，是一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组成的小型车队。等车队走近了，三连以突然的出击没费什么

力气就解决了战斗。令中国士兵兴奋的是，美军车队这次运的不再是难喝的“威士忌”，而是面粉和牛油！三连的士兵没高兴多一会儿，大批的美军来到了。

29日白天一天美第二师九团的攻击，都是以坦克为前导，于是，这天的阻击实际上是中国士兵用血肉身躯与钢铁坦克的搏斗。三连三排一名叫做徐汉民的士兵用手榴弹把一辆坦克的履带炸断了之后，没过多久，发现被自己炸断履带的那辆坦克又“活”了。原来美军的坦克驾驶员钻到坦克下，居然把这辆坦克修好了。徐汉民一看冒了火，追过去跳上了那辆坦克。其他的中国士兵一看到这个情景，大声地喊：“有种！好样的！”徐汉民在美军坦克上不知道如何下手。中国士兵打坦克的知识极其有限。坦克带着这个中国士兵开出去100多米远，叫好的中国士兵这回又担心了，大喊：“快回来！快回来！”这时，只看见徐汉民突然从坦克上滚下来，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徐汉民把一捆手榴弹塞进坦克的炮塔里去了。就在——三师于三所里、龙源里阻击南逃美军的时候，彭德怀命令西线全线的中国军队向美军猛烈地压缩攻击。在以价川为中心的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之内，中国军队分成无数支部队，将美军分割开来，使价川地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巨大的血流之地。第三十八军的——四师突破了土耳其旅的防线之后，奉命不顾当面之敌迅速向三所里方向前进，向顶着巨大压力的——三师靠拢。——四师顽强而迅速地突进，终于靠近了龙源里。他们就是美第二师师长凯泽在直升机上看见的那数千“难民”。第三十八军——二师于29日16时到达凤鸣里。在这里的美第二十五师拼死阻击。经过残酷的战斗，两个小时之后，——二师占领了凤鸣里。

松骨峰，北朝鲜西部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山头，但由于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被一位中国作家写成了通讯，所以中国很多很多的成年人今天依然知道松骨峰，知道在那里发生过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殊死的搏斗。

1950年11月30日，是这个叫做松骨峰的地方血肉横飞的日子。虽然松骨峰在中国作家的通讯里长满了青松，但事实上松骨峰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包。松骨峰位于龙源里的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形成鼎足之势。它北通军隅里，西北可达价川。其主峰标高288.7米，从山顶住东延伸约100多米就是公路。坚守松骨峰的中国军队是第三十八军——二师的三三五团，团长是刚打完飞虎山阻击战的范天恩。范天恩的三三五团注定要在朝鲜战场上不断地打恶仗。

当第二次战役开始的时候，三三五团依旧还在执行“诱敌深入”的任务。这个团的官兵在范天恩的率领下，在飞虎山对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之后他们边打边撤，当军主力已经开始攻击德川时，三三五团还在距离德川100多公里远的花坪站阻击北进的一股美军。当天晚上，范天恩接到新的命令，命令仅有一句话：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这时，与师里联系的电台坏了，范天恩立即在地图上找前进的路线，决定就朝那个叫做新兴里的地方打。三三五团没有向导，全靠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北针，他们在天寒地冻中开始了翻山越岭的艰难行军。目标只有一个：追上主力，争取赶上仗打。走了两夜，到达距离德川还有十几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时，包括范天恩在内全团官兵实在走不动了，范天恩命令一个参谋带人去侦察主力部队的方位，同时让部队在村子里休息一下。警卫人员在寻找可以防空的地方的时候，意外地在一个菜窖里抓了十几名南朝鲜兵，一问，原来德川的战斗已经结束。不久，外出侦察的参谋回来了，说主力已经向夏日岭前进了。范天恩立即命令部队继续追赶。在夏日岭附近，三三五团终于追上了刚刚打下星日岭的军主力，范天恩还顺便从躺在公路上的美军汽车里弄到一部电台。这时，——二师师长杨大易正接到军的指令，让他们立即占领松骨峰。师长正苦于手上已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了，看见三三五团来了，杨大易高兴之极地叫道：“真是天兵天将！”杨大易给范天恩的命令是：直插松骨峰，在那里把南逃的美军堵住。

范天恩带着他极度疲惫的士兵，立即向松骨峰急速前进。在漆黑的夜晚，三三五团冲破美军的炮火封锁，在书堂站一带展开了部队。范天恩命令一营占领松骨峰。一营先头连是三



连。三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有来得及修工事，大批的美军就顺着公路来了。蜂拥南撤的部队就是美军第二师。面对公路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美军，经过几天行军的三连士兵们立即把饥饿和疲劳忘得精光。三连最前沿的是八班。在美军距八班阵地只有20米距离的时候，八班的机枪手杨文明首先开火，立即把第一辆汽车打着了。枪声一响，排长王建侯带领五个士兵冲上了公路，火箭筒射手抵近向坦克射击，手榴弹同时飞向汽车。这时，五班的爆破组也把第二辆坦克打着了，汽车和坦克堵塞了公路，车上的美军士兵调头往回跑。片刻之后，美军组织起向松骨峰的攻击。他们要想活着就必须打开松骨峰的通路。朝鲜战争中一场最惨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战斗打响之后，范天恩担心阵地上的工事还没有修，士兵会伤亡很大，就打开步话机向一营喊话，结果步话机中响着的全是英语，那边的美军指挥官正吵成一团。范天恩只好命令二营用机枪火力支援一营三连的方向，以减轻前沿的压力。一营营长王宿启更为三连是否能在那个紧靠公路、没有任何依靠的山包上顶住敌人而焦灼不安。他命令在三连阵地左侧的一连和右侧的二连都上好刺刀。

美军的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时是白天。美军的飞机疯了般，擦着中国士兵的头顶把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投下来。美军的火炮也疯了，炮兵都知道，如果不突围出去就全完了，于是，炮弹密雨似的打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最前沿的三连阵地上弹片横飞，大火熊熊。美军士兵冲上来了。营长王宿启立即命令左侧的一连端着刺刀从侧面出击，肉搏战之后，美国士兵被刺刀逼下去，于是改为从三连的右侧攻击，但右侧的二连也端着刺刀扑了上来。就这样，三连在正面顶，一连和二连在侧面支援。在刺刀的拼杀中，一、二连的伤亡巨大。美军向松骨峰前沿攻击的兵力还在成倍地增加。师长杨大易焦急地关注着三连的方向。他站在师指挥部的山头上，看见从药水洞到龙源里的公路上全是美军的汽车和坦克，多得根本看不到尽头。美军第四次冲锋是在阵地上大火烧得最猛烈的时候开始的。美军士兵已经冲上四班的阵地，四班的士兵们喊：“机枪！快打！”机枪由于枪管被烧弯，已不能射击了。机枪手李玉民从战友的尸体上拿起步枪向美国兵冲去。他的大腿被子弹穿了个洞，他用一颗子弹塞住伤口止血，然后就与敌人拼上了刺刀。四班的士兵们冲过来，美国兵扔下他就跑。眼睛看不见的三排长爬过来，要把李玉民背走，李玉民说：“你快去指挥，敌人又要打炮了！”这时候，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的电话来了，军长在电话里向范天恩发火，原因是侦察情报报告，在三三五团的防区，有四辆美军炮车通过公路向南跑了。“给我追回来！记住，不许一个美军南逃！”范天恩立即派三营的两个连去追。为了歼灭四辆炮车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兵力中抽出两个步兵连，足以看出中国军队要一个不剩地将美军置于死地的决心。范天恩的两个步兵连翻山越岭抄近路，整整追了一天，最终把四辆美军炮车追上并歼灭了。中午的时候，坚守松骨峰的三连只剩下不到一半儿的人了。连长戴如义和指导员杨少成烧毁了全部文件和自己的笔记本之后，与可以战斗的士兵们一起回忆了这个连队在其战争历史上所获得的各种称号：战斗模范连、三好连队、抢渡长江英雄连……最后他们的决心是：哪里最危险，我们两个人就要出现在哪里。就在松骨峰、龙源里、三所里阵地的阻击战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的电话打到了一一三师的指挥所，他问师政委于敬山：“敌人全退下来了，一齐拥向你们的方向，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于敬山回答：“我们卡得住！”

在龙源里阻击的是另一个三连，隶属于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从这个连队正面攻击的除了美第二师的部队之外，还有美第二十五师和英军二十七旅。三连的中国士兵依靠阵地上坚硬的岩石地形，吃着用缴获来的黄油和面粉烙的饼，誓死不后退一步。为了打通这条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整个龙源里阵地上山摇地动，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和航空炸弹把阵地上坚硬的岩石整个“翻耕”了数遍，对自己的火力十分迷信的美国士兵对中国人能在这样的轰炸中活下来的本领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的“宗教情绪”。在听说北援的敌人占领了一排的前沿阵地时，三连连长张友喜带着十名士兵立即向敌

人发起进攻，用刺刀把敌人压了回去。屡次失败的美军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士兵伪装投降。一伙美军坐在汽车上举起白旗，示意投降。于是中国士兵派人下去接受投降，结果当中国士兵走近了的时候，汽车上的美国士兵突然开火，然后汽车开动迅速逃跑。美国士兵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恰恰让中国士兵树立起了同仇敌忾的信念，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激情一旦被激发起来，他们会变得更加勇猛顽强。

三连的阵地始终处在美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南逃的美军和北上增援的美军有时几乎已经“会师”。战后美第二师的军官回忆道：“我们甚至看见了增援而来的土耳其坦克上的白色的星星。”但是，在三连打到全连官兵所剩无几、弹药已经用尽的情况下，南北两边的美军始终没能会合。龙源里的“闸门”始终紧紧地关闭着。

下午1时，攻击松骨峰阵地的美军开始了第五次冲锋。由于中国军队的合围越来越紧，美军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参加向松骨峰冲锋的美军增加到上千人，美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和火炮，向这个公路边的小山包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猛烈轰炸。三连的士兵在根本没有任何工事可以藏身的阵地上蹲在弹坑里，然后突然冲出来向爬上来的美军射击。

随着美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来越少了。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牺牲了，战士主动接替，炊事员和通信员也参加了战斗。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已经没有了，他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国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中国士兵们看见自己的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他们含着泪呐喊：“冲呀！打他们呀！”士兵们向已经拥上阵地的黑压压的美军冲过去。这是三连的最后时刻，也是那些亲眼目睹了松骨峰战斗的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时刻。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阵地上，在几百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支中间，他们看见了牺牲的中国士兵仍保持着的死前热血贲张的姿态。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上粘满了美国兵的脑浆，嘴上还叼着美国兵的半个耳朵。那个名叫邢玉堂的战士的尸体还冒着余烟，他的手指已经插入他身下那个美国兵的皮肉之中。作家魏巍将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就在这天黄昏，范天恩的三三五团反守为攻，全团出击了。同时，在各个方向围歼美军的中国军队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在黄昏落日的映照下，在军隅里、凤鸣里、龙源里之间，被围困的美军被切成一个个小股，受到从四面压上来的中国士兵的追杀。企图解救美国士兵的美军飞机飞得很低，四处逃命的美国士兵向天空摇晃着白毛巾，但是中国士兵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摇晃起白毛巾，于是美军飞行员只能在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向大本营不断地报告着一句话：“完了，他们完了！”夜幕降临了。

朝鲜战场上的黑夜是为美军准备的坟墓。第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登上指挥所的最高处，他看见了令任何身经百战的指挥官仍会感到惊心动魄的场景：冷月寒星辉映的战地，阵阵炸雷撕裂天空，“轰隆隆，轰隆隆”连绵不断。几十公里长的战线上，成串成串的曳光弹、照明

弹、信号弹在空中交织飞舞，炮弹的尖啸，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发出的闷哑的爆炸声，在峡谷中回响不息。敌我双方在公路沿线犬牙交错的激烈战斗，那是他从戎几十年，从未见到过的雄伟、壮阔的场面。敌人遗弃的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各种大小汽车，绵延逶迤，一眼望不到头，到处是散落的文件、纸张、照片、炮弹、美军军旗、伪军“八卦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这天晚上，也是志愿军司令部最紧张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披着大衣，整夜不停地起草电报，根本不吸烟的他开始向参谋伸手要烟。他已经连续六个昼夜没有合眼了，他面容消瘦，眼睛青肿，嘴唇开裂，但当前线传来胜利的消息的时候，他显得极其兴奋，亲自起草了一个嘉奖电报：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三十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在汉语的词汇中，“万岁”一词是有其特殊含义的，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它是至高无上的人物和事物才能使用的专用词汇。中国战争史上以前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哪支部队能被称之为“万岁”。这个嘉奖电报起草好之后，连几个副司令员都对这个“万岁”的称呼提出了异议，汉语中赞扬的词汇很多，能不能换一个，但是彭德怀坚持“万岁”。

据说，在第一次战役后受到彭德怀痛骂的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在前线接到彭德怀的这个电报的时候，流了泪。志愿军总部电报发出的时候，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正在公路上清理缴获的美军物资。根据副军长江拥辉的回忆，当时，一名中国士兵在摆弄一台美军的收音机时，收音机里传出的一首歌曲令在场的中国士兵们愣住了。收音机里播音员说的是中国话：“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自出国以来便在生死中搏斗的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脸上烟火斑驳，身上衣衫褴褛，他们围着这台收音机站在硝烟缭绕的公路上一动不动。



跨海之战

韩先楚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集团军被称为“旋风”部队。其老班底为1945年底挺进东北的山东解放军第三师、山东军区警备第三旅，均为坚持抗战的沂蒙子弟兵。与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所辖部分部队整编而成，列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纵队成立后先后参加了辽阳、本溪地区作战，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作战等战役战斗，歼敌3.7万余人。1948年3至8月，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9至11月，参加辽沈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首克义县，主攻锦州，会战辽西，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此役，第3纵队共歼国民党军3.9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韩先楚任军长，罗舜初任政治委员，12月至1949年1月，先遣进至河北香河地区参加平津战役。首先攻占北平（今北京）南苑机场。2月，由北平先遣向华中、华南进军。1949年4月，韩先楚升任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罗舜初被任命为四十军军长。9月至10月，参加衡宝战役，担任中路军正面突击任务，与兄弟部队共同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主力第七军军部及4个精锐师。衡宝战役结束后，罗舜初伤病之躯无法率部入桂作战，四十军交由老军长韩先楚率领。1950年3至5月初，参加海南岛登陆战役。此役是四十军的经典之作。

1949年12月，两广战役刚刚结束，野司给我们军下达了命令，立即开往雷州半岛，准备与兄弟部队共同跨海南征，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号称“南中国海的门户”。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把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和两广战役漏网的残敌共约十万人纠集在一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凭借琼州海峡与舟山、金门、万山诸岛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屏障，作为“反攻复国”的跳板。

为了实现全国彻底解放，趁敌人立足未稳，我们必须尽快地登上海南岛。可是茫茫的大海拦

住了道路，我们一无海、空军，二无海上作战经验，全国大陆刚刚解放，国民党留给我们一堆烂摊子，要想在短期内建成海、空军是不可能的，摆在面前唯一的办法是：变陆军为海战部队，用木帆船跨越海峡。

海战难题 旱老虎要变水蛟龙

把陆军变成海战部队，完全用木船航海战胜拥有现代海空军的敌人，这不仅在我军历史上没有过，而且在世界战史上也找不到。这个空前的难题，应该如何着手来解决呢？

没有船只，没有经验，没有器材，不懂海洋气象，不熟悉海情，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而且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争取在三个月内完成，因为每年从正月到清明，多东风和东北风，对南渡海峡最为有利，过了清明，风向则变化无常，时而东，时而西，一过谷雨，则转为南风，逆风渡海作战，那是不堪设想的。

全军指战员中，除少数干部从山东进军东北时渡过一次渤海外，绝大多数同志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海上练兵开始，一个连队登上船，百分之八十的人呕吐头昏。出海归来，每个人好象害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吃不下饭。有的连队不懂气象，冒失出海后，遇着风暴，弄得桅断篷破，船底朝天。有的战士说，“这次要革命到底（海底）了！”不少人对木船渡海作战产生了怀疑，希望上级解决登陆艇。

木帆船渡海作战到底行不行呢？海峡这个巨大的障碍，渡海作战这一崭新的课题，是一个极为艰险的现实。

我们在军部驻地海康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全军团以上干部参加。军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坚定了依靠木船渡海作战的思想。

日夜练兵 船老大惊叹真“神兵”

一场海上练兵的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军师领导机关和团营指挥所都移到海边，搭起草棚，同战士一块学，一块下海。大家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海洋知识和海战史料，访问被称为“特约顾问”、“活气象台”的老渔民、老船工。就连旧书摊上无人过问的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也买来研究参考。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走浪桥，练摇橹，学掌帆。“要做大海的主人”这句话，响彻每个角落。指挥员们吃着饭，也把筷子往碗里一插当帆船，以饭桌当海，研究起航海队形来。许多人带病参加海练，劝不了拦不住。经过一个多月的艰巨努力，日夜苦练，部队中基本消除了晕船的现象，学会了一套海上行船的本领。这种奇迹使许多船老大惊叹，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的大军真是神兵！神兵！”

一天，忽然从并肩准备跨海的兄弟部队中，传出一个神话般的消息：一只木帆船把敌人的兵舰战胜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它确是事实。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有位名叫鲁湘云的排长，带领八个战士乘着只小木船出海演习。突然，一艘敌舰向他们开来，鲁湘云看敌舰来得猛，靠风行驶的木船无法走脱，遂下令船上的战士准备战斗。当敌舰开近五六十米时，鲁排长喊了一声：“打！”船上的轻火器和掷弹筒突然开火，打退了敌舰，自己安全返航。这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起决定因素的不是武器，而是人！

为了对付敌人的兵舰，军部炮兵主任亲自领导一些会木工铁工的战士，利用木船和汽车引擎，创造出了一只“土炮艇”；随着第一只“土炮艇”诞生，各师也先后造出了同样的“炮艇”。从此，海练部队的行列中，出现了一支由“土炮艇”编成的“舰队”。

渡海先声 潜渡营登上五指山

薛岳发现我军准备解放海南岛的行动后，一面加紧海岸设防，一面调集兵力加紧“围剿”我五指山根据地。琼崖纵队的处境异常困难。

海南敌情的变化和战役准备工作的需要，我们越发感到，上级先以小部队偷渡的指示，是一个极好的办法，我们坚决遵照执行。经过上级批准和严密而紧张的准备之后，3月5日黄昏，师参谋长苟在松等同志，亲自率领八百名壮士，登上了十四只战船。

这是大举渡海的先声，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军师的领导同志亲自到起渡点送行。并把一面绣有“渡海先锋营”的红旗授给八百名勇士。十四只战船，载着千万人的希望，扬帆起渡了。

船队渐渐地远去，只有基准船上的一盏红灯还隐约可见。送行的同志们爬上海边的沙岗，踮着脚尖，屏着呼吸，眺望大海，倾听海上的动静，直到再也望不到基准船上的红灯以后，才各自返回驻地。归途中，我们曾几次停车望望天空，掏出手绢试试风向，我们的心，简直系在正在海上航行的十四只船上了。

军指挥所的参谋同志早已把一长条绸子绑在竹竿尖，竖在楼外凉台上，观察风向。上半夜，潜渡营接连发来了两份电报。一次是“风向好，船速快”。二次是“前进二百里”。这个消息像一阵春风，气氛活跃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如果按现有的速度前进，拂晓前就可以胜利登陆。

突然，潜渡营又发来了一份电报：“风停，船行很慢。”虽然对这种情况我们早有预计，风停就全力划桨前进，但我们仍然不能不感紧张。俗语说。“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战士们把称为“活气象台”的老渔民请到指挥所来了，他望了望天空说：“风让五指山挡住了！要起风得等到明天下晚。”凉台上的绸子起初还微微有些飘动，后来连一丝轻风也完全停止了。事态十分严重；军的几个领导同志全神贯注，守候在地图和电台旁边。

第二天上午十一时，据观察报告：西南方向发现敌机。接着潜渡营发来电报：“发现敌机、敌船！”此后，指挥所和潜渡营的电信联络完全中断了，几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总是“情况不明”。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仍杳无音信。整整三天三夜，指挥所的同志眼睛熬得都充满了血丝，反复苦思着：潜渡营是电台坏了呢？还是在海上运动中遭遇了不测？潜渡营是历次战斗中英勇顽强、屡立战功的一支英雄部队。十四只木帆船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船上全做了工事，人员、火器都是按单船独立战斗配备的。领航人员又是琼纵的老同志，久经考验，深谙海性，就是闭上眼睛都可以摸过海去。苟在松参谋长是经过爬雪山、走草地的长征干部。团长罗绍福、营长陈永康、教导员张仲先，抗日战争时期就率领小部队活动在敌后，他们在指挥上，全是久经锻炼、机智果断的好干部，岛上又有琼纵同志接应，海南人民的援助……想到这里，我们确信潜渡营一定能够冲破万难，取得胜利！

3月8日，琼纵的电台传来了潜渡营胜利登上五指山的捷报。大家心上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全身不知轻了多少倍。胜利的消息霎时就传遍了全军。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潜渡营在风停以后，就和大海展开了搏斗，铁锹、木杆、枪托、饼干箱的木板都成了划船工具：虽然没有风，船队仍以每小时十华里的速度前进。当他们艰苦顽强地划了十二个小时，即将接近海南岛西侧的白马井登陆点时，突然四架敌机出现在船队上空，同时几十只敌人的机帆船也分三路向我船接近。潜渡营的指挥员立即命令战士们脱掉军帽，伪装民船。敌船上挂红旗与敌机联络，我军也全部插上红旗，敌船换了白旗，我们就拿白包袱皮挥舞。潜渡营勇猛沉着地向敌人的船队靠近，又以灵活机智的手段迷惑敌人。敌机，敌船都没有分清敌我。到达登陆点以后，潜渡营稍整理队形，立即开始了抢滩登陆的战斗，全歼了一个营的敌人，在琼崖纵队两个主力团的策应下，胜利登上了五指山。只因登陆

前电台被海水浸坏，才和指挥部失掉联系。

解放涠州岛 缴获四百多木帆船

第一支利箭射中了！初战胜利，潜渡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但是，一个最大的难题还没解决：大兵团渡海缺少足够的船只。敌人从雷州半岛撤退时，为了阻止我军渡海，将沿海一带大批的民船劫走或焚烧了。几个月来，在地方党政机关全力协助下，虽然征集到一些船，可是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没有大批质量好、载运量大的船，大军渡海是不可能的。船，成了整个战役准备工作的关键。

一天，从涠州岛逃回一个渔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况。盘据在那里的所谓“广东反共自卫军”，劫持有四百多只民船，全是多篷多桅的大船，可用于渡海作战。这个情报，又使我们有机会运用“夺取敌人装备，装备自己”这个法宝了。经过四野和兵团首长批准，我们发起了一个向敌人“要”船的战斗。

根据涠州岛的敌情、地形和风向潮流，我军一个加强团白天起渡，以“海练”的姿态把敌人迷惑了半天，天黑以后一转航，顺着风向潮流，直发敌岛。当我军胜利地登上涠州岛时，“广东反共自卫军”参谋长甘中正还正和他的部下玩麻将呢。他们发现我军登陆后，一面仓促应战，一面企图乘船逃跑。港湾里的四百多只民船，已经扯起了篷，并有两只兵舰作掩护。这时我一只土炮艇冲到港口，艇上一营副教导员张振东同志身负重伤，桅杆被打断了，舱里漏进了水，他仍然倚着折断的桅杆鼓动大家坚持战斗，决不放走敌人。经过一阵激战，敌“海硕号”军舰被击伤，在“海狗号”掩护下逃窜了。

涠州岛解放了；五百多敌人无一漏网，四百多只木帆船全部为我缴获，这对我军大举登陆海南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次潜渡 揭开敌人正面防御秘密

我军潜渡部队登上海南岛以及涠州岛夺船的胜利，吓慌了薛岳。他不再大吹大擂“立体防线”了，急忙把“围剿”五指山的部队抽回，加强岛北部东西两侧的防御。我军准备再次潜渡。但是这次潜渡不是从东西两侧登陆，而采取半潜渡半强攻的手段，从敌人防御的正面临高角一带登陆，以便通过此次潜渡摸清敌人正面设防的情况。

二次潜渡的兵力为一个团，准备工作更为慎重。每只船都准备了足够的橹和桨。为便于海上指挥和通信联络，特为潜渡部队配备了两只机帆船。起渡的前一天晚上，先派船潜入临高角附近，对登陆点的水深潮情做了试探。潜渡前，恰好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同志从北京开会归来。这次潜渡即由他和我军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同志共同负责指挥。

3月26日晚七时，潜渡团起航时，正是东风西流水，顺风顺流，船行似箭。哪知下半夜风向突然发生了变化，海上又升起了漫天大雾，联络信号失灵，致使四十三只船分散漂流。但是每只船上的指挥员都各自抱定决心：一条船也要登上海南岛。结果一部分在玉包港登陆，其余大部分是在玉包港两侧分散登陆。

这一带是敌人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距我接应部队一百多华里，情况极其险恶，但每只船每个战士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坚决登上陆，打到五指山去！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回击敌人军舰、飞机、陆上的三面阻击，强行登陆。他们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奔向哪里，上岸后在紧张的战斗中，迅速地编成了新的连排组织，有的没有指挥员，班长和党员战士便自动代理。当敌人两艘军舰向我在玉包港地区登陆的船只扑来的紧急关头，二营四连两只帆船上的战士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立即转舵向敌舰冲去，他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没有后退半步，掩护了其他二十只船胜利登陆，这两只船上的同志们全部光荣牺牲。

潜渡部队没有在预定地区登陆，海南的部队没有接应上。但是，当海边响起了枪炮声后，沿海许多村庄的地下党员和群众奔向海边，冒着敌人的炮火给登陆部队当向导，凡是我军战斗过的地区，人民群众都三番五次搜寻，发现有红五星帽徽和胸前佩有“人民解放军”符号的伤员，立即设法救出战场，有的藏在自己家里用医药土方治疗，有的及时转送森林里的琼纵医院。有个战士腿上受伤后，一个老大娘扶着他通过两道封锁线，爬行了几个昼夜，终于找到了游击队。潜渡部队先后击溃了敌人十个营以上的层层阻击，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区。而且毙伤敌六百多，俘敌二百余名，并击伤敌舰一艘，打落敌机一架。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战士加上伟大的人民所形成的巨大力量，是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但是，在指战员心目中还不仅仅这些，更重要的是，在分散登陆的情况下，一只单船都可以登上海南岛的事实，揭开了敌人正面防御的“秘密”，使我们从这次胜利中，看到解放海南岛的时机已经成熟。

千帆竞渡 登陆海南突破伯陵防线

时近四月，谷雨迫近，眼看着有利的季节风就要过去了。我们面前摆着两着“棋”。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潜渡。

显然，后一着“棋”是不可行的。前一着“棋”是可走的最有利的。首先我军和兄弟部队先后四次潜渡之后，敌我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岛上我已有相当的内应力量，而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是对付我小型潜渡，这就有利于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大举强攻。其次，形势不等人，季节不等人，谷雨过后，海面再无北风，因此，我们必须乘谷雨前的季节风行动。如果错过时机，不仅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将长期拖延下去，就连日后小型潜渡亦不可能，何况潜渡的船只有去无回，长此以往，船只问题也无法解决。再者，历次潜渡和涠州夺船说明，不管是敌人翼侧、正面，不管是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只单船，也能突破敌人防线冲上岛去。大规模登陆，兵力大，火力强，登陆突破更有把握。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渡海作战的一些主要经验，部队海练基本成熟。目前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更该一鼓作气，全面进攻，彻底解放海南岛。

这个意见迅速得到野司的批准和指示，兵团也统一制定了我军和兄弟部队的作战计划。我军起渡点选择在徐闻县西南的灯楼角，预定登陆地区是在临高东北之傅铺港，成东北、西南之线，东风、东北风，北风都可以顺利航渡。

4月16日，这是经过多少次核对气象资料，访问沿海渔民，反复研究后确定的一天。这天，东风拂面，平潮伏流，是南渡海峡很理想的时机。部队来到起渡点，附近的人民群众，纷纷抬着茶水，欢送出征的英雄。

船队整齐、威武雄壮地排列在港湾内，各师比原来计划提前两小时就全部上了船，忽然，从西南天空涌来大片黑云，西南风骤起，海上掀起巨浪，猛击船身。老天似乎跟我们在作对。本来气象资料和渔民的答复都肯定今天一天是东风，但多变的海南风云，霎时变为航向的顶头风。

船行八面风，逆风船难行。我们向身旁的船工询问，“天黑以后，西南风能不能停？”这种不测风云，谁也不敢轻易回答。这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艄工知道我们心情太焦急了，斩钉截铁地说，“天黑以后不起东风，杀我的脑袋。”

他真是活气象台，18时30分，海上果然转了东风。一声“全队起航”的命令，千百只战船顺流而下，奔往海南岛。当航行到三十多华里时，突然空中亮起一串照明弹，敌人的飞机、军舰发现了。在耀眼的白光下，船队沉着地前进，看得很清楚，敌机轰炸扫射，敌舰疯狂炮击，弹雨纷飞，有的船被打得漏水，战士们一面向敌机、敌舰射击，一面灭火堵洞，高大的水柱在船前、船后翻腾，打到船上把战士撞倒。船队还是保持着严整的队形前进。

航行在两翼的护航大队——我们的土炮艇出动了。机器开足了马力，展开了战斗队形，直向敌舰冲去，采取陆地上勇猛穿插的战术，尽量逼近敌舰，插到敌舰背后，利用其火力死角，打击其要害。敌舰已经吃过我土炮艇的苦头，他们自己吓唬自己，说共军船上有钩子，梯子、炸药，一靠近军舰就不管死活钩住上来拚刺刀，或放炸药同归于尽。土炮艇一靠近，它们就连忙后退。但是又不甘心看着我们千百只战船安安稳稳向南疾进，片刻，又转回头来。一艘大型军舰恶狠狠地闯进我左翼航队里，我护航队的“指挥艇”立即迎击上去，接近敌舰只有几十米了，一阵突然而猛烈的炮火，敌舰上司令塔腾起烟火，其余敌舰怕遭到同样命运，惊慌地转舵掉头，跑到几千米之外，盲目打炮。

目睹木船打军舰的情景，大家真有说不出的兴奋，有的站在船头欢呼，有的激昂地说：“打完海南以后，上书毛主席，把我们编成海军！”

有位60多岁的老船工，左臂负了伤，仍然握着舵杆屹立不动，战士要扶他进舱休息，他拒绝说：“我穿上军装不也是解放军吗！”约下半夜二时半左右，隐约看到远处有一片黑色起伏的山峦，这时，战士们忘记了极度的疲劳，不约而同地高呼起来：“海南岛！”

敌人拚出最后的力量作困兽之斗，岸上、海上、空中的各种火器猛烈开火，企图阻止我军登陆。当整个船队进入了敌人稠密的火力网时，所有船只分不出什么指挥船，战斗船，一面猛烈射击，一面急速地前进，有如千百条火龙直向岸边冲去！当先锋船离岸有五六十米时，战士们纷纷跳下齐胸的海水，向陆地扑去。

两脚踏地，英雄更有用武之地了。上了岸的部队，真如猛虎登山，左侧先锋部队在连长戴成宝率领下，不到二十分钟就冲出五华里多，插到敌人滩头阵地的背后，夺下重炮阵地，立即掉转炮口向纵深的敌人轰击；右翼登陆的先锋部队在向敌人纵深穿插时，被一个大型堡垒的火力压住。已经三次负伤的独胆英雄万守叶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枪眼。后续部队铺天盖地向纵深冲去。薛岳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立体防线”不到半个小时就被突破了。

不到早晨六时，全军登陆完毕，除少数船受伤外没有一只被击沉，没有一只掉队。这时，西南方向七八里处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我琼崖纵队和潜渡部队已按计划从敌后进攻，占领了登陆地段内唯一的制高点——敌人纵深防御的枢纽阵地临高山。

歼敌残部 解放海南岛

午夜12时，登陆部队正将临高城紧紧围住，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原驻临高之守敌一个整师，现在只剩师部带一个团，敌人主力不见了。

军的几个领导同志在一所茅草竹棚里，围聚着烛光和一张海南地图，对敌情做了慎重的分析：根据敌人的部署和我军突然强攻的情况，薛岳很可能以为我军又是小部队潜渡，集中其机动部队主力于东线，企图阻止和围攻我兄弟部队于登陆滩头；薛岳是只老狐狸，一旦发觉我大军登陆后，将会从海上逃走。为把华南最后一撮反动武装消灭在海南岛上，不使其逃往台湾而增加解放台湾的困难，我们不能让主力被敌人一个团和一座小城陷住。因此，断然决定：临高城由琼纵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争取敌人投降或相机歼敌，我军主力立刻甩开临高，挥师美亭——海口之南一线。这样，既可会合兄弟部队，寻敌主力，又可断敌后路，直捣薛岳老巢海口。

全军连夜出发，白天则不顾敌机的疯狂扫射轰炸，向东急进。19日，在美台消灭了敌人两个师部及两个团，赶到澄迈，扑了个空，询问老乡，说澄迈守敌已往美亭开去。部队刚要休息做饭，就听到从美亭方向传来隆隆炮声。原来在东线登陆的兄弟部队，歼灭了花场、马袅市的敌人，将美亭之敌包围后，薛岳便将其一个军零一个师，以数倍之兵力向我兄弟部队实施“反包围”。我兄弟部队腹背受敌，正浴血苦战。我军遂以七个团的兵力，由澄迈分两

路，采取夹击之势，将敌人“反反包围”起来。敌我双方都把主力投入，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里里外外三四层。双方炮火都不敢射击，许多地方展开了肉搏战。

激战一直持续到23日拂晓，敌人终于挣扎得精疲力尽，主力被歼，其余慌忙撤退。我军和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直捣薛岳老巢——海口。可是，当先头部队赶到海口，只见到处是敌人丢下的汽车、弹药及大批物资，薛岳指挥所里，文件遍地。敌军已于23日下午发出总撤退的命令。薛、陈二人乘飞机由海口逃跑，其部队沿海口——榆林公路南逃，企图由万宁、榆林等港渡海逃窜。

海南岛东线的万宁、西线的北黎、最南端的榆林等港，军舰海轮进出都较方便，便于敌人多路撤退，我又没有海空军可以到海上拦阻。而海拔千米以上的五指山，这时

却又成了我军多路平行追击的障碍。眼看敌人就要跑掉，群众办法多，急中生智，一好主意出现了：组织“快速部队”超到敌人前面去。于是迅速把敌人丢下的各种汽车搜集起来，又动员了不少商车，没有司机，就到俘虏群去找，动员他们立功赎罪。很快一支“快速部队”组成了，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按战斗编组乘车，分秒不失，沿着公路追歼逃敌。同时，我们又命令土炮艇大队立即由海上开往北黎港堵击敌人。此时，两个军的二梯队已陆续登陆，也立刻投入追击。步兵、“快速部队”和土炮艇齐出动，这几乎不是战斗，而是和敌人赛跑了。

第二天上午，追上了大股敌人。不到一小时就抓了两千多俘虏。跑在最前的敌人，发现我“快速部队”追击就大肆炸桥、破路；桥路破了，人民群众很快帮我们修好。俘虏数字急剧增加，两千、四千、八千……迅速达到一万多人。

4月底的海南岛，已经热得出奇。中午时刻，树叶子晒得打卷，我们的徒步追击部队，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从师首长到战士，脚上都打了血泡，大家都置一切艰难困苦于不顾，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穷追苦赶，先在黄竹镇追上敌人六十二军两个师和两个团，不到两个小时就将其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副军长罗懋勋。26日，我步行部队几乎和“快速部队”同时赶到万宁港。成千上万的敌人正蜂拥着往舰上爬。我军的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舰上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落水，岸上的敌人则全部当了俘虏。

4月30日上午，我军和兄弟部队共同到了三亚、榆林等港。迎着碧蓝的大海，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的海角。

(本文有删节)



从“县太爷”到阶下囚 (连载)

——民国年间赣榆县长王佐良浮华与苍凉的人生

时麟 王秋侠

两面人性

王佐良在剿匪战场上敢与匪徒浴血搏斗，在县署公堂上是判决罪犯死刑不手软的“县太爷”，可谓“铁腕人物”；但是，他有时又另有一番“柔”性心肠。

王佐良在县署公堂上张贴着一幅自题对联。上联是“成法何拘乎？但知酌理唯情，片言折狱师仲子”；下联是“杀人诚多矣，只为安良除暴，惠民无术愧公孙”。

上联说明：他因剿匪、执法的需要，时常要开堂办案、依法杀人。但他并不喜欢杀人。他执法不愿受形式约束，只想斟酌事理、按实情办案，希望像当年子路那样，用几句简明的话就能正确地断清案情。

下联的意思是：他承认自己杀的人多，但为了安良除暴，他不得不这样做；而在杀



古代县衙

人之后，他又自责“惠民无术”，有愧于自己“将门之后”的身份。——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他“柔”性一面的反映。

再说待人。王佐良对忠心为他办事的身边人不摆官架子；手下人犯点小错，他也不发火。

因为他待下人不薄，所以下人也对他有义。他在赣榆为官期间的贴身“跟班”刘玉恒，在他坐牢以后，仍然跟他到南京，在监外为他跑腿办事，照料他的狱中生活。

还有一年，县内有些农村流行“大肚痞”（黑热病）。不少孩子染病后因缺医少药死亡。王佐良为此放下手头琐事，查阅医药典籍，找到验方，随即购进药材配制，免费发送解救患者。为此，服药获救的人家，都对他感恩戴德。

园艺专家

王佐良年轻时就喜欢“老树、怪石、奇花”。早在其父王得胜为官期间，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处家庭花园。该园起名“菊园”，内有菊花六百多种，并植有桂花、铁树、毛竹等奇花异草；花山、花窖、花亭、花厅、太湖石、小桥、流水等，也布局得当；素有“江北第一园”之誉。

王佐良不仅把菊园营造成观赏性花园，而且把它搞成园艺实验园地。民国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树艺浅说》一书。该书近四万字，并配有图像，介绍了常见树木、蔬菜、经济作物的栽种技术；另外还附有养柞蚕、椿蚕的方法。时任赣榆县农会会长的乔文澜为该书作序，行文说：“纬宸先生于树艺一道，推究最精，富有经验”；“栽植之法，物土之宜，纯自经验中来，切近详明，皆以前农书所未道及者。”又说，这些方法，“农人试无不效”。



北洋新军

在园艺研究方面，王佐良态度也非常谦虚。他在该书的“前言”结尾时写道：“赣榆亦桑梓邦也，忝作行政长官，深望各绅董父老、学子，以身作则，先行提倡”，并表示：“倘有人愿来署面余讨论者，余极欢迎，定优礼相加。”

“自缚”作囚

清光绪二十六年，76岁的王得胜为庆贺带有“双六”的寿辰，为自己立“功德碑”。其碑文对后代提出希望：“余今年七十有六矣，养痾林下，将平生事迹大略，勒石于祠堂侧，俾后嗣知余创立之不易。长守此中正勤俭之训，即为居官治家要法。倘更能读书奋志，昌大吾门，则余无有厚望焉。”

王得胜立这块碑时，王佐良对父亲的心情不会不理解，但是，谁料后来率先违背“父训”的人正是他自己！

在这里，且不说他为官是否“中正”，单看父亲要求的“勤俭”治家，他就没有做到。首先，他吸食鸦片。这既违父训，又违反朝纪国法。更可悲的是，他的独子王裕昆，身为王家第三代大少爷却不理家务，也像他那样嗜毒成瘾，人送绰号“烟龙”（实则是“烟鬼”）。父子两代吸毒，偌大家产都在他们爷儿俩的烟枪里，化成了袅袅烟雾！

王佐良不仅没有教育好儿子，也管不好身边的人。他做赣榆县官期间，由姨太顾罍做“压印夫人”。但顾没有帮助他好好治家理政，反而依仗他的权势，叫人替她在赌局里放高利贷取利。顾的弟弟顾金山来赣榆生活之后，也不务正业：天天放鹰、遛狗、玩鹌鹑，到赌局里聚赌抽头、敲诈勒索；更严重的是，他以姐夫为靠山，常常为人包揽诉讼，从中捞钱。顾氏姐弟俩如此造孽，也就必然造成公众对王佐良的不满。

民国十四年，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王佐良下台。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军中有个营长王某，青口人，曾与王佐良有磨擦。于是他抓住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使他逃过一劫。

然而，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部队南撤；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澍也随之撤走。孙传芳的江浙联军李宝昌旅

进驻赣榆后，王佐良复任县长。

不料好景不长。12月19日，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没过几天，江苏省政府就委任王兰卿（香谷）来赣榆当县长。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于是，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并将王佐良扣押，交十七军军部看管。

王佐良被关押之后，国民党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状”：（1）叛逆通敌；（2）勾结土匪祸害地方；（3）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4）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5）听任姨太放债抽赌；（6）纵容舅子包揽词讼；（7）吸食鸦片违犯国法；（8）贪污教育费；（9）放免鹑不务正业；（10）玩鹌鹑游手好闲。并写成讼状，上诉南京特别法庭。

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民国十七年夏，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赣榆县“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结果，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

王佐良受审期间，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请愿的朱寿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无人再替他“说话”。

但是，当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他的亲家、涛雒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终于出面向特别法庭提出了几点“不同看法”。

丁惟汾认为：按王佐良的那些“罪状”，把他定罪判刑，有些事确是无可非议。像他吸食鸦片（违犯国法）、为保自己的面子怒杀陈鸿玉（草菅人命）、对姨太和妻舅管束不力（自取其祸）、不惜挥霍重金为姨太顾婴建造陵墓（触犯众怒），等等。但说他“叛逆通敌”、“勾结土匪祸害地方”，就值得斟酌了。比如说王佐良“通敌”，谁是“敌”呢？当年军阀派系林立，在大兵枪口面前，他这个地方官对谁敢不俯首听命呢？即使他一时倾向某某，也只能是他的权宜之计，何谈“投靠”？

再说“通匪”。土匪本是国弱民穷的产物，仅凭赣榆一县之力是消灭不了土匪的。既然如此，王佐良就是真的跟土匪有“约定”一事，也只能说明他是想保一方百姓平安而已，说他“勾结土匪祸害百姓”，难以服人！

丁惟汾确非等闲之辈。他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政治”（通敌、通匪）、而轻“经济”（贪污）的实质，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法官们此时认识到：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再者，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

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民国二十年（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作出决定：允许王佐良“保外就医”。

王佐良经历三年牢狱之苦、被“释放”回到老家朱樊村时，身心交瘁，奄奄一息。当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后，也门庭冷落；名扬苏北的菊园更是萧条破败。

日落西山，时过境迁。此时的王佐良已无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在朱樊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岁。

王佐良去世，使王家大院失去了“顶梁柱”，一个父为清代总兵、子做民国县长、两代封建官僚之家就此没落。

王佐良浮华而又苍凉的人生，警醒了王家的孙辈，使他们不得不思考和寻求自己的人生出路。1942年春天，抗日烽火在滨海地区燃烧，王家大院入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从此，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全文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灯·扛阁” (上)

张铁民

“龙灯·扛阁”是起源于河东区九曲社区三官庙村的一种民间广场舞蹈。它把“龙灯”与“扛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节目无论内容还是表演形式，较之单一的“龙灯”或“扛阁”，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赏心悦目，更受观众喜爱。上世纪80年代，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齐鲁文化丛书》等典籍。2000年10月，参加“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以其精彩纷呈的表演套路，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获得金奖。此后，多次参加国家、省、市举办的各种比赛、表演活动，均受到广大观众及专家的欢迎和推崇，享誉全国。2006年，列入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龙灯”源于远古雩祭

“龙灯”又称“龙舞”、“舞龙”、“耍龙”、“玩龙灯”，是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各民族中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其品种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表演之精彩，是任何其它民间舞蹈无法比拟的。我国舞龙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关于祭龙的文字。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有各种舞龙祈雨的记载。此后，历朝历代的典籍及诗文中，关涉宫廷、民间舞龙的文字，屡见不鲜。即使是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很少有人再相信只要虔心“理神”，就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了。舞龙的功能也从娱神变成了娱人。但是作为一种自娱、娱人的游艺形式，依然受到百姓的热爱，仍是节日庆典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

“舞龙”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祭祀时要舞龙而不是舞别的？有的说是图腾崇拜，有的说是敬天上的龙神、海中的龙王，众说纷纭。实际上，它来源于我国古代的“雩祭”。所谓“雩祭”，就是求雨时的祭祀仪式。汉代王充《论衡·明雩》中对宫廷中的雩祭有这样的记述，“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继之“公卿官长依次行雩礼”，然后“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这种祭祀仪式，是古代在年初祭祀风伯、雨师、雷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应之后，实施的一种“贿神”、“虐神”，强求降雨的手段。是历代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要竭尽身心奉行的一件大事。

“雩祭”要祭的是什么龙呢？不是天上的“龙神”，也不是海里的“龙王”，而是“东方苍龙”。原来，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为了认识宇宙，把天体运行中日月五星行径的黄道地带，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管他们叫二十八宿。用来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判断四季，并借以实施耕种和收获。具体的方法是把二十八宿每七个星宿一组，分为四组，分别叫做“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所谓“四象”。“四象”分别与春、夏、秋、冬相匹配。每当寒冬尽去，一元复始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人们在二月初的黄昏和黎明，首先看到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星宿，便是东方苍龙。先是象征东方苍龙头角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冉冉上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抬头。也是《周易》三十六卦中，有东方苍龙之像的《乾》卦，九二爻爻辞所谓的“见龙在田”。剩下的六宿，随着时序的推移，亢（苍龙颈项）、氏（苍龙胸部）、房（苍龙腹部）、心（苍龙心部）、尾、箕（苍龙尾部），也先后出现在天空。

东方苍龙出现的季节，正是春风骀荡，春雨潇潇，万物复苏，春种一粒，秋收万颗的日子。先民们被这神秘的现象惊住了——是什么样的神力在操持、掌控着这一切呢？他们迷惘地审视着天空，仔细观察着“东方苍龙七宿”行走的轨迹，终于发现，它的某些星宿的运行部位，与风、雨、雷是有关联的。《史记正义》、《天官书》说的“箕主八风”，“月宿其野，为风起”。《诗经》中的“月离于毕，雨滂沱矣”，就是先民们这种认知的忠实记录。神秘天文现象在先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懵懂和迷惘，在科学并不发达的时代，始终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最后只能化为对天体虔诚的敬畏。于是，天文崇拜成了从帝王到草民的普遍信仰。每当天旱无雨时，人们就想起了要祭祀他们认为主管风雨的神星——东方苍龙。拜求龙神普降甘霖。从此，便有了“雩祭”。

“雩祭”的形态和程序纷繁复杂，而且随着朝代的更迭不停地发生变异，因此每个时期都不尽相同。不过，每年都要依据东方苍龙七宿“初现”、“中天”、“西流”、“蟄伏”直至“沉入地下”的时间，分别在春、夏、季夏、秋、冬总共举行五次祭祀，其中又以春祭最为重要，却是一致的。五次祭祀按照五行的理念，匹配成一个最基本的构架。每次祭祀的供品、衣着、道具、龙阵、程序等，既要体现出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比如，春祭五行属“木”，配青色，要摆青龙阵，伴龙者须用童子，着青衣。夏、秋、冬季，夏则分属



“火”、“金”、“水”、“土”；分别配以“赤”、“白”、“黑”、“黄”等颜色；设赤龙、素龙、黑龙、黄龙，伴龙分别用青、壮、鰾夫、老翁，分着赤、白、黑、黄色衣服等等。这是一个既高度统一又相对独立的“雩祭”的有机整体。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窥视到，目前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龙舞的源头了。对于三官庙“龙灯·扛阁”舞龙人高擎的大龙，就是春祭中的神龙东方苍龙，也是笃定无疑的了。

汉以前《雩祭》的具体程序和情境，史籍中没有见到比较详细的记载。《春秋繁露》记述的是西汉民间春季祈雨的过程，大致如下：求雨一定要在五行属水的日子，比如“壬辰”、“壬子”等日举行。事先要在城池的东南方向筑起一个四面通透的八尺祭坛。祭祀时的供品必须有八条生鱼、玄酒、脯肉等。还要在甲、乙之日，制作一条8丈长的大青龙，安放在祭坛中央，再做七条4丈长的小青龙，每条相隔8尺，面向东方排列起来。然后由经过3天斋戒的8名儿童、8名田穡夫，身穿青衣分立于青龙旁。祭祀开始时，8名儿童和8名田穡夫便疯狂地跳起舞来。近乎癫狂迷蒙状态的巫祝，一边口诵祭辞，一边手舞足蹈。仪式会延续很久，有时要直到下雨才肯停止。当甘霖降落，旱魃除时，人们深信是自己的惶恐与虔诚，感动了天上的神龙。与天神沟通的能力，得到了真切的验证。一种巨大无比的喜悦和自信充满了整个身心，于是，“雩祭”便成为了人们感动天地，驱邪免灾的永恒记忆。久而久之，“东方苍龙”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融进了中华民族的遗传密码，穿越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伴随着人们一直走到今天。民间艺术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它在流布与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异和衍化。行走在历史长河中的《龙舞》，不停地移步换形，从而导致了与它的初始动机，渐行渐远，最后竟至完全变成了人们自娱自乐的手段。进而造成了今天色彩各异的黄、白、青、红、黑龙，扎制材料不同的布龙、纱龙、纸龙、草龙、钱龙、竹龙、棕龙、板凳龙、百叶龙、荷花龙、火龙、鸡毛龙、肉龙等，群龙竞舞的精彩局面。

曹玉海：朝鲜战场上的“金星”

陈 辉



曹玉海（1923—1951年），莒南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第三四二团第一营营长。

曹玉海1943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重罗山阻击战后，他被滨海支队授予“战斗模范”称号。1946年4月，在阻击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等主力部队抢占战略要地四平的战斗中，他端起刺刀，率领战士们跃出战壕，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守住阵地。战后，他被评为师“战斗模范”。在东北战场上，他参加重要战斗20余次，负伤6次，2次被评为师“战斗模范”，7次立功，获“勇敢”奖章5枚。1951年1月下旬，志愿军38军等部队奉命在汉江南岸组织防御，一营于2月10日奉命坚守武甲山、莺子峰一带阵地。美军骑一师向一营主阵地京安里以北350.3高地发起凶猛进攻，他带领部队英勇反击，不幸中弹牺牲。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然而，这样一位著名的英雄，家乡人民却多年无人知晓。一个偶然的时机才揭开了烈士在家乡无人知晓的谜团。1997年4月，三十八军军史办为筹办军史纪念馆派人到当年滨海抗日根据地的莒南县搜集资料。县史志办公室的同志便问及三十八军中莒南籍的人中有无可入传的重要人物，来人便提到了曹玉海的名字。史志办的同志通过多方调查，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家乡涝坡乡东店头村，揭开了烈士的身世。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涌现出了无数英勇顽强的战斗英雄。在素有“万岁军”之称的志愿军38军中，时任114师342团营长的曹玉海，凭借着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超人的战斗精神，指挥部队多次重创强敌，被誉为“万岁军”群英中的“金星”。

入朝第一战 旗开得胜

众所周知，志愿军第38军在入朝之初出师不利，遭到彭德怀总司令怒骂。然而114师342团2营营长曹玉海，却在这次全军走麦城的战斗中，立了一大功。

1950年11月1日，114师342团作为38军后卫进驻熙川。当时，熙川已成空城。不想342团团部刚安顿好，团长孙洪道还没来得及躺下，就听到调兵号声。孙洪道大喊：“哪里吹号？”说话间已经枪声四响。原来，团炮兵连刚做好饭，正盼着连队来吃饭，一伙人闯进来揭开锅就抢饭吃。炊事员急了：“连队还没到，开什么饭！”这伙人不理睬，只顾抢饭吃。炊事员抓住一个家伙仔细一瞧，竟是李伪军。他乘敌人没反应过来，迅速跑出去叫司号员调兵上来。

听到调兵号，二营长曹玉海果断命令营里干部一人带一个连向团部靠拢。与此同时，一营也抄敌人后路对团部之敌形成了前后夹攻。听到枪响，南朝鲜军第6师也反应过来，他们抢先占领了山上有利地形，敌人布满山野。

曹玉海大喊着：“狭路相逢，勇者胜！”带头冲入敌阵，双方混战在一起，从夜晚一直打到天明，直到南朝鲜军第6师狼狈逃窜。这一仗，二营和一营配合作战，歼敌一个营，光二营四连在兄弟连的配合下就消灭敌人一个机枪连，还抓了400余名俘虏，解救了5名朝鲜人民军女战士，活捉了5名美军顾问，使团部转危为安。

痛歼“帮凶军”战功卓著

二次战役打响后，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溃不成军，穿插包围多国部队成为战役发展的关键。114师342团三营很快攻占了嘎日岭，打开了志愿军38军主力向凤鸣里方向穿插迂回的通路。

11月28日，342团前进到阳站时，出现了新敌情。阳站是介川北面的屏障，有土耳其旅一个营驻守，企图阻挡我军前进，掩护西线美军撤退。

342团一营受命主攻阳站。39年后，时任副军长的江拥辉将军回忆说：“孙团长把任务交给1营，我感到很放心。一营营长曹玉海刚从二营调来，他在国内解放战争后期就是一营营长，对一营非常熟悉。他对我说‘首长请放心！’就去部署战斗。”

曹玉海命令配属给一营的团迫击炮连占领阵地，每门炮准备5发炮弹，瞄准山头待命；命令二连顺公路直插阳站街里，占领村西有利地形，断敌退路；三连主攻，夺取村北高地及东、西两侧无名高地；一连做预备队，紧跟三连前进。

与曹玉海对决的土耳其军，是个强悍的对手。《朝鲜战争我军管理15国战俘纪实》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美俘截然不同的是土耳其俘虏，大都是农、牧民出身，由于习惯于艰苦生活，对被俘初期的艰苦环境，完全能够适应。土俘很少病号，都很健康。多数人整天乐呵呵的，憨态可掬，一副淳朴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但土耳其人在战场上倒挺顽强，我军只俘虏了240余名。”

战斗打响后，三连向一无名高地进攻时，就遇到土军顽强抵抗。曹玉海命令三连把队伍撤下来，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分散进攻。这一招果然灵，土军顾头不顾尾，顾东难顾西，防御体系很快土崩瓦解，三连一下子夺了3个山包。

在三连攻击的同时，二连按照曹玉海的部署神出鬼没直插阳站街里。副连长率领一排突然将手榴弹投入敌群，接着以猛烈火力向土军的汽车和房子射击，不知所措的土军乱成一团。街西响起了马达声，副连长判断土军要跑，立即命令一排直插街西。黎族战士潘学仕抱着机枪冲在前面，一阵猛扫，截住了土军20多辆汽车，一排与其展开了激战，手榴弹在车上爆炸，各种枪支向车上猛扫，土军无处藏身，死伤惨重。

二连的巷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突然，阳站街南又有一个土军炮阵地向二连、三连阵地发起猛烈的炮击。曹玉海命令三连三排长指挥八班偷袭土军炮阵地，战士们每人携带14枚手榴弹，利用夜暗摸到敌炮阵地，随着轰鸣的爆炸声，土军的14门榴弹炮全部报销。

天亮后，红了眼的土军开始在美国飞机的配合下，向三连阵地疯狂反扑，对巷战中的二连也进行了垂死反冲击。二连陷入了土军的包围之中。

危难时刻，曹玉海把预备队一连拉了上去。他亲自带一连从三连左侧往里插，团长孙洪道命令二营往阳站南侧插，对土军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战斗进行到29日

10时，土军再也支持不住了，阳站之敌被全歼。

阳站战斗，曹玉海率一营在兄弟营的配合下，全歼土耳其一个营，在关键地段彻底封锁了美军南逃的退路，在美国的心脏中插了一把尖刀，为二次战役38军歼灭美军3689人奠定了基础。

突破“三八线” 再建奇功

二次战役后，志愿军总部制定了越过“三八线”，相机夺取汉城，南进不宜过远的第三次战役部署。38军的突破地段是汉城的咽喉，是南朝鲜军的重点防御地段。军长梁兴初分析敌情时说：“从这一地段的地形和敌人设防情势看来，我们部队要准备付出艰苦，也要准备强攻。”

114师为主攻师，342团为114师主攻团，从汉滩北岸突破，曹玉海的1营为342团主攻营，以汉滩北岸的一段峭壁石山为突破口。

受领任务后，曹玉海带领各连连长反复勘察突击道路，选定了一条小路作为插入敌人纵深的道路。除夕傍晚，战地风雪交加，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一营官兵披着白布单，静静地隐蔽在风雪地里。

“轰！轰！轰！”万炮齐发，志愿军的进攻开始了。此时，供攻击部队通过的浮桥还没架好。一连连长傅长山大喊一声：“英雄好汉跟我冲！”“扑通”一下跳进了刺骨河水中，带领战士们趟着齐腰深的水往对岸奔去。

一上岸，连长命令一排冲锋，一排长二话没说，带领大家冲了上去。冲在前面的一班长中弹倒下了，排长亲自打头阵，一阵猛打猛冲，击溃了守敌，抢占了第一座山头。一排长没有停脚，带领全排继续扩大战果，一鼓作气抢占了3座山头，每占一座山头不到10分钟。

突然，一排进攻受阻，美军炮弹更加凶猛。傅连长看到1排被敌火力压住，立即亲自率二排从敌人右翼迂回。敌人不久有所觉察，马上转移火力压制二排。利用敌人火力转移的瞬间，一排长带领战士们猛冲上去，三班占领了右翼山头，消灭了敌重机枪手。一班打垮了敌营指挥所，敌人失去了指挥一时乱了阵脚。一排乱中取胜，勇猛穿插，一直追过了大小17座山头，第一座大山被我军占领。

这时，紧随一连前进的曹玉海，发现山下有敌人汽车在运动，他分析敌人要跑，及时命令一连插到公路右翼，占领制高点，堵住敌人。一排长带队赶到离公路不到500米远的地方，发现敌人11辆汽车开了过来，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他立即派一个组打毁了领头汽车，

自己带领其他战士从侧翼攻击其它车辆，公路上火光冲天，敌人妄图夺路逃命，但第一辆车挡住了路，10多辆满载物资的卡车，10多门无后坐力炮，还有4个没被打死的美国兵，都成了一连的战利品。

二连接替一连继续进攻，很快攻占了第二座大山。此时，部队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曹玉海命令二连停止向纵深攻击，先消灭袭击长子洞的敌炮兵阵地。二连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连续拿下两个山头后，从侧后摸到了敌炮兵阵地，三下五除二就把敌炮兵阵地给报销了。

曹玉海看到敌人的炮兵成了哑巴，估计二连得手了，但迟迟不见二连与他联系。根据战场经验判断，曹玉海觉得二连遇到麻烦了。果然，二连在捣毁敌炮兵阵地后，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了，且与营指挥所失去了联系。

曹玉海果断命令三连担任主攻，向二连方向的纵深进攻，增援二连。三连前进到基谷西侧，发现山腰有敌帐篷，连长张同书迅速指挥连队将其包围，用手榴弹一阵猛炸，美军的一个排成了梦中鬼。三连继续往敌人腹地发展，一下前进了20多公里。天亮后，连长张同书发现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原来，三连进攻太快，已经插入了敌人心脏。此时，三连伤亡已非常大，弹药也快光了，且与营部失去了联系。关键时刻，曹玉海相信二连、三连都有孤军作战的胆量和能力，他果断将手中仅剩的一连派出去进攻，他分析如果后退或停止不前，只能加大二个连队的战场压力，惟有继续进攻，才是解救二连和三连最好的办法。此外，三个连队深入敌人纵深，可以牵制几千名敌人，只要能坚持一定时间，后续部队很快就会上来。其后的战况证明了曹玉海的决策是正确的。

三连果真像曹玉海预料的那样，孤军作战越战越勇。在抢占最后一座山头的战斗中，连长张同书不幸中弹牺牲。三连官兵连续战斗了20个小时，直至曹玉海带一、二连和大部队前来与他们会师。这一仗，一营攻击前进了20多公里，攻克敌10多个支撑点，共歼美军420余人。

鏖战骑一师 壮烈殉国

1951年1月25日，第四次战役拉开了序幕。38军的任务是死守西线，掩护东线出击。

350.3高地是通往汉城的要冲，其前方是美军骑兵第一师两个团据守的京安里。面对美军“王牌”，114师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坚守350.3高地的任务交

给曹玉海领导的342团一营。

342团孙团长要求曹玉海，“一定要坚守到12日下午3点钟！”114师师长又做了一条特殊规定：“曹营长报告情况的时候，把别的电话都放下，紧急情况可直接向师指挥所报告。”曹玉海感到了师首长对一营的器重，也感到了肩上的压力。

师团布置任务后，军指挥所又通知曹玉海，说军首长要接见他。江拥辉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敌人要突破我军防线，342团一营阵地首当其冲。为了使这一突出阵地的坚守防御任务完成得更好，军指挥所特地将1营长曹玉海叫来，由我亲自同他谈谈军里的决心。入朝前，在军的战斗英雄会议上，我见过曹玉海一面。入朝作战以来，从一次战役到三次战役，由于他带兵作战表现出色，常常听到114师师长翟仲禹讲到他的故事。这次他一见到我，便像老熟人似的紧紧握住我的手。他瘦高个儿，两眼有神，气宇轩昂，精神饱满。曹玉海的精悍、乐观、有胆识，使我觉得一营有这样的营长指挥作战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曹玉海从军里回来的第二天，美军骑一师就发起了猛攻。2月11日，骑一师的坦克、火炮和飞机把山头轰得没有一块完整的工事。傍晚，骑一师终于攻占了二连的276.8高地。

二连阵地失守了，上级却夸曹玉海指挥高明。原来，二连阵地突出在前沿开阔地上的一座孤立的制高点上，地图上叫276.8高地。而1连阵地在二连阵地正后方，从地形和现有火力来看是难以支援二连的。开始营里的干部意见不统一，多数人主张舍弃这块阵地。曹玉海却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这块阵地白扔了，350.3高地就完全暴露给敌人，上级要求我们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配合东线反击，而不是死守阵地。二连这个阻击点不能白白送给敌人，要让美国佬付出代价。因此，我们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一连，二连做机动防御，捞了便宜就撤。”

二连在276.8高地这个小山包上，坚守了一天，使骑一师付出了130多人的代价，实现了曹玉海的战斗设想。二连后撤以后，曹玉海根据战斗发展情况，很快把指挥重点放在了350.3高地前面的三连。他对三连的干部说：“你们要学习二连的经验，注意保存实力，机动地使用兵力，现在我们要一个人顶十个人用才行啊！”曹玉海接着说：“大家一定要严格射击纪律，敌人步兵不进入我们火力网不准打！等敌人走近了先打手榴弹，然后再用排子枪和轻机枪猛打！”

2月12日，骑一师一个团在50多辆坦克、50多门榴弹炮和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350.3高地猛攻。黑黄



色的硝烟和灰尘掩盖了太阳。三连主峰的小山包被美军坦克炮打得要翻了个似的。滚滚硝烟尚未散去，骑一师半个团的步兵蜂拥而上。“靠近点、再靠近点打！”曹玉海在营指挥所中高喊着。

80米、60米、50米，敌人进入火网了，三连长赵连山大声喊道：“轰大堆！”一阵手榴弹甩向敌群，凌空开花。“瞄脑袋，穿蛤蟆！”赵连长再喊道。顿时，猛烈的机枪，把美军扫得像树桩一样向山下滚。骑一师又一次被打退，阵地前留下200多具美军尸体，战场暂时平静下来。

“不能轻敌啊！”曹玉海嘱咐赵连山连长，“现在阵地上还有六十几个人，却要抗击半个团的敌人，残酷的战斗还在后面。”果然，美军的炮火又呼啸而来，骑一师的第4次进攻开始了。敌人在空地火力联合掩护下，由3路进攻变成了5路。曹玉海指挥一营狠狠地向美军开火，美国佬像墙一样一面一面地倒了下去。接着，又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就这样一次次地反复着。骑一师像输红眼的赌徒，死尸在山坡上都擦了起来，仍像人海一样往上冲。

曹玉海把预备队全部用上了，战斗越来越激烈，人员越来越少。副师长宋文洪打电话问曹玉海能不能守得住，有什么困难，师领导已经看出情况的严重性。曹玉海知道全军与敌人的战斗都进入白热化阶段，已经没兵可调，他在电话中有意轻松地说：“三号首长，有我曹玉海在，你就放心吧！”

团长孙洪道知道曹玉海那边的情况已经千钧一发，他直接向军长梁兴初请示要一个营支援曹玉海。军长没兵可给，还死令他们利用现有兵力必须坚持到下午3点。

孙洪道心情沉重地拿起电话：“曹玉海，现在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坚持到下午3点？”

“团长，你放心吧，有我在，美国人就上不来！”

这时，通信员跑进来报告，有一股敌人从后面迂回过来，包围了营部。曹玉海感到情况紧急，向孙洪道说：“团长，我向你告别了！”孙洪道心头一震，连声呼叫：“曹玉海、曹玉海……”可是他再也听不到曹玉海的声音了。孙洪道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哭出了声。他撂下电话，要亲自跑到350.3高地去，被团政委王丕礼强行拉住。

曹玉海放下电话，顺手拿起驳壳枪带领营部人员冲了出去：“把敌人打下去！”曹玉海一边大喊，一边跑在面向美军开火，一梭子撂倒了几个敌人。战士们见营长冲锋在前，一股劲把敌人打了下去。突然，一阵枪响，曹玉海不幸头部和胸部中弹。倒了下去，他拼出最后一口气喊道：“注意监视敌人！”

满山遍野响起了“为营长报仇！”的喊杀声。

教导员方新带领战士们与冲上来的美军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他拣起一发迫击炮弹，引燃了引信，呐喊着冲进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一营在弹尽粮绝后，硬是用刺刀、石头将美国兵赶下了山。最后只剩下身负重伤的三连长赵连山等十几个人，但他们仍顽强地坚守到增援部队的到来。

曹玉海和1营的勇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打退了骑一师7次进攻，奇迹般地守住350.3高地，歼敌680人，保证了我军东线顺利出击。

志愿军涌现出的群英如群星照亮了朝鲜的三千里河山，而曹玉海无疑是其中一颗耀眼的“金星”。

蒙山称名探源

王鸿烈



蒙山，又名东山、东蒙，主峰龟蒙顶坐落在平邑县境内。蒙山在古代曾是一座宗教文化名山，有“岱宗之亚”的称号，近代又因是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而闻名遐迩。但它为什么以“蒙”称名，作者不揣简陋，略陈管见。

大凡山川的得名，多由来于本身的主要特征，如东岳泰山，古时作“大山”，“大”字读“太”音，即大山的意思；西岳华山，因其形似莲花，华与花通；东北的长白山，因石色多白；新疆的火焰山，因石为红色；黄河因其水浊色黄；长江因其源远流长等等。也有因历史人物或物产得名的。或象形，或状体，或表色，或传史，莫不名实相符。那么蒙山的“蒙”字，其确切的涵义是什么呢？这在我国古典名著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中可以找到答案。《易经》六十四卦中第四卦是“蒙卦”，其卦体符号是艮上坎下，艮代表山，坎代表水，艮上坎下的卦象，即象征山下有水；另外，坎又象征凶险，艮又代表停止，因此，解释蒙卦卦象和卦义的彖辞说：“山下有险，险而止，蒙。”“山下出泉，蒙。”对此，三国魏王弼注解：“退则困险，进则阂（阻隔之意）山，不知所适，蒙之义也。”又说：“山下出泉，未不知所适，蒙之象也。”我们再看看蒙山的形势，它绵亘于鲁中南大地，跨平邑、蒙阴、费县、沂南等县，层峦叠嶂，云雾弥漫，给人以深邃莫测、晦冥难辨之感；千峰耸峙，万壑争流，常陷人于山重水复、进退无路之境地。蒙山的形势，不正是蒙卦卦象的标本吗？反过来，蒙卦卦义也正是蒙山形势的写照。再者，上古时期的蒙山，被洪水包围着（《尚书·夏书》：“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当比以后的蒙山险恶得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蒙山的“蒙”字有山水相连，形势险峻，深邃莫测，使人迷茫之义，简言之，蒙山即险峻莫测之山。

大家知道，八卦符号“是先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抽象，是先人们关于自然界中各种认识对象其中包括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概括抽象”。（周山《易经新论》）八卦符号的抽象过程，战国时期的学者有此描述：“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后来重叠推演成六十四卦，其表现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六十四卦卦名的产生也是先人望形生义，寓意于形，取诸自然的结果。由此推知，蒙卦或因蒙山而得名，蒙山则因蒙卦而名义得彰。

蒙山与蒙卦的关系，前人已经有所论及。光绪《费县志》载，金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在蒙山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玉虚观（今万寿宫）石碑碑文《蒙山祈雨记》中，引道书《灵宝经》、《岳渎洞天图》描述蒙山形势说：“东蒙，靖庐福地，东浮云气口接于蓬莱，西根连于三宫空洞之天，南隶衡岳为佐命，北重艮坎为蒙卦，中有靖庐仙宫，神仙僚佐万众，主校罪福生死之籍……”。这里谈到“北重艮坎为蒙卦”，按文王后天八卦图。坎代表北方，艮代表东北方，如果登上龟蒙顶，放眼向北及东北方望去，陵谷千重，一望无际，正是蒙卦卦象的实际反映。

其后，清乾隆皇帝在诗中也谈到蒙山与蒙卦的关系。乾隆多次下江南巡视途中，有六次驻跸于蒙山脚下，写了多首咏蒙山的诗，其中乾隆十六年（1751）写的《望蒙山雪色》：“崇峦积雪昔年同，圣祖巡踪景仰中。奄有海邦为鲁镇，果然山下出泉蒙。逢年民鲜饥寒色，敦俗户多淳朴风。百岁熙和九州晏，自维奚以继鸿功。”其中第四句，用“果然”二字肯定了蒙山真是像蒙卦象辞说的那样“山下出泉蒙”。

蒙山见于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书经》和《诗经》，《书·禹贡》载：“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意思是说淮沂二水经过大禹的治理，蒙山和羽山地区已能种植作物了。但据考据家考证，《书经》内容多系后人伪托，《禹贡》一篇也是后人追述之作，成书时间不能肯定。《诗经·鲁颂·閟宫》有“奄有龟蒙，遂荒大东”的诗句。说明鲁国东境拥有龟蒙二山。据袁梅《诗经译注引言》，《诗》的创作年代基本在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閟宫》一诗是歌颂鲁僖公（公元前659年～前627年）政绩的，其创作时间当在公元前七世纪或者更晚一些。由此知道，蒙山之名见于《诗经》迄今至少已有2600多年了。

东蒙一名，见于《论语·季氏》孔子和学生冉有的一段对话：“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

《论语·邢疏》：“蒙山在东，故曰东蒙”。蒙山在的“东”字，当指鲁国国境的东部，鲁国境内只有一个蒙山，且颛臾城就在蒙山脚下，毫无疑义，孔子说的东蒙，就是《诗经》上说的“蒙”，在“蒙”字上加一“东”字，意在指明其方位，因此说“东蒙”不过是当时的俗称而已。

至于“东山”的称呼。见诸《孟子·尽心》“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孟子说的这个东山指的是哪个山呢？据《孟子》孙奭疏载：“孟子言孔子登鲁国之东山而览者大，故小其鲁国，以鲁国莫大于东山也。”这里孙奭虽未明指“东山”即蒙山，但已圈定是鲁国之东山，非他国之东山，进而推之，鲁国东境有龟山和蒙山，但龟山高度面积与蒙山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联系孔子说的“东蒙”可以断定孟子说的“东山”，即今临沂市境内之蒙山，“东山”只是蒙山当时的俗称而已。这犹如过去的城门，都有一个雅名。可是人们在交谈中，往往不呼其名，而以“东门”、“西门”称之，听者不会误解。现在蒙山西麓的人们，还经常以“东山”代称蒙山，此种情况恐怕是古今相通的。杨伯峻《孟子译注》注释：“东山：当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这是很有见地的。现在平邑县境内有传为孔子登东山途中住过宿的“子宿村”，纪念孔子与老莱子门徒相遇的“遇圣桥”，以及龟蒙顶上“孔子小鲁处”、“圣憩石”等遗迹，可谓事出有据，不为无因。

蒙山旧称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现在调查仅平邑县境内有名的山头就有1076座，他们的名号有的俗，有的雅；有的载入地方志书，有的仅流传于群众口碑。就其大者，俗分在东者称东蒙，中间者称云蒙，在西者称龟蒙。清《大清一统志》：“蒙山高峰数处，龟蒙，云蒙，东蒙，其实一山，未尝中断。”由此得知，俗分的“云蒙”、“东蒙”等，只是蒙山山脉某一山峰的称呼。

蒙山，古今名山，鲁南重镇，一区之地望，循名责实，确有必要，仅述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古城隍庙

城隍庙张大胆遇鬼 佑德宫庄小眼遭报

郡城城隍庙建于明代，其阎王殿内的泥塑甚是恐怖，牛头马面、刀山剑树、油锅锯解，令人看了毛骨悚然。故胆小者从来不敢观看，更传说夜间有鬼判出没。城内有人名唤“张大胆”，从来不怕鬼神，这一日晚与数友人打赌，众人道你若能今夜将这木撅钉在阎王殿的地面，明日就请你喝酒。这张大胆接过木撅，直奔庙内，进入阎罗王殿内，昏暗中将木撅钉入地面，当他连忙起身时，再也起不来了。顿时，吓了一身冷汗，越想越害怕，难道真的遭到报应了吗？用力再起时，依然还是不动，越想越害怕，最后吓得休克了。庙外他的朋友久等不见他出来，想一定出事了。大家打着灯笼进入庙内，只见张大胆倒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但也拉不起他，用灯笼一照，原来张大胆钉木撅时没有注意自己的衣衬，被木撅一起钉住了，所以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被大家救出后，回家大病数日，再也不称“张大胆”了。

却说城隍庙两侧还有两座庙，一座是龙神祠，内祀龙王，再西是一座大庙“佑德宫”。宫中殿宇甚多，最后一座大殿内供一观音铜像，高达三米，乃明泾王捐资所铸。这观音像头戴

五佛冠，上有五尊小佛，甚是玲珑。这五尊小佛又引出一段故事。这庙东有一杨家园巷，巷中有一破落户，浑名叫庄小眼。这人生就的两只小眼，善于夜间行窃，因吸毒手中无钱，又来打这铜观音的主意。他买了一把钢锯，趁夜间无人，偷偷进入佑德宫，直奔观音殿内。这庄小眼爬到了铜观音的左肩，但他站立不住，于是将右腿用绳子捆在菩萨的左肩上，取出钢锯开始锯小佛，哪知这钢锯的声音猛然一响，住在铜观音体内的黄鼠狼被惊动出来，满殿乱窜，并发出恐怖的叫声。庄小眼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以为观音“显灵”，吓得将钢锯掉在地上，当他想逃跑时，哪知右腿又被自己捆住。因心慌手慌，他又结一个死扣，怎么也解不开。时间一长，天气又冷，这庄小眼被冻僵在铜观音的左肩上，直到天明才被人发现。他被救下后，生了一场大病，差点丧了命，人家都说他遭到了报应。

涇王府文物留后世 光禄第园林话当年

明朝弘治年间，沂州府封来了一个藩王。他名叫朱佑橚，乃明宪宗十二子。弘治四年封，十五年就国，在临沂城正中建一王府。东起八小集巷，西至今考棚街北至今兰山路。这位藩王在临沂城做了几件好事，至今还造福于民。第一件开挖了临沂城的第一条人工河——北涑河。将涑河水引至城围，便利了居民的饮水。第二件是疏浚了泥沱湖，使湖区居民免遭水患。此外，他还修复了不少名胜古迹，如朱陈的宝泉寺、城内的普照寺、西关的东岳庙。这位藩王薨于嘉靖十六年，因无子而国除，但至今还给临沂留下了重要的文物。一是现存的孔庙大殿即是由王府大殿的建材而建。二是封藩时朝廷赐的太湖石，乃宋徽宗花石纲中的一块，后被金人运至今北京的北海，明代封藩时皆赐石一块充作镇宅之宝。此石如今还保留在华东革命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西侧。三是涇王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解放后也移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前保存至今。太湖石和石狮是两件难得的文物。特别是那太湖石的背后还保留着当年宋徽宗时所刻的道教符策。这太湖石就见证了花石纲的运送、开封良岳的繁华、金人拆运燕京的过程、元明时北海琼岛的变革及运来临沂的历程。游烈士陵园者当知此件文物的历史价值。

临沂城还有处大的园林——光禄大夫第，俗称刘宅。至今还有刘宅后巷的名称。当年这座园林是临沂唯一一座江南风格的园林，在今王羲之故居的西侧，洗砚池的西部大麦汪也被圈入府内，故其东接王羲之故居，西至西城根，北到今刘宅后巷，南到洗砚南街。其大门坐西向东，上悬一大匾黑地金字“光禄大夫第”，门旁

还有一对石狮，正对着普照寺，门前还有一片水连着洗砚池。

这座园林的主人是谁呢？原来，他并非临沂城人，而是沂水县的一位大名人刘侃。这刘侃做过福建都转盐运使副使，被清廷诰授中大夫，致仕后择址在临沂城建了这座园林。因他在南方做官多年，对南方园林非常留恋，故此在郡城建了这一座南方的园林。进入正门，就是用奇石建造的假山，山后是一长廊，廊南面临一片湖水，长廊中段建有一水榭。水榭对面是建于湖中的戏楼。主人经常在此看戏，还在湖中划船。园林后面为主人居室，四面建有四座小巧玲珑的厅堂，分别称为琴、棋、书、画轩，也是主人的游乐之处。在林子西南部还有一寺院，名西来庵。只因这西来庵，却伏下了这座园林毁灭的原由。

园林主人传了几代直至民国年间，主人还是每年夏天来此避暑，秋后返回沂水，只留下一个管家和几个家丁看守。民国十年的三月十五，刘宅西面也就是西城门外路南的泰山行宫逢庙会，西崔家巷准提庵的一尼姑在泰山行宫参与法事。回庵时路过刘宅，被看宅的管家看见，顿时心生邪念，假意称请尼姑进宅看西来庵的菩萨。尼姑不知是计，被骗入刘宅，管家兽性发作将其强暴。事后，这尼姑向众善主诉说，众善主立即将这恶奴告到县衙。县知事当即将其拘捕，并把沂水的主人传唤到案。除对恶奴进行严惩外，对主人也进行罚款。主人即刻决心废掉这座园林，拆除后卖掉地产，只剩下门前的一对石狮，成为这座园林的见证。可惜这对石狮在“文革”时也被毁掉。从此，这座“光禄大夫第”就从临沂城的地图上消失了。

毛泽东题字四海通用 王墨仙书匾三点有理

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既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也是一处书法荟萃的艺苑。为大门题字“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的是舒同先生，为纪念塔题字“革命烈士纪念馆”的是毛泽东。这是毛主席专门为陵园而题的，此后他处建陵园皆是从临沂复制过去的，像济南英雄山陵园、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等，这说明领袖题字非常慎重，不是到处都写，也说明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真正的书法家。

陵园第二大建筑的题字“革命烈士纪念馆”，一般人不知为谁所写。当时的领导人都很谦虚，像赵建民同志只写了罗炳辉石像亭的匾额。这“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大匾由谁写呢？经过一番议论，大家公推辛亥革命老人王墨仙来写。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堂

王墨仙，名王讷，字墨仙，是山东最早的同盟会会员，民国有名的书法家，辛亥革命后一直在济南隐居。当时，由临沂建塔委员会副主任邓月楼先生前去求字，王老当仁不让，马上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堂”七个大字，但制作时发现“烈”字下面只写了三个点，大家不解其意，只好又去问他。他说道：“革命烈士精神不死，我写三点，不写四点，这‘不四’就是‘不死’的意思！”听了这番解说，大家都说写得好。这样，刻好的大匾上的“烈”字下面只有三个点了。

商家巷范筑先卖字 琅邪冢李占彪盗墓

临沂城的西北隅的教堂后有一小巷。因商姓最早在此居住，故名商家巷。这商姓人家以制造火碱出名。商家用碱土和青灰土法制作食用碱和洗刷用碱，因此而发财。

范筑先任临沂县长时，商家的老父亲病故。儿子要为父亲出大殓。灵前要题写铭旌（竖在灵柩前标志死者官职和姓名的旗幡）。因商家无功名，故举人秀才皆不给题写。消息传到范筑先处，他正愁着修“老明堂”（盲人和孤寡老人养济所）缺少资金，马上让人通知商家，他要亲笔题写，但要收大洋200元的润笔费，商家得知阖家高兴。立即派人送去大洋，范县长给题写了“孝行可嘉”四个大字。商家视为最大的荣耀，修建“老明堂”的资金也得到解决。从此，传出了范筑先卖字的故事。范筑先离开临沂时，全体盲人送到东桥头（老桥）放声大哭，不让清官离开。范筑先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范筑先任县长时，临沂城驻着军阀一个旅，旅长名李占彪。这李占彪不学无术，只知吃喝玩乐，向地方敲诈钱财，但却是个古董迷。他霸占了南关张趴鼻的一部震前集柳拓本，又强夺了拔贡狄建鳌的全部青铜器。当他发现城东关的琅邪冢时，向人询问得知是一座古王墓，便心生盗墓之计。他先进行了打探，然后突然戒严，派工兵挖墓。在墓南开挖墓道，两天后挖到墓门，发现石门被打碎，而且墓中充满了淤土，富有经验的几个士兵告诉李占彪：“此墓被早年盗过，宝物已空，且是‘土洞子’，无法再挖了。”李占彪只好作罢，事后却传出了他盗得不少宝物，落了个“临沂孙殿英”的骂名。此后，范筑先在墓上建亭，四周广植松柏桃杏，辟为临沂城第一座公园。文革时，此墓被彻底破坏，挖开后为有一主室、六耳室的大型砖墓，出

土玉衣片和玉璧、玉剑格等文物，从而证明这是东“汉临沂第一代琅邪王刘京的坟墓，解开了千古之谜。墓中出土的玉剑格及一截铁剑尚存于市博物馆中。

墙缝巷一门双忠 洗砚池三教数庙

临沂老城城隍庙西侧路南有一小巷，名叫墙缝巷。因该巷十分狭仄而得名。此巷的北出口仅容得一人出入，故很少人出入此巷。而此巷内却住着一户有名的人家孙氏。这孙家世代儒业，民国年间孙家依然教学，有名的教师孙德绍，其夫人张炳姝，非常贤惠，生有二子，长曰善师，次曰善帅。这孙氏兄弟二人是临沂最早的共产党员，在临沂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孙善师同志于临沂省立五中毕业后又考入山东省立高中，于1926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临沂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29年10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建立，他任组织委员。1932年6月建立中共临郯县委，他又担任了组织部长。其弟孙善帅在他的影响下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们兄弟都是中共党员，其父母皆拥护革命。故其家因处于少人经过的墙缝巷，成为了一个安全的活动地点，不知在此巷中开了多少次会议，皆平安无事。开会期间，其母张炳姝在巷口做针线、放哨、查看敌情。兄弟俩被捕押往济南，于1933年9月18日被韩复榘杀害。如此不被注意的一条小巷却因出了两名烈士而被传名。解放后因墙缝巷名字不雅，有人建议改为双忠巷，后因巷不存在而未果。

临沂城的西南隅有一片很大的湖水，那就是有名的洗砚池，而民间俗称大麦汪。因秋后水落后可种大麦。其面积甚大，东起高台庙，西至西城墙根。汪的南北分别建有很多的寺庙，成为一组很大的古建筑群。

汪的东段俗称洗砚池。池东建有一座关帝庙，乃明征西将军杨肇基所建。因建于一高台上，故名高台子庙。庙东一巷，巷内建一道观，名万寿宫。巷东有五贤祠。洗砚池北侧是一片大的古建筑群。其最高处建有普照寺。寺左有右军祠。祠西有忠孝祠。再西是万善庵、武庙、琅琊书院。池南建有玉皇阁、广生宫、昭忠祠、左公祠、陈将军庙、僧王庙。池水西部为古城内最大的一处园林——光禄大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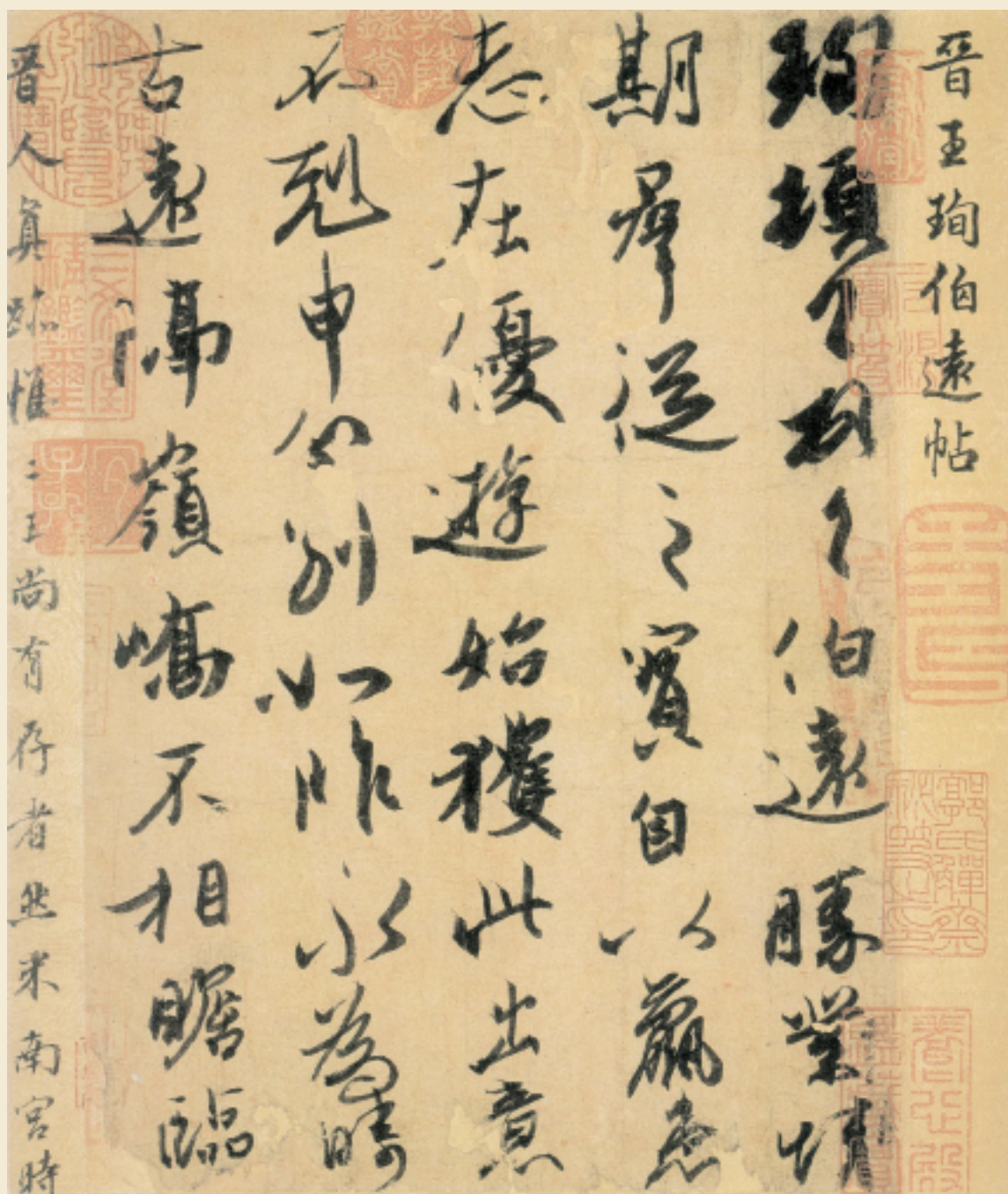
洗砚池三教是：琅琊书院是儒，普照寺、万善庵是佛，其他的是道和名人祠庙。一处园林即是刘宅。名人纪念祠分别是：五贤祠，内祀诸葛亮、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右军祠内祀：王右军、王献之、智永。忠孝祠内祀：曾子、诸葛亮、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宋鸣梧七人。左公祠内祀民族英雄左宝贵。陈将军祠内祀陈国瑞。僧王庙内祀僧格林沁。昭忠庙内祀清代战死的兵将。

(未完待续)

笔精墨妙 历久弥新

——王珣行书《伯远帖》

胡拙安/辑



王珣（公元349-400年），字元琳，小字法护，又称阿瓜、东亭、短主簿。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少以清秀闻名。弱冠时与陈郡谢玄同被大司马桓温辟为掾（即属员），转主簿。时桓温经略中原，军中机务并委于王珣。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有战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给事黄门侍郎。52岁时卒于家，谥献穆，追赠东骑将军、开府。王珣善书，以才学文章见称。北宋时仍有其草书《三月帖》和行书《伯远帖》存世，现只存后者，为古代法书瑰宝。

清乾隆时期，在戒备森严的内府，有一个小暖阁，名曰“三希堂”。所谓“三希”，是指三件东晋时期的稀世法帖，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法帖，以王羲之的最为有名，但最为珍贵的是王珣的《伯远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唯有王珣的《伯远帖》是现存东晋唯一出自名家所书写的真迹，而其他两件均为后人的临品。

这件作品的流传也颇富有戏剧性：北宋时期曾入宣和内府，后来流入民间，清乾隆时再入内府；清朝覆亡后，此帖为瑾太妃携出宫外，辗转为郭宝昌收藏，后被典当于香港一外国银行；1951年典当期满，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将此帖与《中秋帖》同时以重金购回，收归国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件作品之所以有如此曲折的流传过程，主要是由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所决定的。

下面我们先来看这件作品的内容。这是王珣写给堂兄弟王穆（伯远）的一件手札（见图），内容为：“珣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大意是：“伯远卓有成就，衷心希望你是诸多从兄弟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因疾病在身，志趣在于优游自在地生活。此次方始获得出任，意愿不能舒展。分别好似昨日，却如同畴古之长。远隔崇山峻岭，不能相互造访晤对，真令人遗憾。”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中引江南谚语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古人交通不便，相互见面十分不易，书札往来就成为主要的交往方式。因此，古人都非常重视书札的整齐、俊美，意在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印象。优美的文辞和精到的书法融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的确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王珣的《伯远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伯远帖》，纵25.1厘米，横17.2厘米，行书5行，共47字。该帖用笔洒脱，自然灵动，通篇流露着一种冲淡、恬静之美。开篇“珣顿首”三字用笔厚重，行笔缓慢，颇具隶书遗意，而后则愈写愈为洒脱、流利，一气呵成，不加迟疑，堪称文采风流、卓而不群。从用笔上来看，此件作品多以侧锋出之，且起笔皆顺势出锋，任笔为之。如“远”、“之”、“以”、“永”、“相”等字，几乎笔笔侧锋，似有飘浮之弊病，但由于随时参以隶书笔意，因此使得每一个笔画都达到了灵动而不轻滑、飘逸而不虚浮的艺术效果。从结体上看，这件作品依然遵循着隶书横张外拓的结字规律，字形大多取横势，笔画多作弧状，如“远”、“从”、“游”、“永”等字，伸展自如，犹如一叶叶扁舟，荡漾于碧波之间。再比如，两个“不”字的撇笔都有翻挑之意，“远”、“从”、“游”三个字的捺笔亦然。从章法上看，这件作品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不经意之间随时调整，随时变化，用笔或轻或重，字形或大或小，结体或平或斜，使整幅作品和谐统一，浑然天成。

此帖流传久远，广受赞誉。明书画家董其昌评其云：“晋人真迹唯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乎。视大令不尤难覩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明末顾复《平生壮观》一书云：“《伯远札》……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清安岐《墨缘汇观》谓其“有自然沉着之气”。近人杨守敬《平帖记》云：“珣为洽之子。《宣和书谱》称其家世学，草圣有传。今不见其草迹，即此真行，已足名家。观其下笔，力变右军父子，而无一笔诡于正，所谓纵任自喜，古雅有余者也。”

浩气壮山河 诗魂育后人

——《沂蒙诗话》之四（上）

李兴河

沂蒙圣地，山明水秀。天光霞影里，仿佛闪现着革命先辈的英姿笑容；长河涛声里，依旧回荡着革命先辈的壮美诗魂。在这块奉献的土地上，革命先辈立下了功在千秋的伟业，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章。“血性文章血写成，党人风格万年贞。”（郭沫若语）革命先辈的诗篇，洋溢着爱国爱民的壮志，蕴含着坚强不屈的浩然正气，寄托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显示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瞻容思功，读诗励志。学习这些用热血凝成的诗篇，不仅能重温那艰苦的战斗岁月，进而增强对革命先辈的崇敬缅怀之情，也能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斗志，弘扬正气，坚定信仰，使我们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努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



王尽美

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原名王瑞俊，字灼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市）一个佃户家庭。1918年春，离开家乡到济南求学，寻找革命真理。临行前，他赋诗抒怀：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诗的首句是向着旷远迷茫的大地发问：这世间的升沉起伏由谁主宰？这句问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到底应该由谁来主宰国家兴衰和人民祸福的命运？诗的第二句说，古往今来，社会的大变革都经过激烈的斗争。诗的第三句说，大浪淘沙，泥沙都被潍河之水卷入了大海。诗的第二句说，只有村前巍峨的乔山历览着沧桑的变化。诗中抒发了王尽美救国救民、变革社会、改造中国的壮志理想。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被选为省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国反日组织，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发表言说，怒斥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暑假期间，他参加济南暑假讲演团回到家乡，宣传反日爱国，抵制日货。7月，他用当时流行的《长江歌》的曲调，另填新词，向群众教唱《长江歌》：

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
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
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
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

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忿怒声，
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
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
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

这首歌词慷慨激昂，充满爱国热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起来爱国反日、保护国家的神圣主权。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1920年，王尽美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1921年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领导小组的工作。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名义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会后，他写了一首诗《赠友人》：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流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诗表达了他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并为此改名叫王尽美。

1922年1月，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8月，他参与制定《中国劳动法大纲》。9月，奉派去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是年，《山东劳动周刊》上发表了 他的诗《无情最是东流水》：

无情最是东流水，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几人从此看分明。

这首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困苦情况，表达了对广大劳动人民血泪生活的深切同情，对剥削者压迫者的无比愤恨。

1924年他写了《革命天才明》五首诗：

其一 对工人
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
工人无政权，世道太不公；
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

其二 对农民
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
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
农民擦亮眼，革命天才明！

其三 对店员
店员白劳动，财东吸血虫；
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
工商联合起，革命无不胜！

其四 对学生
反帝反封建，“五四”大运动；
打烂旧社会，民族才振兴；
同学快觉醒，革命学列宁！

其五 对士兵
小兵死千万，大官立了功；
为何打内战，道理讲不清；
枪口要对外，反帝是英雄！

这组诗诗意深刻，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心声，诗句通俗易懂，合辙押韵，很受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和店员的欢迎。

王尽美长期为革命奔波，忘我工作，物质生活艰苦，积劳成疾。1925年8月19日，与世长辞，年仅27岁。建国后，毛泽东在青岛视察工作时，曾特意向山东党的负责同志讲起王尽美，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去武汉途中，深情地怀念起王尽美，在列车上写了一首《忆王烬美同志》的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二)

刘之言（1905~1933.7.9），原名刘兆逊，表字之言。山东郯城县马头镇人。1923年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党组织派遣，回乡进行革命工作。他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29年他写了《“五三惨案”纪念歌》、《“五卅惨案”纪念歌》两首诗。《“五三惨案”纪念歌》中说：

战云弥漫，
国事凌乱，
惨淡过“五三”。
倭奴逞凶，
军阀逃窜，
历下血花染遍，
明湖水呜咽。
今朝忆当年，
烈士死无怨，无怨！
河山摧残，
永久乐园将来会实现！

到今日团结精神涣散，
看，多少人已跑出革命战线，
看，多少人已和仇敌亲善！
民众痛苦含冤，
阴惨，阴惨！
吊烈士莫空咨嗟，
吊烈士不用花圈，
只要，只要奋斗精诚，
和烈士一般。

“五三惨案”，又称“济南惨案”。1928年5月3日，日军侵占济南，奸淫虏掠，屠杀中国人民五千余人，造成惨案。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刘之言在诗中强烈谴责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揭露了反动政府与“仇敌亲善”的丑恶行径。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和烈士一般”去奋斗，“永久乐园将来会实现！”诗中充满了对敌人的恨，对人民的爱，表达了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五卅惨案”纪念歌》中写到：

可敬的工人，
可爱的学生，
提起了决心，
挺起了胸膛，
把民族的命运，
向同胞们演讲。
敌人手里的枪，
就向群众乱放。
许多无辜的同胞，
死的死，
伤的伤。
租界的大马路上，
尸首满地，
鲜血汪汪。
是民国十四年，
是五月三十日，
愿我们兄弟姐妹，
大家牢记不要忘。
敌人待我，
这样凶横，
此仇不报，
真无心肠。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被英帝国主义逮捕100多人，随后

群众万余人，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10余人，伤无数，造成“五卅惨案”。“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刘之言在诗中对工人、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热情赞美，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给予强烈谴责，号召人民牢记国仇，团结奋斗，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

1932年5月，刘之言任中共郯城县委书记（9月改为中共临郯县委书记）。1933年7月，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与郭云舫等领导了“苍山暴动”。宣布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他任政治委员。同时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暴动失败，不幸被捕，从容就义。

徐腾蛟，字孟章。1898年生。山东郯城人。1930年春，党的活动在郯马一带积极展开，徐腾蛟的家经常成为党组织召开会议的场所。1932年10月，徐腾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徐圈子村党支部书记，在家乡一带开展党的活动。1933年7月参加“苍山暴动”，任中国工农红军郯城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其间写下《立志》诗：

男儿立志比钢坚，革命不成誓不还。
儿女寻生各自去，信仰马列天地宽。
公仇不报目不瞑，私怨无偿心甘。
埋骨何须家园地，祖国到处是青山。

诗中表达了投身革命的坚强意志，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苍山暴动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他疏散队员隐蔽到邳县境内，待机行动。后召开地下党员骨干会议，讨论发展工农武装等。9月14日，当地反动豪绅向官府告发，徐腾蛟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9月19日，英勇就义。

安哲，原名安丰铎，字建亭。山东日照人。1906年生。1921年春，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去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大批共产党人被反动派杀害。8月，安哲被党组织安排回济南任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临行前，他与在武汉的同乡战友郑天九、牟春霖互相勉励，写了《别友人》这首诗来抒发情怀：

踏上长途，而今分散，
肠空断！
道路茫茫何时转，
只有遥相盼。
但是我们是弱者的先锋，
一条火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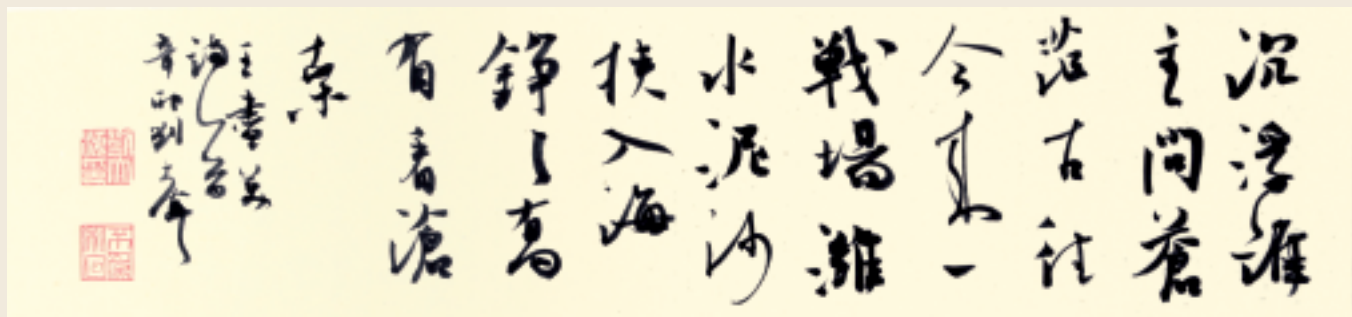
聚也罢，离也罢，
意志精神总长贯。
何憾！
朋友，我去了，
预期着在奋斗中重见。

诗中表达了革命者坚强不屈的意志精神，在革命暂时出现低潮时，仍坚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并相互勉励，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英勇奋斗。

1928年春，安哲奉省委之命回到日照，组建起中共日照县委，安哲任书记。郑天九、牟春霖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1932年春，中共日照县委改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安哲任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10月，日照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组织发动武装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安哲任暴动总指挥兼北路指挥。暴动队伍虽英勇战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日照暴动失败后，安哲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捕，辗转到大连，继续开展党的工作。1933年4月，化名王德海，任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6月23日，因叛徒出卖，安哲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狱中，安哲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安哲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不幸于1934年冬牺牲在奉天监狱里。牺牲前，他向狱中难友们朗诵了这首《狱中诗》：

我们的心的火焰在熊熊地烧，
我们的急流的血在激动地跳，
起来，工作，工作，
灰暗的雾正弥漫在云霄。
用赤裸的手与足，
把塞途的荆棘踏折了；
用鲜红的沸腾的血，
造成一座虹的桥。
天国不在幻想者善美的梦境里，
天国是靠人间的前驱者的工作与勇骁。

诗中表达了革命者火热的革命激情，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努力为党工作，披荆斩棘，为实现美好理想而英勇奋斗的心愿。（未完待续）



刘大海书王尽美诗

蒙山南麓旧石器早期遗存的发现

徐淑彬

一、在中科院里意外发现了考古线索

在蒙山南麓的平邑县白庄村西南，有一处叫做小西山的丘陵。1995年，因为村民开采石料，发现了动物化石。当地有一位叫做常传玺的老师，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到古生物学家郑绍华研究员的重视。该所派出野外考察小组，对小西山裂隙中的化石堆积进行了科学试掘，获得了一批珍贵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标本。

1996年冬，笔者赴京与古脊椎所谈合作课题期间，拜访郑绍华研究员，了解平邑县小西山化石群的研究进展情况。郑先生除介绍科考的基本情况以外，还出示了一件在小西山科学发掘中出土的疑似旧石器标本，让我辨认，笔者一眼看出是典型的旧石器时代的刮削器。郑先生见我感兴趣，知道我是从事旧石器考古的，就慨然将那件石器赠送给我，建议我们去考察。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地点就这样发现了。

1997年2月，笔者时在临沂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工作。为了落实中科院研究员提供的线索，专程去平邑县，会同平邑县博物馆的同仁，赴白庄村从事专题考察，在小西山上共采集了24件石制品。经与中科院的专家会商，最终确认小西山发现的旧石器石制品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万年。约相当于北京猿人生活的时代。迄今为止，这个地点是山东省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型地点唯一的一处有年代结论的文化遗存。也是蒙山山脉早期人类生活的重要实物证据。



二、石器地点附近的地理地貌概况

白庄小西山地点位于平邑县城西南4公里，东阳乡驻地西2.5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 $35^{\circ} 27' 30''$ ，东经 $117^{\circ} 36' 24''$ 。小西山海拔高程191米，高出山南侧浚河河床约60米，是孤立的馒头状山丘。山体基岩为奥陶系灰岩，组成浚河的河流二级基座阶地。在小西山的最高点北侧，因村民20余年来的采石作业，出露了许多红色土裂隙堆积，内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初步清理试掘并编号的有4个重要地点。据郑绍华等人对小西山红色土状堆积的综合研究，可将其综合成一个简单的底层柱状剖面图。堆积顺序自上而下为：

(1) 现代灰岩碎屑，厚0.2—0.5米。

(2) 黑色土壤层，厚0.2—0.3米。

(3) 红棕色粘土层，富含钙质结核和脊椎动物化石（以第3和第4地点为代表），厚2—3米。

(4) 灰黄色粉砂质粘土层，富含胶结坚硬的钙结核，脊椎动物化石多宝保存在这些结核中（第1地点为代表），厚3—4米。

(5) 方解石层，纯度高，沿原始地面发育分布广，厚1—2米。

(6) 紫红色砂质泥岩，胶结坚硬，分选好，含蝙蝠类化石（以第2地点为代表），厚约1米。

(7) 奥陶系灰岩。

上述地层除1、2层为全新世地层外，3—7层均为中更新世堆积。其中第 层中发现了一件石英岩人工制品，第3、4、6层皆含有哺乳动物化石。

三、哺乳类动物化石群的组合

小西山4个含有化石的哺乳动物共有14属15种，分属于食虫目的猬种（Erinaceidae）；翼手目的蹄科（Hipposideridae）及蝙蝠科（Vespertilionidae）；兔形目的鼠兔科（Ochotonidae）及兔科（Leporidae）；啮齿类的鼯鼠科（Siphneridae）；仓鼠科（Gerbilidae）；（鼠平科）（Arvicolidae）；沙鼠科（Gerbilidae）及鼠科（Muridae）；肉食目的犬科（Canidae）及鼬科（Mustelidae）和偶蹄目的鹿科（Cervid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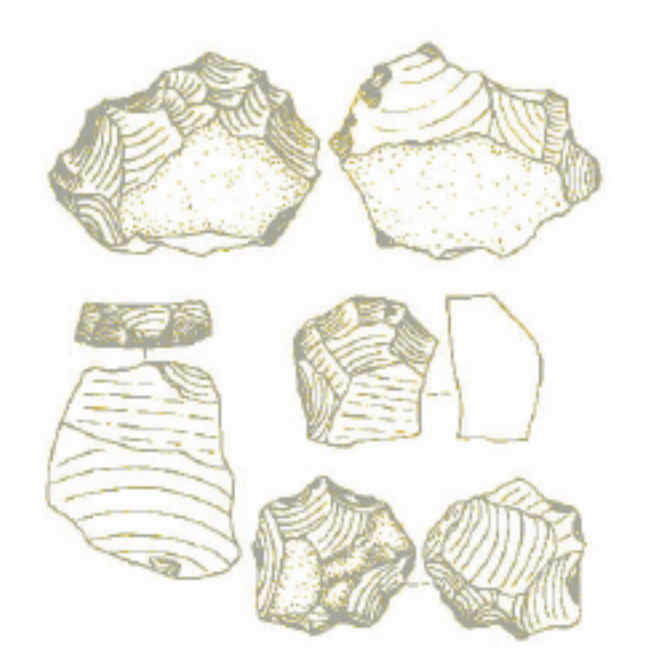
该动物群若按生态习性及地理分布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荒漠和荒漠草原类型，7种，占总数的64%；二是灌丛草原类型2种，占总数的18%；三是广栖型2种，占总数的18%。

小西山4个地点的动物群，基本上可与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1—5层对比，也可与安徽和县猿人动物群的测年结果30万年左右相比较。

四、旧石器石制品的描述

小西山地点发现的石制品共24件，用石英岩和脉石岩制成，除一件刮削器得自含化石的原生层位以外，其余23件均集中地采自小西山最高点南坡海拔180—190米的高度。这些石制品虽采自地表，但从石制品上浸染的红色分析，它们应是由红色土层冲刷出来的。从石制品的棱角上可以看出它们未经远距离搬运，却仍可见有不同程度的风蚀和水蚀现象。考虑到该地第四纪地层的分布实况，石制品应是原产自中更新世形成的红色土堆积中，其地质时代应与含化石的层位大致相当。

在24件石制品中，石核14件，石片3件，刮削器6件，尖状器1件。



五、动物群的时代与石制品的文化年代

关于小西山哺乳动物群的时代，原研究者将其与周口店的各地点不同时代的动物群作了较细致的比较。依据动物群绝灭的种属及含动物群的地层岩性，认为小西山第1地点含化石层位可与周口店第1地点1-3层的层位相当，也可与猿人动物群测年结果30万年左右相比较；小西山第2地点虽只有两种蝙蝠发现，但其层位最低，可能与周口店第1地点第5层的时代相当，文化年代接近或超过了30万年；小西山第3、4地点约与周口店第3地点的2-4层的时代相当。一般认为，周口店第3地点的时代比周口店第1地点的时代较晚。小西山第3、4地点的文化年代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

平邑小西山动物群的发现，表现出中更新世该地的生态环境应为荒漠草原类型，与今内蒙古南部相似。表明在距今约23-29万年期间，平邑一带有一次显著的干草原化过程。

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在小西山的发现，数量虽然较少，工艺技术特征还是可见一斑的：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次之。石器的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修理技术以陡峭加工为主。其文化年代应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考虑到小西山地点地处蒙山山脉南麓，该地点的发现有可能预示蒙山一带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小西山地点旧石器与动物群的发现，是沂沭河流域沂源直立人动物群、沂水南洼洞、沂水西水旺等中更新世地点之后的又一重要地点，填补了山东地区以往小化石发现的空白。

剑指“司令部”之魔

——记费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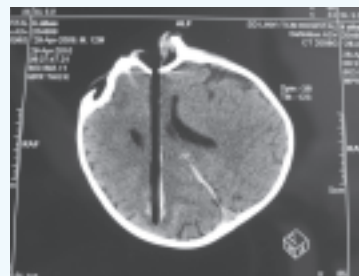
刘凤才

前些时日，山东电视台“说事拉理”栏目的一条报道，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震撼了千万人的心弦。费县一不足两岁的男童，吃早饭时不慎跌倒，手持的一双筷子从左眼角深深刺入整个颅内，情况凶险，命悬一线。万分危急之中，孩子被送到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在一位资深专家带领下，医护人员以高度责任与高超技术，成功地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条幼小孱弱的小生命。这位有起死回生之术的专家，就是神经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费昶。

少年励志为悬壶

1972年，“文革”战犹酣。当时的临沂县重沟人民公社卫生院，在社会招工中破格录取了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名曰费昶。其文质彬彬，寡言持重，肯学能干，很快就得到了大家喜欢。

医院分配费昶做防疫工作，防治的主要“瘟神”是疟疾、丝虫等疾病。特别是丝虫病，其时山东流行为全国之最，临沂疫情为山东之首。虽经建国后防治，其危害已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喟叹的“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之悲象，然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荼毒，仍未根除。几万人的公社，数十个村庄，上万户家庭，防疫任务艰巨繁重。费昶或步行，或骑车，



左图为外国专家Johnson与费昶主任一起在分析病情

右图为幼童头颅CT，可见筷子已穿至对侧大脑半球

不论春夏秋冬，不惧风雪霜，挨门串户，宣传常识，送医送药，不嫌苦累，从不间断。工作当年，一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青年积极分子”的大红花就披挂在了少年胸前。

大红花并没有使费昶心花怒放，反而让他心事重重。看到不少百姓遭受疾病折磨的痛苦，目睹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其心常如针扎，肩头总似负重，眼中时噙泪花。无忧少年很快变成了扁鹊、华佗、董奉等先辈大师的“钢丝”，立志要象他们那样，扎根杏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他拜所有医护人员为老师，如饥似渴地钻研当时不多的医学书籍，竟然很快掌握了不少的医学基础知识。院领导见此生是个可造之才，全力保荐其上了全地区的最高医学学府——沂水医专。其时，政治“统帅与灵魂”仍高于一切，学校的第一课程仍然是“最高最新指示”与“两报一刊社论”等，埋头学习业务，搞不好就要惨遭“大批判”。而费昶则坚信只喊政治口号一不能行医二不能开药，吓不走也灭不了疟疾与丝虫。他坚持以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劲头儿，躲避开政治的喧嚣，偷偷地饕餮一切医学知识的“大餐”与“宵夜”。动力加悟性，博学且深钻，举一反三，使他在上学期间就经常在专业上有独到见解，不落窠臼。业精于勤，功不负心。1977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地区人民医院外科，开始了悬壶济世的崭新人生之旅。

“脑外”一线三十年

1978年，随着业务扩大，神经外科从大外科中分离而独立，专门以外科手术治疗脑神经系统伤病。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动一发”而牵全身；而产生于此的外伤内病，如同侵入司令部的“魔鬼”，伤一丝而关乎性命。分到此科的费昶，自此走上神经外科的第一线。30多年来，他把手中的手术刀作为一把“利剑”，直指危害危及“司令部”的各种魔鬼，愈战愈精，所向披靡。

受当时诊疗设备与技术局限，神经外科疾患“两难”，工作有“两大”。一为诊断难。主要靠气脑、脑血管、脑室造影等有创诊断，危险度高，有时因患者不能承受，诊断结束也伴随着生命结束，故一般不到病危不做这种检查。诊断期间，医生又必须同病人一起，处于X光机照射之下，而病人是暂时的，医生是长期的，对身体影响很大。其他如超声波、脑电图等诊断，效果又不尽理想。二为治疗难。与其他疾病相比，如其他恢复预后为九，则神经外科只为一二。正因如此，此科工

作风险尤大，责任尤大。故最初成立此科时，几乎没有有人愿意沾边。

费昶念念不忘、特别感激的是神经外科已故老前辈高凤岭先生。高先生德高望重，经验丰富且开拓创新，是大力倡行成立神经外科专业的第一人，并亲自挑起了领导与技术重担，开创了我市神经外科的先河。费昶紧随其后，积极进取，基础扎实又特别钻研，深得高先生重视与赏识。一般地讲，一个大夫固定于某专业岗位需5年左右时间，但是费昶只用了1年时间，并很快成了神经外科的青年骨干。其后，他受院室委派，到当时省内脑外科最先进的山医附属医院进修深造。1985年，又到天津医大进修。此院是国内神经外科的“领头羊”，已经成熟运用脑CT、磁核共振等先进诊断设备。在这里，费昶大开眼界，潜心学习，很快熟练掌握了有关技术。其时，我们尚无这些设备与手段。尽管经费紧张，院领导还是下决心专项投资，为神经外科配备上了同类设备。这些新式“利剑”，使费昶与同事们如虎添翼，信心倍增，并在全市率先开展了神经外科显微手术。近年，不但诊断上，而且治疗设备与技术也更新换代，今非昔比。显微镜手术台、程控病床等，都是全院最完备最上等的；神经外科也细分成4个科室，成为市院3大特色专科之一。费昶说：“神经外科之患者，不用出我市，即可得到相当省级医院的诊断与治疗。”自豪自信，溢于言表。

天命犹自尽天职

今天的费昶，年已过天命，两鬓染细霜，一派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胸有成竹、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经过30多年的千锤百炼，他已经成为经验丰富、医术精湛、成绩斐然、医德留香的神经外科专家，担任省、市多项学术职务，获得多项荣誉称号，在省内同业享有很高知名度。本文开头所述之故事，正是他医德仁心、高超医术的一个最好证明。

重伤垂危的孩子送到本科时，其家长介绍：孩子受伤后，他们在交警极力救助下，开车一路狂奔至临沂城。为争分夺秒，他们沿途先后到4家医院求救，但是一看孩子伤势，皆摇头叹息，无计可施。现在，他们把寄托最后一线希望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了费昶身上。见过无数脑创伤的费昶，此时也不仅倒吸一口凉气：孩子已经重度昏迷，且起了高烧；磁共振检查显示，筷子直刺颅底，为穿通伤。怎么施救是个难题，能否救活也是个未知数。但是看到孩子父母心如刀绞的表情，他没再犹豫，在最短时间内制定了严密科学的方案。为了不但

挽回小生命，而且保证其大脑将来不受大的伤害，他毅然放弃了传统但保险的开颅术，在采取防止出血措施的情况下，最后直接将筷子从颅内取出。其后，在按时严格监控及精心治疗下，孩子终于渡过了危险期，脑损伤降低到最小，功能得以完全恢复，其家长感激涕零。

这类“惊心动魄”的奇迹，在2008年5月，费昶他们就已经创造过。当时，一名建筑工人受颅脑重度贯通伤，1.5厘米粗的螺纹钢穿入颅内达14厘米，也是费昶带领同事们从阎王鼻子下面抢救了其生命。

已知天命的费昶，更知、尤尽自己的天职。他对自己的工作从来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懈怠与疏忽。而对自己所带的队伍，也以严深精细为基本要求。随着设备更新，水平提高，名声扩大，原来没人愿意从事的神经外科，现在很“吃香”，趋之者若鹜。作为负责人，费昶深知责任重大。对此，他始终坚持两条：一是考察人，先弄明白其欲从事神经外科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名利，三言两语，他就能诊断出此医生“脑子有病”，绝对不能让“脑子有病”的人给人看病。二是对下属耳提面命、不厌其详：“神经外科患者的诊疗，前期诊断、手术是一半，后期治疗、护理是一半，每个环节都性命攸关，稍有不慎，前功尽弃。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细而再细。”正是在费昶的严管厚爱、言传身教下，神经外科的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升。业务骨干由前几年的不过七八人，发展到现在的20多人。

交谈最后，意犹未尽，我们还想多了解几个典型病例。没想到这给他出了个难题。他沉吟良久，言道：“这确实不好回答。这些年来我们诊治的患者有数千例之多。脑外科的每个病例都是‘典型’，都直接关系到一个生命的消失或者新生。前几天，南坛还来了一位女病人，才30多岁，连续抽风1天多，高烧，肺部感染，岌岌可危。经诊断为脑瘤。如不及时抢救，再无生还可能。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们实在不忍心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瞬间消失。最后经我们全力抢救与精心治疗，患者自己走着出了医院……”

我们问得很外行，费昶答得很平淡。正是：少年始悬壶，天命仍尽责，利剑但能擎，不歇除“脑魔”。



男童康复后送锦旗致谢

临沂大学历史变迁

王培磊



滨海中学学员正在上军事课

1. 滨海中学——一所“抗大式”军政干部学校（1941.5—1945.8）

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运动广泛开展，根据地的军政建设和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满足这一需要，中共山东五地委和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决定按照抗大一分校的建制，在滨海区建立干部学校。因为战时形势的特殊需要，学校定名为“滨海中学”。1941年5月，滨海中学师范部开学。滨海中学第一任教导主任管戈同志和第一任书记郭抵同志，以及中队长与中队政治指导员宁林、山智中、余松若、任杏发，周抗、庞焕等领导同志，都是先后从抗大一分校调派和聘请而来的，这些同志始终保持着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着滨海中学的教育方针和校风，使滨海中学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一所“抗大式”军政干部学校。

2. 滨海建国学院（1945.8—1950.2）

1945年8月，滨海中学改名为滨海建国学院，原滨海中学的教职工大部分到建国学院工作。1947年春，山东省教育处（厅）把直接管辖的山东大学附中改名为滨海师范并下放到滨海地区。滨海地委、行署决定将滨海师范与滨海建国学院合并，成立“滨海公学”。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1948年1月，学校奉命停办，教职员全部转入华东大学学习，学生全部分配了工作。同年10月，滨海地委、行署决定在滨海地区恢复滨海中学，恢复后的滨海中学改名为滨海乡村师范学校，1950年2月，滨海乡村师范学校奉令从莒南迁至临沂城南关前街，改称临

沂师范学校。滨海建国学院以及后来的滨海公学、滨海乡村师范学校的师生员工们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依靠党的领导和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不仅长期坚持了教学工作，而且在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为党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成千上万名干部，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3.山东省临沂师范学校（1950.2—1958.8）

1950年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批准把省立滨海乡村师范学校迁到临沂并改名为山东省临沂师范学校。本着党的“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教育方针，开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师资的正规化师范教育。学校进一步端正了培养目标与办学指导思想，科学地设置了课程，整顿了管理机构，加强了教学管理，倡导学习、运用苏联的教学管理方法，教职工开展了思想改造、提高业务水平等一系列活动，重视学生课外活动的组织，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4.临沂大学（1958.8—1959.8）

1958年8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中共临沂地委、临沂专员公署关于建立临沂大学的报告，临沂大学宣告成立并于9月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针对临沂地区师资匮乏、工农业技术人才奇缺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主要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和工农业战线的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设立了师范、农、工三科，制定了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同时制定了临沂大学《关于一九五九自然科学研究规划》，确立了科学研究专题。学校贯彻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原则，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在设备简陋、经费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师生们反对保守，破除迷信，以冲天的干劲和科学分析的精神，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1959年8月，根据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and 省委关于整顿1958年新建高等学校的指示以及省高教会议提出的对“临沂大学”调整的方案，撤销临沂大学建制，分设师范专科学校和工业、农业两所中等专业学校。

5.临沂师范专科学校（1959—1999）

1959年8月，临沂地委决定把原临沂大学师范科改为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主要为临沂地区培养中学师资。1966年6月，为适应“两种教育制度”的需要，山东省教育厅报经省人民委员会同意，决定在临沂地区建立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定在费县城北。学校刚开始筹建，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处于停顿状态。1970年12月，学校改名为“临沂地区师范专科学校”。1974年6月4日，国务院教组（74）教科计字125号批准同意恢复“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1977年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员。1984年，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从费县县城迁至临沂城北。1997年11月在全省高校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成绩。1998年本科专业开始招生，为学校顺利升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原临沂师专
（费县）校门

6.临沂师范学院（1999.3—2010.11）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1999年3月25日，教育部批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与临沂教育学院合并建立临沂师范学院（教发[1999]36号）。2000年4月22日，临沂师范学院正式挂牌。2001年10月，临沂农业学校和临沂工业学校并入临沂师范学院。2007年6月，沂水师范与费县师范并入临沂师范学院，成为临沂师范学院的分校。海纳百川终成洋。作为沂蒙老区第一所本科院校，临沂师范学院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担负起了为沂蒙老区培养和塑造高层次人才的艰巨任务和光荣使命。学校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持、学校管理、优化资源、市场运作”的新校区建设模式，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为临沂培养了大量高层次和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有力推动了临沂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年间，学校坚持“为沂蒙服务”的办学宗旨，在担负人才培养重任的同时，注重发挥现有资源潜能，启动“五百教授下沂蒙”、“博士教授服务沂蒙行”工程，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反哺沂蒙革命老区。学校以持续创新的精神，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优化资源实施多体制办学，引入企业理念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从出口往回找”实施课程创新，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发展老区高等教育的辉煌业绩，走出了一条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高校创新发展的健康之路，被高等教育界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临沂大学现象”，为创建高质量品牌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临沂大学（2010.11—）

2001年3月中旬，临沂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提出“以临沂师范学院为基础筹建综合性大学”，启动了以临沂师范学院为基础筹建综合性临沂大学的工作。2003年10月18日，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筹建）新校区奠基仪式隆重举行。2003年12月2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筹建综合性临沂大学”。2004年5月，新校区开工建设，年底迎来第一批学生入住。2010年8月26日—28日，教育部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对临沂师范学院更名为临沂大学工作进行检查评估。专家组通过深入了解和检查，认为临沂师院自本科办学以来，历经十年历练，软硬件均已具备了更名为“临沂大学”的基本条件，认为“更名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010年11月26日，教育部向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教发函[2010]189号文件），正式批准临沂师范学院更名为临沂大学。2010年12月8日，临沂大学揭牌庆典隆重举行，千万沂蒙人民和全校师生为之奋斗和期盼已久的夙愿得以实现，临沂大学从此走进创建高质量综合性大学的崭新时代。



临沂大学新校门

与时代同行

——记新华社原国内部主任李尚志

于 芹



李尚志，沂南县人。中共党员。196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先后任国内部副主任、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时事报道研究会会长、顾问等职。

他的记者生涯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航船扬帆启航之时。他担当起时代摄影师的职责，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敏感的新闻神经以及非凡的判断力。先后采写了大量有较大影响的中央新闻，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李尚志在从事中国时政报道的过程中，写下了5000多篇稿件，其中不乏名篇名作。《中外新闻名著鉴赏大辞典》就收入了10篇之多。2000年9月，李尚志获第四届“韬奋新闻奖”。先后多次获“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奖。

三张弃权票，折射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982年12月4日下午，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荧光屏映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幕。凭着多年的采访经验，他敏感地觉得三票弃权是这次大会的一个新闻亮点，便打破过去的“一致通过”的传统新闻报道格式，把3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当会务组几位同志传阅新闻稿后表示异议时，他列举了以下几条：第一，外国记者被允许在礼堂二楼采访大会，表决结果我们如果不报道，人家肯定会报道；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先知道，总看“出口转内销”的新闻，老百姓会有意见；第三，有3张弃权票是事实，作为新闻记者应当尊重事实；第四，今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040位，同意票3037张，没有反对票，弃权票占总有效票数的千分之一都不到，报道这一事实更能反映我国民主生活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后经请示邓小平和胡耀邦同意，李尚志如实把3张弃权票写进报道里，该报道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见微知著，首次向世人报道中国开始全面改革

198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通知李尚志，说下午有一个会，胡耀邦同志要在会上发言，要李尚志到会采访，并拿给他一份胡耀邦的发言提纲。当他看到提纲，凭着新闻敏感，立即觉得这是一条重大政治新闻。提纲上有这样的文字：“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思忖，以往都是讲“革命”，现在讲“改革”，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提法不同，意义更不同。当时他就开始酝酿稿子，且越想越觉得此事重要。下午会议一结束，他就写成一篇报道：《中国开始全方位改革》。当李尚志拿着稿子去给胡耀邦看时，胡耀邦问：“不是不让发消息的吗？你怎么写了稿子？”李尚志坚持让胡耀邦看稿后再说，还“动员”道：“这稿子应该发，因为您是总书记，这个事情关系太大。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发消息。如果不发，那和以前有什么两样？”邓力群说，“这个事情关系重大，中央还未讨论决定，这些都是和小平同志私下聊天聊出来的，这个只是整理出来准备讨论的，等讨论后再说吧。”李尚志建议说，今天就是发个消息，等中央正式文件下来，再发正式的消息。于是，胡耀邦签了字，同意播发这条消息。“中国开始全方位改革”的消息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李尚志因此成为首次报道中国开始全面改革的记者。胡耀邦也因此说他“先斩后奏”。

“抓拍”镜头：“请小平同志不要吸烟”

1988年4月8日上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投票阶段，选举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投完票之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歇息，并习惯地点了支烟吸了起来。一位正在排队投票的女代表（著名的粤剧演员红线女）看到了这个情景，便把写着“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字条，由台下传上了主席台。邓小平同志看了条子后，笑着连连点头，并立即将烟熄掉。

作为一名政治记者，李尚志深知当众给领导人提意见的分量。提醒小平同志不要吸烟，生动反映了我国民主生活的一个侧面，李尚志要把这件事写进去。他为了更慎重一些，又去找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时任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正在现场忙碌）。毛毛一听乐了，说：“大记者也有胆小的时候呀？”然后说：“写，给他写上，督促他戒烟。昨天是今年的世界戒烟日，我们在家还给他提意见呢，谁知他说世界戒烟日和他没关系。”毛毛又说：“写，没关系，老头问起这事时我们顶着。”于是，李尚志就写了一篇即景新闻《投票前后》，经新华社审定向外发出去了，我国几乎所有报纸都在第二天发表了这篇新闻，没想到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的读者说，这个细节反映了小平同志从谏如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宽广胸怀，让我们如临现场，看到了小平同志亲切的待人态度和民主作风；有的读者说，如果没有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记者斗胆也不敢写这样的稿子！



姓氏百家漫谈 (连载)

赵丹峰

王姓名人述略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王姓族人创造了辉煌的家族文化，诞生了为数众多的政治名人、文学名人、艺术名人、科教名人，其数量居各姓之首。他们宛如光彩熠熠的星辰，交相辉映，使得历史的天空愈加深邃而璀璨。

战国时期，王姓中出了一位隐士高人王诩。据多部王氏谱牒记载，王诩（亦名禅）系王子晋六世孙，因其长居于鬼谷洞中，故世称其为鬼谷子或鬼谷先生，而民间则广泛称其曰王禅老祖。王诩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战略家、纵横家，长于养性和纵横捭阖之术，素有中国“纵横家之祖”之誉。其隐居的鬼谷洞位于云蒙山中，云蒙山为蒙山三大主峰之一，位于今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境内（亦有鬼谷洞在今河南省汝阳之云梦山等地之说）。苏秦、张仪、孙臆、庞涓皆出其门下，《史记·苏秦传》有“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之载。平邑云蒙一带，春秋属鲁，战国归齐，在地理概念上与《史记》所记吻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是孩提时代的笔者曾在乡间集市上听一位说书艺人唱过一段大鼓书篇：“云蒙山有一座云蒙洞，云蒙洞里有位大仙。他本是鬼谷子名叫王禅。王禅老祖收徒弟，收来了孙臆与庞涓。老祖将兵法阵图授于孙臆，把枪刀剑戟传给庞涓。为什么一样的徒弟两样对待，他知道日后孙臆忠来庞涓奸。……”透过这苍凉的唱词，人们也许会从中寻觅到某些具有参考价值历史信息。

战国后期，王翦、王贲父子率秦兵连年征战，相继灭赵、燕、楚、越诸国，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立下殊勋。当论及谁人为秦统一六国出力最多时，时人均谓之曰：“王氏、蒙氏功为多，各施于后世。”王翦父子不仅在秦时受到推崇，就是到了距秦1300余年后的宋朝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王翦又被宋王朝追封为镇山伯。

汉代，有一批王姓名人彪炳史册，他们中有追随刘邦建立勋劳，刘汉立国后任右丞相的王陵；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哲学家王符，其代表作《潜夫论》，作为“诸子”二十六家之一，被收入《诸子集成》；政治家司徒王允，因与吕布设计殊杀董卓而闻名；文学家王逸，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为后世学者所重；文学家王粲，系“建安七子”之一，与曹植并称为“曹王”；女中豪杰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单于，和好了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其事迹后成为诗词、戏曲、小说、说唱等的流行题材。

王莽，这位“新”王朝的建立者，是作为王姓名人中的另类被载入史册



《昭君出塞图》

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可看作是对这位开篡位称帝历史先河之人复杂人生的一个中肯定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王姓族人特别是琅邪临沂王氏家族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故土临沂直至乔迁江南，从这一家族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名人。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其他家族无出其右者。受篇幅所囿，此处只能述其大略而已：王祥是三国魏和西晋大臣，年轻时以孝事继母闻名，其“卧冰求鲤”、“黄雀入幕”和“风雨守柩”三大孝例被广为传颂，元明之际的郭居敬所撰《二十四孝》，王祥名列其中。其同父异母之弟王览，则因友兄而被誉为“二十四悌”之一。明世宗嘉靖皇帝曾为坐落于其故乡临沂孝友祠亲书御匾一块，上写“孝友格天”四字，并派钦差亲临孝友祠祭祀，以倡孝悌之行。

西晋大臣王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后位至司徒，他与嵇康、阮籍、山涛等友善，是“竹林七贤”之一。其叔伯兄弟王衍因善清谈而闻名当世。王衍清谈时，不假思索，信口更改，时人称其“口中雌黄”。成语“口中雌黄”（或称信口雌黄）即典出于此。

东晋开国丞相王导，是此期王氏族人在政治上最有建树的一个人物。永嘉初，他便献计琅邪王司马睿移镇建邺（今南京），为日后东晋在江南立国作了未雨绸缪的政治谋划。东晋立国之初，身肩丞相重任的王导在位于今南京市北濒临长江的幕府山上设置幕府，为制定兴国大计而殚精竭虑，为北御强敌、收复中原而运筹帷幄。此山名曰“幕府”，即由王导而得。作为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和执政者，王导在政治上采取了一条力求宽简、镇之以静的施政方略，对调节当时紧张的社会关系，安定内部，抵御北方胡族势力的南侵，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改革官制，发展教育，广设学校，培养人材，“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故晋元帝曾将其与王导和从兄王敦的关系称之为“管（仲）鲍（叔牙）之交”。以至他在登基称帝时，竟邀王导和他共坐御床，受百官朝拜，因王导固辞方罢。

琅邪王氏除在政治上有突出建树外，在文化领域，则以在书法方面的骄人成就令世人称誉景仰。晋和南北朝时期，是王氏书法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此期，琅邪王氏一门相继产生了几十位著名书法家，成为中华书法文化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在王氏文化诸贤中，书法成就最高者当推王羲之。王羲之的书法千变万化，其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修禊”之日一气书成《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文中所书的20个“之”字个个不同，受到后世一致推崇。作为一代书圣，王羲之在精研前世书法家的基础上完善了新的书体，成为当时书法创作的领头人。他的雄浑的笔力创造了变化多端、意语深邃的书法艺术境界，显示了他不同于常人的神采与魅力。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是继王羲之之后最为杰出的书法大家，父子二人被合称为“二王”。王羲之的行书《快雪时情帖》、王献之的草书《中秋帖》和王珣（王导孙、王洽子）的《伯远帖》，为清乾隆皇帝的“三希堂”珍品。

长期以来，很多人只知道王羲之是“书圣”，而对于“东晋书画第一”的王廙（羲之叔父，羲之学书最早即从师于他）、草圣王珣、南齐书坛“第一”的王僧虔和梁代即称“书圣”的王志却知之甚少，因而更谈不上宣传他的书艺，是失之公正的憾事。

唐代，王姓中出了一批享誉古今的文学大家。被列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才华横溢，兼擅诗文，《滕王阁序》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是其代表作。序文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诗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其后的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均是各领风骚的大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中，吟唱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颇富哲理的佳句，在《凉州词》中则发出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叹。前者被人赞为“有尺幅千里之势”，而后者则被称为盛唐绝句的“压卷之作”。王昌龄是盛唐时杰出的诗人，所作边塞、闺怨和登临送别诗皆有名篇。因其吟哦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绝唱，而被誉为“七绝圣手”。王维是一位具有多种才能的艺术大家，无论诗

歌、文辞，还是音乐、绘画，均有很高的成就。“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上述这些千百年来为国人所传颂引用的佳句，均出自王维之手笔。所以，他被称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为盛唐诗坛的三大家。以上诗人，除王昌龄系京兆王氏外，其他人均出自太原王氏。

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和王审知分别创建了前蜀国和闽国。王审知是琅邪王氏后裔，治闽几十年，他安抚诸蛮，发展经济，广纳中原士子，兴办学校，其创办的“四门学”不收学费，这在当时为世间所仅有。王审知还利用闽国临海之势，大力扩建港口，加强对外交往，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使原来较为落后的八闽之域，成为联结东亚与南亚诸国的海运交通枢纽。经过努力，泉州港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大港。到宋代，泉州港内外每日所聚船只不下1.5万艘。近几年，我们在南海相继发现并打捞起一批五代与宋代时的沉船，通过对船只的建造规模和所运载的大量珠宝、瓷器的勘察，可以想象得出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外贸运输的繁忙景象。

宋代，王氏出了一批宰辅重臣，其中王旦和王曾（分别为三槐王氏和开闽王氏后裔）为相期间皆有政声，且为政清廉。以王曾为例：一次，有故人子孙来京，王曾留其饕食。饭后，王曾送其数轴筒纸，打开看时，却发现这些轴筒皆系用他人的来往信笺上剪下的纸边粘贴后写成。皇祐中，宋仁宗用篆字亲自为其题写了碑文，名“旌贤之碑”。皇帝为大臣赐碑篆，自王曾始。

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他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熙宁三年（1070年）拜相。他积极推行新法，抑制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由于保守派固执反对，新政推行迭遭阻碍。变法虽遭失败，但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王安石因此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其散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修辞精练；词作虽不多，但风格高峻。诗作《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被历代广为传诵。据说作者为了一个“绿”字，改动了原稿十余次。这则炼字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金代，王重阳自终南山得道后，云游至胶东昆嵛山传道，提倡儒、释、道三教“一祖风”的融合学说，创立了闻名中外的“全真教”，成该教教祖，元世祖封其为“全真开化真君”。

元代，王姓名人有著名戏曲作家《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画家王冕、著名农学家与活版印刷术的改革家王祜等。王祜系山东东平人，王冕则是琅邪王氏后裔。他生于诸暨（今属浙江省），能诗善画，尤擅长画墨梅。他曾在自己所画的一幅墨梅图上题诗曰：“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题咏墨梅，体现了作者不尚浮华，心存正气的精神追求和清高气节，同时通过“我家洗砚池边树”这一开首之句，坦露出王冕不忘其琅邪王氏祖源，秉承先祖王羲之遗风的可贵心曲。

明代，王姓产生了大哲学家王守仁（号阳明）、思想家王夫之、文学家王世贞等。此期的琅邪王氏后裔王献臣，在官场失意后，回家乡苏州专研园林艺术，历时多年，王献臣建成了被誉为“吴中名园之冠”的私家园林“拙政园”。这座总面积达72亩的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园，为琅邪王氏在古典园林建造史上留下了最为精彩的一笔。

明末清初，王俊揭竿而起，成为山东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首领。王俊即王钜，沂州费县梁丘人，于明末率众起义。清兵南下时，他与其他义军分据苍山、花盘山、抱犊崮抗击清军，被推为盟主，号“九山王”。在费县、平邑和今枣庄一带，与清军斗争长达八九年之久。

清代，王时敏系清初画坛领袖，与其孙子王原祁、侄子王鉴、王翬并称为“清初四王”。王鸣盛严谨治史，所著《二十七日商榷》，系清代史学名著之一。祖居新城（今山东省桓台县）的王士禛，主张革除旧诗论复古僵化的流弊，开一代诗风，终成清代诗坛一代宗

师。曾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交游甚广，不以贫贱视人。他与蒲松龄相交甚笃，蒲松龄创作出文学名著《聊斋志异》后，王士禛作为该书最早的读者，对小说进行了认真的评点，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修改加工意见。王士禛曾对《聊斋》写下了著名的诗评：“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蒲松龄看后，遂和诗一首以答挚友：“志异成书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此期，在王氏发祥地临沂，王氏经过长时期的沉寂后，又相继涌现出一代人才。其中临沂南楼王氏（主要居于兰山、费县一带）先后出了7位进士、15位举人和29位贡生；临沂兰陵王氏亦出了5位进士和多位举人、贡生。王思衍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人物。家居兰陵的王思衍系进士出身，官至刑部主事。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海军提督丁汝昌拒绝向日军投降，于威海刘公岛自杀殉国。但在朝中，竟有人诬称丁汝昌已降日军。王思衍对丁氏无辜蒙冤而大鸣不平，遂作《威海谚》诗伸张正义：“归荣生 羌救章，断头将军说生降。……数乞兵资徒招忌，两月海壖竭死伤。至今士人哭战血，好与青史证雌黄。”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辛亥革命前一年，王思衍辞官返回故里。

民国初期，与思衍同乡同宗的作家王思玷蜚声中国文坛。1922—1924年，王思玷在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相继发表了7篇小说，真实、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军阀统治下的鲁南农村的悲惨图画。其中《偏枯》、《瘟疫》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等3篇小说还被选入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茅盾（沈雁冰）在该书导言中说：“这几篇，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1925年，王思玷响应北伐而投笔从戎。翌年壮烈牺牲。对于王思玷的死，远在千里之外的矛盾并不知晓，因久不见其有新作问世，故而感叹他“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

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王姓中涌现出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莒县籍的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后，系中共山东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在他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之后，不仅肩负着山东地区党的领导和组建工作，而且经常向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使临沂成为中共在山东开展活动和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临沂沂南籍的王德林，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在东北牡丹江一带重创侵华日军，成为东北地区的抗日名将。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时，曾提名他担任抗联总司令，因其疾病缠身，未能就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他担任光复军第二路指挥，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冀豫鲁等地，筹组抗日武装，1938年底，不幸病逝于家乡。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专文，号召爱国青年学习这位“民族老英雄”的爱国奋斗精神。同是沂南



王思衍书法

县的革命老妈妈王换于，年过五旬后参加革命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八路军伤员，创办地下托儿所照看八路军子女，并倾其所有支持革命斗争，使其家中一度成为罗荣桓、朱瑞等山东党政领导人经常落脚、活动的可靠基点，王换于因此被誉为“沂蒙母亲”。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王姓中涌现出不少英模人物，像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和大庆铁人王进喜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时代楷模。

在科技、文化界，同样不乏王姓精英的身影，像被誉为“波音之父”的王助，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我国“863计划”的倡议者、著名光学家王大珩，集近现代著名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著名作家王统照、王蒙，著名画家王雪涛，有“西部歌王”之称、创作了名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半个月亮爬上来》著名作曲家王洛宾，从临沂走出去的中国第一把小提琴制造家王玫等，都是受国人敬佩的科教文化名人。

在台湾，还有数位王姓名人：南方朔，本名王杏庆，是台湾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其文笔犀利，论事精辟，所撰文章不仅经常见诸于港台报端，由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亦经常转载他的文章。庄奴，原名王景羲，是台湾著名的歌词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如由他作词的歌曲《甜蜜蜜》和《小城故事》等，经由邓丽君用清丽婉转的歌喉演唱后，迅速传遍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成为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之一。

王公达，临沂东埠村人。1938年2月，时任美国合众社记者的他赴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主席。采访中，王公达围绕当时中国的抗战形势及前途，向毛泽东提出了9个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一一作了精辟的分析，结论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定会取得胜利。事后，他将采访谈话录整理成文后在国内外报纸上发表，对推动中国的抗战影响很大。1964年，王公达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顾问，次年任“总统府”参议，后病逝于台湾。

王永庆，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台湾著名的实业家。他运用科学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台塑集团由原来并不起眼的一般企业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跨国集团公司，王永庆因此被誉为“经营之神”。

茅台酒是名扬天下的中华国酒，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茅台酒业集团是1950年由号称“王茅”、“华茅”、“赖茅”的三家酒坊合并后而成立的。而王茅的执掌人，据说是琅邪王氏后裔。

在临沂文化教育界，亦有3位领军人士，他们分别是作家王火、学者王汝涛和画家王小古。由于他们在文学、史学和画苑上的突出成就，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被合称为临沂文化界“三王”。

跻身于全国500强企业行列的华盛江泉集团领头人王廷江，则是临沂市众多农民企业家中的优秀代表，这支庞大的民营企业群体，敢于拼搏，善于经营，用自己的才智和汗水，为沂蒙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临沂市在“齐鲁新方志奖”评选中荣获佳绩。6月10日，山东省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30周年纪念大会在济南舜耕山庄舜耕会堂召开。会议总结了30年来全省史志工作，表彰“齐鲁新方志奖”获奖单位、个人和成果。我市有5个单位、6名个人和43项成果分别受到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史志编委会表彰，其中受省政府办公厅表彰的为：临沂市、兰山区、沂水县、蒙阴县、临沭县史志办获“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临沂市史志办于芹、莒南县史志办杨永早、郯城县史志办刘卫星、河东区史志办高震、沂南县史志办邵明武、平邑县史志办王庆全获“先进个人”称号；临沂市史志办创办的《沂蒙史志》杂志获工作创新奖；《临沂市国土资源志》《临沂妇女工作志》《蒙山志》《费县奇石志》《曹家王庄志》获“优秀基层志书奖”；《临沂年鉴（2010）》获优秀综合年鉴奖；临沂市情网、临沭县情网、沂水县情网获优秀地情网站奖；罗庄区、兰山区方志馆获优秀方志馆奖；临沂市史志办《望族文化研究》获优秀读志用志成果奖；沂水县史志办陈希周的《试探地情资料中心的内涵》获优秀业务论文奖，受到省政府办公厅表彰。受省志办编委会表彰的有：《临沂工商行政管理志》《中国银行临沂分行志》《临沂专业市场志》《临沂果茶志》《蒙阴县人大志》《苍山县人大志》《平邑县人大志》《沂水国土资源志》《银光志》《兰山区宋家王庄志》等获优秀基层志书奖；《蒙阴年鉴（2004—2008）》《沂水年鉴（2008—2009）》《罗庄年鉴（1998—2004）》《莒南年鉴（2007—2009）》《郯城年鉴（2000—2004）》等获优秀年鉴奖；罗庄区情网获优秀地情网站奖；《临沂百年大事记》《当代临沂概览》《五湖四海莒南人》《特等英雄曹玉海》《铭记同乡一天南北沂水人》《临沭文化概览》和平邑县史志办开展的“蒙山文化研究”获读志用志优秀成果奖；《临沂史志论文集》《村级修志的现状与对策》《玉器已成型 精琢方为珍》《谈荣成市志的地方特色》《县志篇目设置要突出地方特点》《中国地名

来历类说》等获优秀论文奖。

苍山县举行二轮修志培训会。为提高修志人员的业务水平，确保二轮修志工作的质量，5月17日，苍山县二轮修志培训会在县行政办公室中心召开，各乡镇、县直各部门撰稿人及县史志办全体人员共百余人参加了培训。市史志办副主任杨兴文、编审指导科科长于芹到会作了辅导，就方志的发展概况和历史地位，方志性质、特点、功用、体例、文体文风，全市地方志编纂基本情况、资料搜集与运用、编写要求以及应该注意的10个问题做了详细讲解，加深了修志人员对县志编修工作的了解与认识。

《沂南县军事志》出版。由沂南县史志办公室承编的《沂南县军事志》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该书记述了自沂南县现行行政区域内有据可查的军事活动开始（公元前993年），至2005年近3000年的军事史。志书设军事环境、军事组织、战事、兵役、优抚、安置、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与装备、国防后备力量、国防动员、人物等10篇，总计86.9万字。志书资料翔实，记述全面，是一部沂南军事百科全书。

青岛市史志办领导来临沂考察指导工作。5月19—20日高克力主任率青岛史志办班子全体人员和各处室负责人来临沂考察指导史志工作。

《临沭县志（1986—2007）》志稿评议会召开。6月24—25日《临沭县志（1986—2007）》志稿评议会在临沭县政府招待所召开。省史志办主任刘秋增、市县志指导处处长李刚，临沂市政府副市长王晓嫚，临沭县委书记孙丰刚、副县长于丽华等领导出席会议，临沂市及各县区史志办领导、专家，江苏省东海县、赣榆县的史志同仁等共100余人参加了评议会。

会议由市史志办领导朱海涛、王瑞柱、杨兴文分别主持。省史志办公室主任刘秋增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县志编纂过程中，临沭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各部门、各单位全力支持，县史志办编纂人员默默无闻、甘于奉献，较好地完成了《临沭县志（1986—2007）》评议稿。要求与会专家认真做

好志稿评议，找出问题和不足。临沭县史志办全体编纂人员要认真听取意见，科学修改。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把《临沭县志（1986—2007）》打造成一部精品佳作。

与会专家利用近2天时间，对《临沭县志（1986—2007）》评议稿进行了认真点评，认为该评议稿观点正确、资料充实、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突出、视野开阔、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志稿。同时又从篇目、体例、资料、行文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三）。为了促进市志编修工作，市史志办加强了对修志人员的培训，先后组织骨干业务人员，对苍山县、经济开发区、市委党校、市检察院、经信委、人民银行、畜牧局、安监局、中小企业办、水利局等十几个县区和单位的修志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截止6月30日，已有市纪委、机关工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市公安局、畜牧局、渔业局、农业机械局、残疾人联合会、国土资源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计局、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工商局、临沂商城管理委员会、沂水县等近20个单位完成或基本完成《临沂市志》初稿，另外市纪委、市委政策研究室、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渔业局、公安局、商务局、民族宗教局、交通局、车务段、民航局、政务大厅等十几个单位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临沂市志》资料长编。